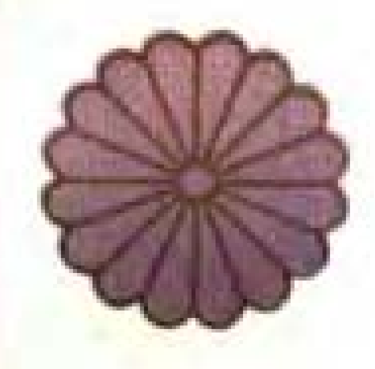
近代日本思想史

第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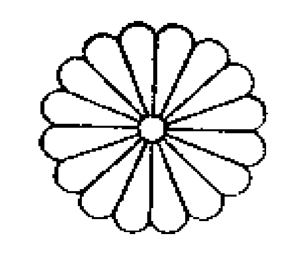
〔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 著



日本丛书·日本丛书

日本丛书·日本丛书

商务印书馆



日本丛书

近代日本思想史

第三卷

〔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 著

那庚辰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2年·北京

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

近代日本思想史

第三卷

青木書店，1959年版

日本丛书

近代日本思想史

第三卷

〔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 著

那庚辰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270-8/B·178

1992年6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18 千

印数 0—2 200 册 印张 6 1/4

定价：3.75 元

目　录

第三卷说明

本书第三卷的研究对象，从年代上看大体上是从大正民主时期到第二次大战结束这段时期。"大正民主主义及其思想"已经在第二卷最后一章进行了考察，所以，在这一卷中把下述三项，即大正民主时期再次复苏的社会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在这个时期孕育的日本法西斯主义思想，以及在上述左右两派运动和思想的夹击下被迫改变面貌的大正文化的最后崩溃及其变化情况，分别作为一章进行考察。内容是，第十章马克思主义的动向；第十一章昭和年代的"现代主义"思潮；第十二章日本法西斯的思想。最后再加上第十三章，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思想状况作概括的考察。以这些题目大体结束我们就日本近代思想史的通史所作的概括叙述。

诚然这是"大体"的叙述，我们也清楚地意识到它有种种不完备的欠缺。我们希望得到不客气的批评和批判，根据这些批评和批判再改写这部近代日本思想史，以期推进近代日本思想史的研究。最后的第十四章就是按这个想法添加进去的。在这章中我们提出三个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上必须注意的问题，即传统思想和外来思想的问题；思想和文学的问题；知识分子和群众的问题，从方法论观点进行了总结性的探讨。这部分最初是由各执笔人撰稿，两次在研究讨论会上征询研究会会员的意见，最后又由各执笔人根据提出的意见负责改写的。

本卷各章执笔人如下：第十章Ⅰ《马克思主义运动及其理论》——盐田庄兵卫，Ⅱ《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井　正，第十一章

《昭和年代的"现代主义"思潮》——生松敬三，第十二章《日本法西斯的思想》——土方和雄，第十三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思想状况》——古田　光，第十四章一《近代日本思想史中的传统思想和外来思想》——宫川　透，二《近代日本思想史中的思想和文学》——荒川几男，三《近代日本思想史中的知识分子和群众》——大井　正。

生松敬三

1956年10月

第十章　马克思主义的动向

I　马克思主义运动及其理论

一　社会主义运动的"小崛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时乘机开始复活。充满血腥气味的"幸德事件"宣告了所谓"明治圣朝"的结束，因此社会主义运动暂时陷入称为"严冬时代"的窒息状态。许多社会主义者离开了运动四散而去，石川三四郎(于1913年)和片山潜(于1914年)各自流亡于欧洲和美国。堺利彦在东京四谷开办"卖文社"(1910年)，以翻译、写文章、代登广告来维持在京同志的生活和联系。大杉荣和荒畑寒村则据守于文艺、思想杂志《近代思想》(1912年9月—1914年9月)。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是世界资本主义矛盾的产物，同时，战争的结果使资本主义的矛盾更加激化了。全世界阶级斗争的激化、工人阶级力量的增强就是它的表现。日本也不例外。通过这次战争，日本经济急剧膨胀，进入了真正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产阶级在天皇制国家政权中确立了优势地位。对中国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也愈益露骨。

一方面，随着工业发展，工人人数激增(从战前1913年九十一万到1918年大战结束增加到一百四十七万)，尤其是在重工业的大工厂中劳动的男工人数大有增加，为工人阶级增添了骨干力量。而且为反对战争所引起的物价上涨、劳动强度的增加和实际工资

的下降，各地都开始掀起罢工斗争。1912年铃木文治领导下成立的劳资调和性的工会“友爱会”，在工人崛起当中扩大了组织，并开始战斗化。到1916年，西文印刷工人工会“信友会”成立。另一方面，政治发言权已有所增强的日本资产阶级也在世界性的“民主”潮流中，以广泛的群众运动为后盾通过“护宪运动”同军阀专制政府展开斗争，进入天皇制范围内的改良运动。以吉野作造为理论指导者而开展起来的“民主理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受到知识阶层的绝对支持。这种形势的巨大变化使社会主义运动从窒息状态中得以复苏，并构成它在规模上和性质上同明治时代截然不同而向前发展的条件。

社会主义者的中心人物堺利彦，由他的卖文社出版了讽刺小报《丝爪花》（1914年1月创办）而凌驾于当时潮流之上，后又于1915年9月同高畠素之计议改出《新社会》杂志。对社会主义者来说，过了很久之后，现在又有了自己的机关刊物。堺利彦为该杂志创刊号写的发刊词《小崛起》中有如下一段话：

> “当然这算不上轰然奋起的崛起，但必定是用秃笔写在小小纸旗上的奋起。前一时期，一群零散者曾退居深山洞穴之中，恃守敌人不易接近的悬崖，以蕨菜葛根充饥，谋求持久之策，可谓惨矣，但也不失为一种聊存鸿志之义军态度。
>
> 因此，现在我等并无意于明天或后天下山试图反击敌人阵线，而且也无此种实力。此点料敌军也可暂且安心。惟望与远近同族聊相呼应，互相勉慰，同时，耐心等待时机。此种决心颇为坚定。
>
> 若有愿投此山寨或遥助这支孤军者，现在则无须深辩战术上的分歧和战略上的差异，唯确信求大同以相共谋即可。”

《新社会》登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文章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势报导、时事评论等，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表示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意愿。片山潜从美国，石川三四郎从法国都寄有文稿。1916年从冈山来京参加《新社会》活动的山川均，首先批判吉

野作造等人的"民主理论"，由此而把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区别开来，致力于阐明社会主义的独特性。

荒烟和大杉等人则同《新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相对立，采取了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立场。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以知识阶层为对象的《近代思想》的"知识的自渎"（大杉），停办了《近代思想》，从1914年10月起出版《平民新闻》月刊，由于相继遭到禁止出版，他们一面同镇压作斗争，一面积极地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大杉等人的机关刊物《近代思想》于1915年9月复刊，1916年8月改为《文明批评》，1920年11月又改为《劳工运动》，在这不断改刊当中，其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立场更加明显起来。）

1917年4月，据守在"山寨"中的堺利彦在众议院大选中作了东京市的候选人。发表政见演说会中途即被解散，最后仅得四十六票，但在一个社会主义者重新进行公开政治活动这点上，影响是巨大的。荒烟等人与大杉一伙分手后即参加了《新社会》，发行了《新社会》副刊《青服》（1916年9月创刊），主张工人的团结权，开始在自发地高涨起来的工人的经济斗争中展开工作。

就在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严冬时代"开始进入实际运动的时候，俄国发生了二月革命，接着，又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二　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和马克思主义的抬头——从俄国革命到日本共产党的创建

俄国革命使世界形势发生根本变化。1917年二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打倒了沙皇专制制度。紧接着，十月（公历11月7日）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以苏维埃制度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由于工人农民掌握了政权，整个世界分裂为资本主义和社会

主义两种制度。世界资本主义陷入总危机。它表现为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为代表的各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爆发；亚洲以及其他各地殖民地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动摇。就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身旁，1919年爆发了朝鲜的三一独立运动和中国的五四运动。并且日本本国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群众暴动"米骚动"。

1918年8月发生的"米骚动"，是因战争引起的物价上涨，特别是米价飞涨（每升从一角五分涨到五角，这次涨价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干涉俄国革命的战争，即出兵西伯利亚动用了储备粮而促成的），造成生活陷于贫困境地的群众不满的大爆发。这次首先开始于富山县渔村家庭妇女们的行动，瞬息之间扩展到全国各主要城市，进而波及中小城市、工厂、矿山和农村，历时五十七天，日本的一道三府三十一县都发生了暴动，卷入运动的达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暴动群众烧毁了囤积居奇的米商和爆发户，要求廉价售粮，并同军队、武装警察的暴力镇压展开斗争。这次"米骚动"是一次缺少政治和组织领导的自发的经济斗争，因而没有同统治阶级的武力进行持久斗争的战斗力，但它毕竟是促使日本阶级斗争飞跃发展的一个划时代事件。

以"米骚动"作为分界线，以后，以工人阶级为首，农民、学生、妇女、被歧视的部落民等所有被压迫人民的各阶层都自觉地成立了组织，为争取从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而一齐开始行动起来。从1919年起，劳动争议次数激增。罢工规模扩大了，通过斗争，工会组织迅速发展。在农村，反对寄生地主制的地租争议急剧发展，佃农会、农会一类组织也有所进展。这些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的高涨成为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条件，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开始结合。

社会主义运动不仅走向高涨，并且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开始

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前进。1917年二月革命发生后，日本的几十名社会主义者在5月1日劳动节纪念会上决定，以"东京社会主义者团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出支持俄国革命的国际团结的贺词。内容是：

"我们日本社会主义者1917年5月1日在东京集会，对于我们以赞赏的眼光注视着的俄国革命寄以深切的同情。

我们认为俄国革命既是反对中世纪式的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同时又是反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工人阶级的革命。俄国革命向世界革命的转变，不仅是关系到俄国社会主义者的问题，而且是全世界社会主义者的问题。

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达到它的最高发展阶段，我们现在正生活在已经完全成熟了的资本帝国主义时代。

只要全世界社会主义者不愿做帝国主义思想的俘虏，就应坚决站到国际主义立场上来。国际无产阶级必须全力以赴把矛头对准我们的共同敌人国际资本主义。工人阶级只有走上这条道路，才能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俄国社会主义者为了竭尽全力结束战争，为了让交战国的工人阶级共同达到这一目的，应当把现在指向战壕中的阶级兄弟的枪口转过来指向本国的统治阶级。我们是相信俄国社会主义和我们全世界的同志们的勇敢决断的"。

俄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并未被日本社会主义者立即理解。就是说，他们还未能立即理解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在完成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继续使之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本质。不过，社会主义者最初全都支持俄国革命。而且马克思主义倾向迅速地支配了社会主义者。堺利彦等的《新社会》认为，当时社会主义运动同工人阶级结合而进入实践运动阶段的时机已经到来，因而在前述发刊词的思想基础上，又在1920年1月号发出了这样的号召：

"今天，我们再不能只以'与远近同族藉互相呼应，互相勉慰'为本

志的任务了。如有可能，愿进一步鲜明地举起我们共同的旗帜，感动天下人心。这就是'准备'的意思，就是促进'时机'之所在。

那末，我们的旗帜是甚么？就是马克思主义"。

此外，1919年4月，堺、山川等人创办了理论杂志《社会主义研究》，其中尤其以山川均为中心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及宣传工作，并大力介绍了俄国革命和工农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博士于1916年在大阪朝日新闻发表了《贫穷物语》，翌年又连载了《社会问题管见》，把社会各阶层的注意力引向日益严重化的社会问题，又于1919年1月，发行了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普及，发生了较大影响。从"民主运动"出发的学生运动也迅速向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并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影响。同时，从这时起，马克思主义文献开始陆续出版。1920年，大镫阁开始出版《马克思全集（附恩格斯全集）》，并发行《红皮丛书》，读者甚广。《资本论》的日译本由高畠素之于1920—1924年间完成。堺利彦、河上肇、栉田民藏等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经秘密出版而广为流传。

社会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开始扩大。1912年在"社会主义就是决一死战"口号下组成的"友爱会"，在1919年9月的年会上也进行了改组，改称为"大日本劳动总同盟友爱会"（1921年又改称"日本劳动总同盟"），并邀请社会主义者堺利彦等作为来宾参加大会。

这样一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米骚动以后，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由于有工人、知识分子新力量的参加，不仅在规模上扩大了，并且在内容上也前进了几大步。作为上述全部社会主义成员的统一的集合体，就是1920年12月组织起来的"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组成该同盟的领导人之一山川均曾发表过这样一段"感想"：

"以前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是一盏小灯，那时曾吹来一阵暴风雨。不管怎样，还是有少数同志为了使这盏小灯不被吹灭，在它周围树起一座人墙。现在，这盏小灯已经燃起火焰，在它周围有了一座群众的人墙，灯交给了应当交给的人的手里。它已真正成为从群众当中燃烧起来的烈火"

"社会主义同盟"拥有一千名会员，它体现了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相结合。其机关刊物是《社会主义》（1920 年 9 月—1921 年 9 月。在此以前，《新社会》于 1920 年 2 月改名《新社会评论》，同年 9 月改名《社会主义》，成为"社会主义同盟"的机关刊物）。但是，"社会主义同盟"是一个由各种各样思想、立场的社会主义者和总同盟、信友会、正进会等工会组织以及新人会等学生团体等等混杂在一起的结合体，这里不仅有无产阶级，而且还混杂着激进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要求，所以它并没有实现思想上的统一。因此，它没能发挥无产阶级政治司令部的作用。

由于思想上立场不同，"同盟"内部经常发生对立，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安那其主义者）之间的对立日益激化。从明治时代的幸德秋水以来就为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和工人所接受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工团主义，又被大杉荣那样能力很强的领导人继承下来，并受到一部分有战斗力的工人的支持。特别是随着 1920 年战后危机而来的阶级斗争的深化，它在工人中的影响更加扩大。另一方面，由于俄国革命的影响，以前的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中也有许多人以山川均和荒畑寒村等为代表转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此外又有战斗的工人和进步知识分子相继站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社会主义同盟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与布尔什维克互相对立的舞台。正因如此，当1912年5月结社被禁止时，也就没有足够抵抗镇压的力量。社会主义同盟作为无产者在思想上向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前进，并从思想上为建

立本阶级的先锋政党而走向纯洁化过程的一个阶段是有其历史意义的，不过，这个阶段很快就完结了。

无政府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的对立在1922年9月30日大阪天王寺公会堂召开的日本工会总联合会成立大会上达到了顶点。当时，围绕日本工会的阵线统一方式问题，以总同盟为中心的所谓布尔什维克派的“中央集权的集中主义”和以工会同盟为中心的所谓无政府主义派的“自由联合主义”这两种组织原则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形势对布尔什维克有利，日本官宪看到这种形势，便以会场紊乱为口实解散了会议，成立总工会的工作终于流产了。然而，这次会议清楚地说明已经在实践中破产了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失去了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后来在1923年9月关东大地震火灾混乱之中无政府主义的出色领导人大杉荣死于白色恐怖，这是导致无政府主义具有关键性的一次衰落，在这以后，它对于工人运动几乎完全丧失了影响力。于是激进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便消失了。

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则朝着建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原则的先锋政党方向前进。当时，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团体，东京有以堺利彦为中心的“马列会”、以山川均为中心的“水曜会”、有高津正道和近藤荣藏的“晓民会”、渡边满藏、桥浦时雄等人的“钟表匠俱乐部”、市川正一和青野季吉等人的“无产社”；大阪有荒畑寒村、锅山贞亲等的“LL会”等等，此外，在总同盟会里面还有野坂参三等人的马克思主义者小组，在新人会、建设者同盟以及其他学生团体中，马克思主义者也在不断增加。机关刊物除已提到的《社会主义研究》，还有山川均等人发行的《前卫》(1922年1月创刊)，发表时事评论，介绍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市川正一等发行了《无产阶级》(1922年4月创刊)。以山川均为中心的“水曜会”吸收了田所辉明、德田球一等人，是一个力量雄厚的组织，出版了大量《水曜会小

册子》，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这些团体后来逐步合作、结合起来，为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准备。

日本国内阶级斗争的发展，要求有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政党。为促进建党的准备工作，使其进入国际无产者的行列，领导和帮助建立日本革命的领导机关"日本共产党"，共产国际开始进行了工作。

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是1919年作为世界革命运动的统一领导机关在莫斯科成立的。各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互相紧密联系在一起。共产国际特别注意对社会主义运动后进的亚洲各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予以援助和指导。1922年1—2月间，在共产国际主持下于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共产主义团体、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即"远东民族大会"），东方各族革命家会集一堂。日本有德田球一等几名代表出席，当时正在美国的铃木茂三郎及其他留居海外的社会主义者也参加了大会。

在这次远东民族大会上起领导作用的是片山潜。片山于1914年亡命国外，在美国领导日本人社会主义小组，并经常宣传国际革命运动形势以支持日本的革命运动。俄国革命爆发后，片山立即支持布尔什维克，使自己的思想向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发展，努力把俄国革命的情况介绍给日本人，并帮助建立美国和墨西哥的共产党。1921年末，片山潜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去莫斯科，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核心领导人之一。

在远东民族大会上，片山作了题为"日本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工人运动"的重要报告，开创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具体运用于日本的先例。同时他还对在日本建立共产党的工作进行指导。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在日本也迅速建立共产党，代表们带着这个任务各自回国。这样，1922年7月，成立了"共产国际日本支部日本共产党"。

三　为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日本而奋斗
——从日本共产党纲领草案到福本主义

1922年7月15日，在东京市涩谷区伊达町的一家民宅里召开了日本共产党成立大会。会议通过党的暂定章程二十四条，并根据党的章程选出党的中央机构。还决定党加入共产国际，全体一致承认共产国际章程和二十一条参加国际的条件。共产国际在同年11月到12月召开的第四次大会上，正式承认日本共产党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市川正一在他的法庭陈述《日本共产党斗争简史》中，把建党意义概括为：

> “第一，由于作为无产阶级国际性政党的一个支部日本共产党的建立，日本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紧密团结在一起了。
>
> 第二，日本开始有了一个并非职业性或宗派性集团，而是超越职业性或宗派性集团，并为整个无产阶级而斗争，代表整个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即日本共产党。
>
> 第三，无产阶级开始自觉地反对改良主义、议会主义的幻想，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
> 最后，日本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这样一个党，这个党是不受日本资产阶级法律束缚的党，是资产阶级不能摧毁的党。从这些方面看，它和过去任何社会主义的工人团体是截然不同的。”（国民文库版，第68页）

共产国际起草了《日本共产党纲领草案》，交日本共产党审议。这个草案虽然因未曾最终审议完毕而未经通过为正式纲领，但它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日本具体条件的第一个革命纲领，这个纲领概括了日本无产阶级长期以来的斗争成果和当前的要求以及革命前途的展望。（下面引用的日本共产党纲领全部引自日本共产党党史资料委员会编《关于日本问题的方针书、决议书》，五月书房出版。）

《纲领草案》的分析虽然不够充分，还很简单，但它明确指出了日本资本主义"现在仍然带有前一时代的封建关系的残余"；其基本点在于"土地的大部分掌握在半封建的大地主手中，而其最大的代表则是日本政府的元首天皇"；"封建制度的残余今天仍然在国家机构中占优势；国家机器仍然掌握在一部分工商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组成的集团手中"。关于由此而导出的革命的前途，纲领规定为这样两个阶段："关于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将在出现十分强大的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时才能胜利，因此，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将成为以打倒资产阶级统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因此，作为当前的口号，提出了"推翻天皇政府和废除天皇制"。虽然日本被压迫人民以前的一切斗争，客观上都是以通过打倒绝对主义天皇制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目标的，但只有这个"纲领草案"才第一次明确地宣布了这一思想。

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纲领草案》在当前要求方面，提出"废除天皇制"等"政治领域的要求"十项；"八小时劳动制"、"工资低限制"等"经济领域的要求"五项；"无偿没收大地主土地归国有"等三项；共二十二项，明确指明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具体内容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

《纲领草案》还指出，为了领导日本无产阶级反对统治阶级政权的斗争，必须建立"统一的集中的司令部"日本共产党；"日本共产党的当前任务是取得工会组织的领导权，巩固共产党对工人阶级各种组织的影响"，为此，党必须"从工会运动内部清除黄色的、追随政府的、社会改良主义的领导势力"；必须克服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错误。还指出"党必须尽全力同工人群众紧密团结在一起，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能处于孤立地位"。《纲领草案》表明了"日本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部分，在为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革命斗争中将尽自己的义务"的坚定意志。

《纲领草案》的内容在日本阶级斗争的历史上，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刚刚诞生的幼弱的日本共产党还不能够立刻掌握和运用这个《草案》。在《草案》的根本点“废除天皇制”这一口号上，党并未能统一意志。由于慑于“幸德事件”的惨酷镇压，和在客观困难面前惶惑起来的小资产阶级的反对，《纲领草案》虽经再三讨论，也未正式决定下来。总之，日本共产党还没有具备作为无产阶级先锋党所应有的力量。

然而日本共产党为同群众斗争相结合，为党的战斗化是全力以赴的。“日本共产党当前头等的重要任务是，同工人中间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旧有的工团主义思想和正在产生的议会主义思想进行斗争并克服它。这也就是推动工人走向阶级的政治斗争；第二，由于党本身内部和工会运动内部都还存在着前一时期支离破碎的宗派组织的残余，因此应把工人组编和锻炼成为一个集中的有组织的有严格纪律的阶级部队。”（市川正一：《简史》，71页）

在这个时期，以迅速发展起来的总同盟为中心的工会组织的战斗化，日本农民协会的战斗化，以新人会、建设者同盟为中心的学生运动的发展，在反对过激社会运动取缔法等三大反动法律的群众斗争中，反对出兵西伯利亚（不干涉俄国运动）和救援俄国饥荒、承认苏俄的群众运动的高涨以及水平社运动的发展等一系列斗争中，都经常有共产主义者进行工作。此外，在以1922年9月总工会成立大会为顶点的工人阵线统一运动、反对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的斗争中，共产主义者都起了领导作用。又于1923年4月，把原有的《社会主义者研究》、《前卫》、《无产阶级》三杂志合并一起，出刊了党的机关刊物《赤旗》。（7月改称《阶级战》，9月大地震时停刊）。

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指导理论是所谓“山川主义”。山川均在党机关刊物《前卫》1922年8月号发表的论文《无产阶级运动

的方向转变》，对当时的运动产生了极大影响。这篇论文的意图是将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1921年6—7月）决定的“到群众中去”的口号具体运用于日本，它起到使日本运动群众化并使之前进发展的作用，同时在另一方面由于它还存在着山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缺点，因而使运动的发展受到限制。山川论文有这样的主张

> “日本无产阶级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的第一步首先是作为先锋的少数人彻底使自己的思想纯洁化。因此少数精干分子就先于大多数群众而前进，这时就有被敌人把他们同广大群众隔断开来的危险。于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第二步，就必须是作为先锋的少数人带着彻底纯洁化的思想重新回到远远落到后边的群众中去。……‘到群众中去！’必须成为一个新的口号。”
>
> “我们的运动是以群众的现实要求为基础的。……对无产阶级群众当前的改善生活的运动，必须予以更大的重视。”
>
> “正如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是集中和综合经济上的统治一样，工人农民的经济斗争的集中表现也不外是政治斗争。……我们在反对资本家剥削和权力统治的一切战线上，必须采取积极斗争的态度。……政治上的反抗才是真正的积极战术。”

这样山川的论文就提出“到群众中去！”、“进行政治斗争”口号，要求以前的运动“转换方向”。这种主张，在批判日本过去运动的缺点即在批判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宗派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非现实的、否认政治的观点方面，是有很大积极意义的。

但在另一方面，这篇论文对日本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根本任务，即建立一个以“废除天皇制”为当前任务的革命党的这一任务，却加以回避或采取暧昧态度。在这里，它只说了“到群众中去”这样一个片面的真理，停留在主张一般政治斗争上，忽视了把群众组织到革命中来以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这一先锋队的根本任

务。这一点是脱离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决议精神的，也是脱离《日本共产党纲领草案》精神的。论文没有明确指出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性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建设在工人群众之中这样一个迫切任务，这里就包含一个为社会民主主义、合法主义开辟道路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尾巴主义的缺陷。也就是说，共产国际决议和《纲领草案》的革命内容被山川的论文抽去了精髓而灌进了水。

可是，这个"方向转换论"正是当时以山川均为理论领导者的日本共产主义者共同的弱点的表现。山川均后来走上左派社会民主主义者的道路，而日本共产党在成长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前进道路上不得不经过一段克服山川主义的艰苦斗争。

1923 年 6 月，发生了对日本共产党第一次大逮捕，有几十名党员入狱。接着在 9 月 1 日的关东大地震当中，统治阶级为所欲为地实行残酷的白色恐怖。无政府主义者的领导人大杉荣夫妇惨遭杀害，许多侨居日本的朝鲜工人被残杀。还有以站在战斗的工会组织最前列的"南葛工人会"的河合义虎为首的八名战士和有长期斗争经历的平泽计七等人在龟户警察署惨遭杀害。河合义虎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曾任共产主义青年同盟首任议长。狱中的共产党员也面临生命危险。日本已经组成共产党这一事实和天皇制政府的血腥镇压，给阶级运动各营垒以极大冲击。它鼓舞战斗的工人奋起斗争，与此相反，站在"反共产主义"立场上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则开始更加有意识地纠集起来。

共产党本身也在这次大镇压中受到深刻影响。在处于反动攻势下的日本客观条件和工人阶级觉悟不高的现状之下，党的领导人中间产生了以非合法的共产党在日本条件尚不成熟为论据的"解党主义"，于 1924 年 3 月，召开了有部分领导人参加的会议，竟作出世上少有的自动"解党"的决议。这种"解党"主义的思想根源是在"现实主义"的名目下公开采取改良主义立场的赤松

克腾的“科学的日本主义”，同时还有山川均的自然成长理论和共同战线党论（组织一个工人、农民等各阶级混合一起的合法政党）。解党决议暴露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尚未成熟。共产国际没有同意日本共产党的解散。渡边政之辅、市川正一、德田球一等革命党员以“善后整理委员会”的名义着手党的重建工作。

共产国际在1924年6—7月召开的有日本代表参加的第五届大会上，明确指出日本共产党解散的错误，通过强调重新建党的决议。继而在1925年1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和日本代表参加的上海会议上，通过了深刻批判日本共产党错误的决议（“一月提纲”或称“上海提纲”）。

“日本现在没有一个把全部共产主义者集中起来的组织（共产党），这对日本的革命运动是个很大的危险。而现在日本的同志已坠入待运动取得相应的自发成长之后再行建立共产党的机会主义之中。如果不粉碎这种机会主义则日本的革命决不能前进。”

“日本共产党原先的领导人唯心地抽象地玩弄马克思列宁主义，缺乏正确的共产主义知识……他们有的只不过是实际上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毫不相干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

“不知道用革命战术去领导群众，不知道把党建立在群众基础之上，因此只能靠个人关系集聚党员。而且也没有从斗争中总结出来的纪律。”

“由于党的领导人对群众的错误领导和对工人运动、政治生活等一切重要问题的消极态度，党在群众中孤立，落后于群众。”

在一月指示的基础上，进行了日本共产党的重建工作，从1925年9月起开始发行合法的机关报《无产者新闻》，到了1926年12月，终于在山形县五色温泉召开了重新建党大会。但是，重建起来的日本共产党的指导理论却是“福本主义”。也就是说，作为山川主义的批判者犹如彗星一样出现的福本和夫的理论，转瞬间在以共产党为首的左翼阵营中风靡一时。山川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合法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局限在思想宣传范围内，丧失了领导战斗

的工人群众向政治斗争前进的能力。在山川主义走向穷途而破产的时刻产生了福本主义。

专门学校外语教师出身的知识分子福本和夫，带回留学德国时学到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知识，给左翼理论战线带来新风。他最初在《马克思主义》① 杂志1924年12月号上发表了题为《论经济学批判中的马克思〈资本论〉的轮廓》，紧跟着又接连发表了《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同年2月)，《经验批评主义的批判——批判河上肇博士的〈唯物史观和因果关系〉》(同年3月)，《欧洲无产阶级政党组织问题的历史发展过程》(同年4、5、6月)、《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同年7、9、11月)，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最后于1926年2月在《马克思主义》上，以北条一雄的笔名发表了《必须从扭转山川氏的方向转换论开始》(5月号刊载续稿)，尖锐地批判了山川主义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实质。

在当时以翻译和解释为主的左翼理论战线上，福本以大量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方式论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同时还进一步用新颖的方法提出这些理论具体运用于日本历史和现实时所产生的重要问题来引起人们的关注。不过，福本主义的中心内容是"分离、结合论"。福本以列宁在《做什么》中提出的原则

---

① 《马克思主义》杂志创刊于1924年5月。它的宗旨是："本刊完全是一种研究性质的。但是，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阶级斗争的理论，与现实社会主义的要求相脱离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是不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刊的研究尽可能不脱离实际运动，努力使之成为战斗的无产阶级的血和肉。"

《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共产党的理论机关刊物，一直到1929年4月因四一六镇压(后述)停刊为止，共发行五十六期，在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上起了很大作用。该刊介绍列宁、布哈林以及其他身居领导地位的理论家的著作。同时，还有高桥贞树、西雅雄、市川正一、志贺义雄、德田球一、林房雄、佐野学、渡边政之辅等人在该刊展开理论工作。然而，该刊的一个特点是在开始一段时间里山川主义理念占支配地位，从福本出现后一直到二七年提纲批判福本为止，则是福本主义统治的时期。

福本不仅在《马克思主义》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从1926年5月起，他还发行了个人杂志《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大力展开写作活动。

为依据，他自己提出了在用马克思主义去组织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时，也就是在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时，“在结合之前首先必须使之断然分离”的主张。在这里，他尖锐地批判了山川主义，提出山川主义是模糊先锋队独立性的尾巴主义、机会主义的取消论、无原则的共同战线党论，因而是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折衷主义。福本看起来是一针见血地提出了先锋队的问题，这一点受到对山川主义抱有不满情绪并苦于解党状态的革命分子的欢迎。福本还主张把“打倒绝对专制政治”作为战略目标。不过福本在这里所要实现的实际内容只限于“获得政治上的自由”，还缺少通过工农联盟建立工农政权这样的明确规定。虽然如此，这个主张还是与1922年《纲领草案》提出的通过“废除天皇制”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点具有同样意义而被接受下来，所以它的革命主张受到欢迎。

但是，福本主义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唯心论。福本为了把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先行割裂再使其结晶，提出“将不能不暂且局限于理论斗争范围之内”。福本在和列宁写《做什么》一文时的俄国形势完全不同的日本，具体地说，也就是在把一度建成但又解散的党重建起来，使之同群众斗争相结合，并通过党的领导，在革命工人中扩大和加强党的队伍，这已成为当前主要任务的情况下，福本主义却企图使马克思主义者的活动局限于“理论斗争”，使党降低为一个单纯的思想理论团体。结果，“分离结合论”机械地被灌输到工会等群众团体内部，把党和群众团体混同起来，从而使当时必须首先统一起来的群众团体，由于思想上理论上的对立而一直分裂下去。由此可知，福本主义是山川右倾机会主义的矫枉过正的左倾宗派主义，他们在脱离马克思主义这点上是共同的。

而福本通过“理论斗争”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取得“整个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观念”，企图把工人农民以及其他“整个无产阶级”一包在内集中到政治观念上来。这和作为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理论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貌合神离，似是而非的。另外，在福本看来，领导这种"理论斗争"是革命知识分子的任务，革命知识分子首先努力取得"整个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观念"，然后再把它灌输到工人农民等整个无产阶级中去。这就是他设计的程序。因此可以看出，福本所主张的"主体的建立"并不是建设共产党的意思，实质上说的是建立革命知识分子的思想理论集团。于是就出现了擅长"理论斗争"的革命知识分子掌握党和群众团体领导权的现象。

可是，用来自马克思列宁的大量引文和特殊的文体郑重地武装起来的福本理论受到革命工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热烈支持，取代山川主义而成为重建起来的共产党的指导理论，于是出现了到处放起批判"折衷主义"的"理论斗争"之火的"福本时代"。在1926年12月的共产党第三次大会(重建党的大会，在五色温泉召开)上通过了按福本主义制定的战略、战术。

清算山川主义、沿马克思主义正确轨道前进的原则，本来应该按着共产国际早在1925年就已提出的"一月提纲"(上海提纲)和以此为依据发出的"工会运动的基本方针"("上海五月提纲"或称"赫拉提纲")以及"政治提纲""组织提纲"(8月)确定下来，但由于日本的共产党人未能在实践中掌握它，于是福本主义才风靡一时。后来，福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左倾宗派主义在现实中破产，在实践运动方面不得不加以部分修正的趋势逐渐有所加强，但是，对它的根本清算，还有待于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制定的"二七年提纲"。

在山川主义走上绝路，福本主义取而代之的过程中，在其背后与两者密切有关，阶级斗争正在激化，工会也在革命化和分裂化，建立合法的无产阶级政党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集结也正在进行。由于共产党的建立及其影响的扩大以及镇压和震灾时的白色恐怖，使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自我意识逐渐明确起来，并且从组

织上开始集结。1924年4月，安部矶雄等人组织了“日本费边协会”。1925年3月制定“治安维持法”和通过“男子普通选举法”，这种“皮鞭加糖块”的政策更加剧了上述倾向。治安维持法是特为取缔共产主义运动而制定的法律。普通选举法的实施不但未能造成提高工农群众政治意识的机会，反而把他们引上了议会主义道路。

工会运动领导人的“现实主义”化倾向更加明显了。尤其是在总同盟内部，从战斗化的基层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共产主义工人同铃木文治、松冈驹吉等右翼干部之间的对立激化了。结果，成为我国工会运动核心力量的总同盟终于在1925年5月彻底分裂为右翼的总同盟（包括三十五个工会，一万四千人）和左翼的日本劳动组合评议会（包括三十二个工会，一万二千人）两大势力。评议会的成立标志着工人的革命化和共产党影响的扩大，评议会站在整个工人阶级的最前列英勇战斗，为我国工人阶级树立了革命传统。然而，总同盟的分裂则使一个把统一看作无比重要的群众团体在政见分歧和思想对立的基础上实行分裂，这成为日本群众运动恶劣传统上的不幸的先例。处于瓦解状态的共产党，尽管有国际的领导，也无力防止这次分裂。

随着普通选举法的施行，组织合法的无产阶级政党，把高涨的工人农民劳动群众的政治斗争公开组织起来的运动也有所发展。但由于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宗派主义和反共产主义，再加上共产主义力量薄弱，建立全国性的单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计划终告失败，1926年，出现了劳动农民党、社会民众党、日本劳农党左中右三种倾向的党，这些党各自以工会、农会为背景而处于互相分裂互相对立的状态。劳农党受地下共产党影响比较大，始终采取战斗态度，而社民、日劳两党则顽固地坚持其反动路线，向工农群众兜售合法主义、议会主义、天皇主义，以阻止他们革命化。

四　为同群众斗争相结合而奋斗——从二七年纲领到三一年政治纲领草案

1927年7月15日，共产国际常务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日本问题特别委员会起草的《关于日本的提纲领》(称为《二七年纲领》)。日本的福本和夫、德田球一、渡边政之辅、锅山贞亲、高桥贞树等人代表共产党参加了纲领的起草工作。二七年纲领在日本马克思主义史上，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献。它是前述二二年纲领草案内容的进一步发展，同时，纲领彻底批判了福本主义、山川主义的左、右倾偏向，从而成为重建起来的日本共产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轨道前进的里程碑。共产党竭尽全力，为了实现这个纲领，一方面进行组织整顿，一方面又在《马克思主义》1928年3月号上作为附录全文登载这个纲领，以向群众宣传。

正是在这一年即1927年1月发生了金融危机，银行、商业公司停业、破产波及全国。在这次经济界的混乱当中，垄断资本展开攻势。统治阶级为了寻求摆脱危机的出路，不断图谋对外侵略，5月，悍然出兵山东，为消灭方兴未艾的中国革命和独占中国市场而疯狂入侵。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行动使远东的国际紧张局势更加剧烈。

《二七年纲领》首先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和战争"密不可分的关系和远东的战争危机。接着分析了"日本的国内形势"，指出：日本一方面由于顽固地保存着表现在地主、佃农关系上的封建制度的残余；另一方面由于工业生产异常迅速的发展和垄断资本的加强，国家政权发生质变，"现在的日本国家政权掌握在资本家地主集团(其主导权在资本家)手中。"

"因此，旧的封建形态中装进资产阶级的内容这样一种两面性过程，

以及与此并行的资产阶级向反革命势力的转化过程正在发展。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之间虽然存在着若干内部矛盾，但在抵抗工人农民运动方面，他们采取了共同行动。

"正因如此，在这种资本托拉斯化已达到如此高度的国家里，争取日本国家民主化、扫荡君主制度、从政权中排除现统治集团的斗争，不可避免地要从反对封建残余的斗争转化为反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斗争。日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以强制性的速度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重点是引用者加的）。

"在日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客观条件（国家政权结构中的封建残余和农民问题的极端尖锐）和向社会主义革命强行转化的客观条件（资本集中、高度的康采恩化、国家和托拉斯的紧密融合、在更大程度上接近于国家资本主义体系、资产阶级和封建大土地所有者的联盟和集团）都是具备的。"

然后，二七年纲领一针见血地指出，同日本革命的客观形势相比，其主观条件是非常落后的。"日本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人和农民的联盟。为了结成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政治联盟，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共产党及其作用"具有决定性意义。

"日本共产党领导机关的主要错误之一在于：不理解并忽视共产党的作用，另外还忽视党在工人运动中的特殊作用。即便有一点点以工会组织的左翼支部（左翼）或以一个广泛的工农政党代替共产党的想法，也是根本的错误，是机会主义。没有一个独立的、思想上经过考验的、有纪律的、中央集权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决不会有革命的胜利。

"正因如此，反对一切取消主义（解党主义——引用者）倾向的斗争，具体说就是反对星同志（山川均）路线的取消主义倾向的斗争，是日本共产主义者最紧急的任务。……

"所以，今天日本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共产党的质和量的发展。党必须为提高思想和政治水平而进行不懈的工作。同时，党应当具有最广泛的群众性，把日本无产阶级中的一切进步因素和革命因素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为一步一步地取得和巩固党在日本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而努力奋斗。"

要想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共产党，“在目前条件下，不通过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共产党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对日本来说也完全如此。”纲领接着分析批判了日本的社会民主主义。

其次，论述了“共产党和工会、共产党和工人群众性组织、统一战线等问题。”在这里“强调了必须迅速而彻底地清算”山川主义，同时对福本主义进行了细致而深刻的批判。

> “如果说采取把共产党溶化为左翼工会运动的方针是错误的，是致命的错误，那么，采取使党在无产阶级群众性组织中孤立起来的方针也同样是错误的。黑木同志（福本和夫）提出的“分离结合”理论，实际上就是这种路线的基础。它同列宁主义是完全矛盾的，根本矛盾的。黑木同志（福本）不去分析日本共产党面临的具体任务和由历史决定的解决这一任务的方法，而是从人为的、任意勾画的抽象图式出发；不努力弄清现实情况，只满足于提出并玩弄理论范畴的游戏。”
>
> “必须认为黑木（福本）同志采取的使工会机械地政治化的方针，是绝对错误的。产生这个方针的基础是对于政党和工会组织之间的差别毫无理解。他是试图以此代彼。”
>
> “导致党在群众中完全孤立的黑木（福本）同志的观点，将导致群众性政党共产党的真正毁灭。他的‘分离结合理论’的形成是和过分强调纯思想因素和完全忽视经济政治以及组织因素分不开的，因而也不是偶然的。这种思想必然导致过分重视知识分子、脱离劳动群众、宗派主义，认为党是‘一群用马克思主义进行思索的人’——当然主要是知识分子集团，而不是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今天，日本共产党必须坚决埋葬这种甚至黑木同志本人都已抛弃了的玩弄列宁主义词句的讽刺画。”
>
> “共产党必须清算过去给党带来不幸的根源——党领导机构所犯的一切主要缺点，也就是必须彻底清算他们的宗派主义思想。必须接触群众！这个口号现在对日本来说实在是必要的。”

《纲领》详尽地阐述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日本具体条件下日本共产党的任务，并明确了过去在理论领导和实际工作中的偏差和缺点。二七年纲领最后提出了十三项行动纲领和口号。

一、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危险的斗争

二、不许干涉中国革命！

三、拥护苏维埃联盟！

四、殖民地完全独立

五、解散议会

六、废除君主制

七、十八岁以上男女有普遍选举权

八、集会自由、结社、团结的权利、言论出版自由

九、每日八小时工作制

十、失业保险

十一、废除一切镇压工人的法令

十二、没收天皇、地主、国家和寺院的土地

十三、征收累进所得税

"这些具体要求和口号必须和建立工农政府的口号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结合起来。"

在二七年纲领的指引下，日本共产党开始展开真正的革命活动。在工厂的基层组织基础上开始建立党组织，在原有的合法机关报《无产者新闻》之外，又创刊了中央委员会的非合法机关报《赤旗》。《赤旗》报从 1928 年 2 月 1 日到1935年 2 月20日共出了一百八十七期，这期间，由于不断遭受镇压而不得不有所中断，但还是从油印发展为铅印，最盛时期每日能出六期，它在领导阶级斗争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起了巨大作用。

二七年纲领推动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日本实际的理论研究。在这以后，日本的马克思理论得到飞跃发展，具体分析日本的历史和现实，为革命战略战术提供科学理论基础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最先是渡边政之辅、市川正一、佐野学、高桥贞树等，对形成日本资本主义出发点的明治维新的意义进行了研究，通过对构成封建制核心的寄生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分析，论证了农业革命的必然性，解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从理论上说明了向社会主义革命迅速转变的必然性，这些创造

性研究成果都陆续发表在《赤旗》、《无产者新闻》、《马克思 主 义》上。

这期间，"产业劳动调查所"（产劳开始对日本资本主义现状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工作。产劳是1924年3月在总同盟支持下由野坂参三主持成立的，主要研究人员有高桥龟吉、猪俣津南雄、志贺义雄、野吕荣太郎等。发行机关刊物《产业劳动时报》（1925年8月创刊），主要成果有：《社会问题讲座》（全十三卷，1926年3月—1927年6月）每卷刊头载有日本政治经济现势图表，《无产者政治必携》等。此外，野吕、猪俣等人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对当时作为日本资本主义研究的开拓者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的高桥龟吉拥护日本帝国主义的理论《弱小帝国主义论》展开了批判（《弱小帝国主义论》论争，1927年）。通过这次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对日本资本主义的研究都有所发展。

此外，由大山郁夫、河上肇主编的《马克思主义讲座》（全十三卷）于1927年11月—1929年3月出版，从中产生了野吕荣太郎的《日本资本主义发达的历史条件》和服部之总的《明治维新史》等优秀著作。《列宁著作集》（从1926年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8—32年）、《斯大林、布哈林著作集》（1928年开始）等系统的翻译工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普及起了很大作用。再有，河上肇、栉田民藏等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方面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共产党制定了对工人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的计划，这个计划虽然未能立即实现，但在高桥贞树写的"工人教育大纲"中，阐述了教育方式，并列举十六项教育内容，刊登在《马克思主义》1929年3月号上。十六项内容是：一、工人运动史；二、经济学；三、俄国共产党；四、党组织论；五、帝国主义和世界革命；六、列宁主义；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八、唯物史观；九、日本研究；十、日本

共产党史；十一、工会论；十二、农业问题及农民运动；十三、殖民地问题；十四、宣传鼓动；十五、军事研究；十六、中国大革命。

这样，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便开始迅速发展起来，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战线发生了深刻的分裂。即所谓"劳农派"的出现。

由于山川主义受到福本主义的批判，共产党丧失了理论上的领导地位。后来福本主义（同山川主义一起）受到二七年纲领的严厉批判，反对福本主义的堺利彦、山川均、荒烟寒村、猪俣津南雄、大森义太郎等便乘机联合一起，声称创办一个"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刊物"、"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杂志"，遂于1927年12月，创刊《劳农》。其共同的基本立场是，反对二七年纲领，把当前日本革命的战略方针规定为"以打倒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劳农派"拒绝回到共产党内，反对共产党的一切政策。这时，以渡边政之辅为首的共产党的理论家与"劳农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战略论争"。论争的中心问题是同绝对主义天皇制展开正面决战，还是回避它。因此，共产党在1928年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会议上作出了关于"劳农派"的决议。市川在《日本共产党斗争简史》中这样写道：

"于是，称为'劳农派'的左派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一些先辈们，现在已经打上了国内的阶级背叛者和国际上的叛徒的烙印，决定把其中的一些人开除出党。"（国民文库版，第127页）

处于非合法地位的日本共产党在1928年2月第一次普遍选举①中，通过劳农党提出十三名候选人，大胆开展公开的宣传活动，使群众知道党的存在，从而开始产生影响。对此，田中内阁发动了三·一五大镇压。三月十五日清晨，在全国各地共逮捕一千数百名共产党员、战斗的工会会员、农会会员，并以违犯治安维持法之名起诉八百二十八人。以前，治安维持法规定的最高刑期是十

① 1928年2月20日举行的第一次普遍选举中的众议院总选举。——译者

年徒刑，现在则根据紧急敕令(6月29日)极其恶劣地改为可处死刑。三·一五事件是企图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发动反革命侵略战争的天皇制政府，为了镇压因1927年的金融危机而激化的国内阶级斗争，推进战争准备体制，而对工人阶级司令部日本共产党发动的一次疯狂进攻。4月10日，发布了解散劳农党、评议会、日本无产青年同盟"三个左翼团体"的命令。继而于翌年1929年4月16日又进行大镇压(四一六事件)。由于接连不断的大检举，日本共产党有经验的领导人都被逮捕下狱，但免遭逮捕的党员相继起来重新组织领导机关，在高涨的阶级斗争的发展中，使组织比以前更加扩大，影响也更加强。但是，由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小资产阶级的急躁性，又犯了宗派主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由此而产生的组织遭到破坏、干部入狱和不能及时总结教训等一系列结果，使创造性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进程停滞甚至倒退了。

为了把工人农民高涨的政治热情集中发挥起来并为群众政治斗争提供基地，大山郁夫、细迫兼光等发起重建合法的劳农政党运动，但是共产党对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未能以一贯的态度相对待。新"劳农党"于1929年11月成立了，可是共产党对其活动，有时支持，有时反对，动摇不定，因而引起混乱。这正是党的宗派主义导致的恶果。

1928年12月，"日本工会全国协议会"(全协)成立，它继承了前此解散的评议会的战斗传统，并作为工会国际(红色工会国际)的支部，加强国际团结，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共产党虽然领导了全协的活动，推动了工人的组织化和战斗化，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它混淆了党与工会的界限，使全协政党化，推行盲动主义的策略，反而使自己孤立于劳动群众之外。

1929年秋，从美国开始发生的全世界经济危机宣告了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的结束，总危机第三期"战争和革命"时期开始到

来。这时，日本资本主义还没有从金融危机的打击下恢复过来，现在又一次受到更加猛烈的危机的袭击，在产业"合理化"的名目下大批解雇工人，日甚一日地加强剥削；来势猛烈的农业危机把农民赶到死亡线上。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各地不断发生激烈的罢工和地租争议。对于这个形势，主观武断为"革命即将来临"的共产党全协领导机关，作了这样的估计："不仅是群众性政治斗争的客观条件，即其主观条件也已具备""工人阶级对日本资本主义的最后进攻"已经开始，采取了激发"最快"的总罢工的强行策略，鼓吹"群众性的武装行动"、"红色恐怖"等等极左策略。1930年的五一节行动就是它的顶点。4月25日的《第二无产者新闻》号召"把五一行动带进议会去！带到工厂区去！"

> "5月1日的街头是属于工人的。……在今天这样的紧迫形势下用葬礼式的游行，是不能训练出工人队伍的。打到议会和开工的那些工厂去，让那些家伙们胆战心惊。不要怕和官宪军警发生冲突。只有英勇战斗才能大大提高左派影响。只有社会民主主义者才站在街垒的远处暴露他们的真面目。"

党在东京市、京滨地区组织了一百多人的武装行动敢死队，在冲向大工厂、小作坊的途中高喊"让狗官们吃一下红色恐怖的排枪"，以号召工农群众"全体武装"。五一节当天，川崎市的武装行动队和武装警察队"展开了匕首、锤子、铁锉的战斗"，造成几名重伤（《无产者新闻》）。这种对主观条件作了错误估计的盲动主义、极左冒险主义，使党和革命工人脱离了群众，给运动带来损失。另外，还把革命团体的全协看作党的从属物而以官僚主义态度任意加以摆布，这种作法，引起全协内部组成反对派"刷新同盟"（1930年6月），由于这些派别斗争和分裂所带来的混乱，全协力量为之削弱。

另一方面，屈服于接二连三的残酷镇压的右倾机会主义份子

结成"解党派"，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三.一五事件入狱的水野成夫、浅野晃、门屋博、村尾萨男等人，在狱中主张支持天皇制和脱离共产国际，因而被开除出党。而天皇制政府则让他们取保出狱，用他们充当从运动内部进行破坏的工具。这些人于1930年6月，组成一个名为"日本共产党工人派"的内奸集团，公开反对共产党。

对于给运动带来如此严重损失的上述左右倾偏向，共产党和全协领导机关在共产国际和工会国际（1930年8月，第五次大会特别研究了日本问题）的帮助下，通过"自我批判"和解散"刷新同盟"，进行了整顿。然而，这种在日本革命运动史中有着很深根源的思想倾向，是不可能立即根除的。左倾偏向又在后来党领导机关制定的日本革命基本战略转变的新方针中表现出来。这就是人们熟知的"三一年政治纲领。"

《政治纲领草案》是1931年1月由风间丈吉为中心重新组成的中央领导机关起草的，大致经过全党讨论，从1931年4月起分四次发表在《赤旗》上。后又在6月15日的《赤旗》上，刊登了党中央委员会的《为发表政治纲领（草案）告革命工人》一文。该文对二七年纲领的评价是，它"在党史上"起了"不可磨灭的"伟大作用，但同时又断定"尽管如此，这个所谓七月纲领（二七年纲领）含有势在必作根本修改的性质。而对日本资本主义现状的错误估计则是它的关键所在。"

政治纲领草案指出：

> "银行、工业、矿山等的实权掌握在三井、三菱、安田、住友等财阀手中。这种集中化甚至超过德国。……经济领域中的统治地位保证了它们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日本的国家权力掌握在握有金融资本霸权的资产阶级地主手中。……天皇制现在成为以金融资本为首的统治阶级对工人农民等被剥削劳动群众实行法西斯镇压和剥削的工具。这个时期的基本阶级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

因此，"这一切都使日本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条件迅速地成熟着"。而另一方面，在农村，普遍存在着所谓"土地归农民"的农民农业革命的任务和为之进行的斗争。所以，即将到来的日本革命性质是"包括广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在内的无产阶级革命。"（着重点为引用者所加）

在确定革命性质上有所改变，因而改变了对革命动力和同盟军配备的估计，也使当前的斗争目标和基本口号有所改变。基本口号变更为如下五条：

（一）消灭金融资本专政，打倒以金融资本为首的资产阶级地主天皇制政权；

（二）银行、工业、矿山、交通运输机构的无产阶级国有化；

（三）没收天皇、大地主、官公所有土地、寺院土地，分配给劳动农民；

（四）朝鲜、台湾等殖民地完全独立；

（五）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支持苏维埃联盟和中国、印度的革命。

政治纲领草案是以曾在莫斯科受到共产国际和工会国际影响的风间丈吉为中心在日本国内起草的。这个纲领之所以能从根本上改变二二年纲领草案、二七年纲领的基本路线，其背景是总危机所引起的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和这一时期金融资本统治的加强。政治纲领草案强调了这一面，并只根据这些因素来确定日本革命的性质。这在主观意图上虽然和从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性确定革命战略的劳农派不同，但在结论上都是一致的。客观上它陷入了回避打倒天皇制的斗争的机会主义之中。

共产国际并没有承认其支部日本共产党制定的纲领草案，而是在慎重地研究了日本形势后，制定了"三二年纲领"这个新的方针性文件，用以代替政治纲领。

五　反对战争和法西斯狂潮——从三二年纲领到人民阵线策略

1931年9月18日夜，发生了"满洲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因总危机而尖锐化的资本主义固有危机，企图以武力攫取对中国市场的独霸统治，把尖锐的国内阶级斗争引向排外主义。因此，它也是一次企图阻挠中国革命发展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战争。日本发动军事行动加剧了同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紧张状态，使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战争更加迫近。日本人民和中国以及亚洲各民族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苦难的战争岁月。在这种形势背景下，特别是由于存在着半封建的地主制度，农业危机倍加深刻的农村，形势尤为不稳，企图把国家引上法西斯道路的反动分子采取恐怖手段，大肆活动，而军部内的"急进"分子，则不断策划政变，以期建立军部独裁（三月事件、十月事件、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等）。对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和全国人民一道反对战争，反对天皇制暴力政治、特别是军部法西斯的斗争，已成为中心任务。

《三一年政治纲领草案》忽视了农村中封建残余的特有意义，未能说明天皇制为挽救日本资本主义危机而站在侵略行动最前列的罪魁作用。由于这一点，它在事实面前破产了。共产国际在片山潜、野坂参三等驻莫斯科的日本代表参加下，明确指出"政治纲领草案"的错误，制定了新的纲领，1932年3月，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主持东方部的库西宁作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日本革命的性质"的报告，同月出版的《国际共产主义》杂志，发表了分析、规定"日本形势和日本共产党的任务"的文章。后来又在此基础上，于同年5月，由共产国际西欧局制定了"关于日

本形势和日本共产党的任务纲领”（三二年纲领）。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无条件承认了三二年纲领，并在当年2月10日的《赤旗》报特刊上全文发表。

库西宁的报告批判“政治纲领草案”的“无产阶级革命”论是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三二年纲领》清算了《政治纲领草案》的“左”倾错误，恢复了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为当前战略的“二七年纲领草案”的原则。不仅如此，它在深入分析天皇制的意义及作用方面也前进了一大步。而且在分析急剧发展的战争形势和制定反对战争的策略方面也有所发展并且更为精确。因此，可以认为“三二年纲领”彻底批判了回避反对天皇制斗争的劳农协和解党派，为反对国粹主义、排外主义、军国主义提供了战斗的思想武器，为共产党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密切联系劳动群众，指明向反战、革命道路前进的方向。

三二年纲领从“日本帝国主义与战争”问题写起，接着指明了共产党必须全力开展反战斗争的任务，最后分析了日本国家政权，说明了“当前革命的性质”。

日本的统治体制是由：一、天皇制、二、地主土地所有制，三、垄断资本主义这三个成份构成的，“在估计日本的具体形势时，首先必须从重要的一点即天皇制的性质出发。”

“日本的天皇制一方面依靠寄生的封建的地主阶级，一方面依靠贪得无厌的资产阶级，并同这两个阶级的上层结成极其紧密的世袭性集团，以相当的灵活性代表着这两个阶级的利益，同时又保持着它的相对独立作用和用一点点貌似立宪形式掩饰起来的绝对主义性质。……天皇制是国内反动政治力量和一切封建残余的支柱。天皇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剥削阶级巩固其专政政权的顶梁柱。必须认识到粉碎它才是日本革命的第一位重要任务。”

“因此，日本当前的革命性质可以规定为具有向社会主义革命强行

转变趋势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着重点是引用者加的）

然后提出了现阶段的行动口号六条：

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

二、打倒资产阶级地主天皇制，建立工农苏维埃政府；

三、由农民无偿没收全部地主、天皇及寺院的土地，勾销农民向地主、高利贷、银行的全部借款；

四、实行七小时劳动制，彻底改善工人状况，实现工人阶级组织工会和工会活动的自由；

五、殖民地（朝鲜、满洲、台湾等）从日本帝国主义羁绊下解放出来；

六、保卫苏维埃联邦和中国革命。

“共产党的中心宣传口号应当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警察制的天皇制，为获得粮食、土地和自由、为建立工农政府进行人民革命’。”

而这个革命的推动力量则是无产阶级和贫农、中农。

上边这些就是三二年纲领的中心内容。

根据这个纲领，日本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反战斗争——这正是建党以来的传统，日本无产阶级光荣的革命传统。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反对侵略战争，在各地组织反战示威游行，在军事工厂发动罢工，指导劳资争议和反战斗争相结合，在兵营、军舰内部还建立起共产党组织。党员人数有所增加，为了加强机关刊物的工作，把“第二无产阶级新闻”（《无产者新闻》出到238期于1929年8月停刊，从9月起发行合法的《第二无产者新闻》，到1932年3月，发396期）合并于《赤旗》。从1932年4月《赤旗》第69期起改为铅印，每月发行六期，版面内容有了显著改进。这个时期成为战前共产党活动的极盛期。

由于共产党活动的加强，党在文化活动、理论工作领域中的影响大有增长，拥护马克思主义，并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积极展开活动的知识分子空前增加。

广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化和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批

判，形成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高潮 以1921年《播种人》的创刊为起点，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就已伴随工农群众的阶级斗争发展起来。在"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1925年12月)、"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1926年11月)等组织活动的基础上，1928年3月建立了"把无产阶级的艺术带给整个无产阶级作为自己任务"的"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纳普)，发行了机关刊物《战旗》(5月创刊)。纳普在"日本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纳瑞普)为首的创作、戏剧、电影、美术、音乐、摄影等各文艺领域里，开展了以"艺术活动的布尔什维克化"为目标的、把"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理论贯彻到实践中去的活动。纳普是同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工农艺术家联盟"(机关刊物《文艺战线》)相对立的。

1930年8月，出席莫斯科召开的工会国际第五次大会的藏原惟人归国后，根据大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及教育组织的作用和任务的纲领"而展开的文艺理论，基本上指导着纳普的运动方向。在这里，藏原批判了纳普过去的非政治主义、文化主义倾向，指出它在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是软弱无力的，他以明确区别于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的共产主义观点，要求纳普成员不要写完全脱离"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需要"的题材。这样，无产阶级文化便被纳入革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来，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开始了卓有成效的活动。

1931年10月，纳普解散，成立了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统一的联络协议机关"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卡普)，并发行机关刊物《无产阶级文化》。卡普的宗旨是"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文化"。

在疯狂镇压的风浪中，纳普和卡普支持知识分子的反战反法西斯斗争，在小说、戏剧等所有文艺领域里，出现了许多优秀成果。从中出现了文艺评论的藏原惟人、宫本显治，以及小林多喜二、宫

本百合子那样的革命作家，柳濑正梦那样的优秀漫画家。但是，随着基本部队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有组织的斗争在疯狂镇压下遭受破坏，文化运动也进入了低潮。从 1932 年 3 月的文化战线大逮捕以后，又有几次镇压，从 1935 年前后开始，有组织的活动陷于停顿状态，并倒退到"转向文学"时期。

"三二年纲领"对于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也是一个研究工作的准则，并为他们提出课题。革命的理论家拥护纲领，并以它为科学根据同心合力开展研究活动。成为他们活动据点的组织是"产业劳动调查所"（产劳）和"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普罗科）。

"产劳"在1928年以后是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调查机关而开展活动的，除发行《产业劳动时报》（1925 年 8 月创刊，1929 年 6 月复刊）和《国际共产主义》（1927年 2 月创刊）外，还发行了许多调查资料，在研究外国和日本的工人农民运动的客观及主观条件等基础工作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直到 1933 年 5 月因大检举而被破坏为止，它培养出志贺义雄、野吕荣太郎为首的许多理论家和调查活动家。

"普罗科"是《马克思主义》杂志在四·一六事件镇压中被破坏之后成立的理论家团体，它是 1929 年 10 月作为"负责各种学科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发表"的共同研究机关而成立起来的。除机关杂志《无产阶级科学》外，还刊行许多单行本和讲座，它在研究日本资本主义方面作出很大成绩。此外，还在吸取外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把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扩展到历史、艺术、自然科学、哲学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从1932年起，还把重点放在开展群众性科学运动上，在工厂、农村、学校建立起研究小组，使它们同专门研究人员结合起来，以重新组成"日本无产阶级科学联盟"（1933年 1 月正式成立）。"普罗科"于 1933 年秋因受镇压而陷于解散状态，但它为科学运动大众化所开展的活动，则是引人注

意的成绩。

上述有组织的研究活动所取得的最大成果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讲座》(全七卷,1932年5月—1933年8月出版)。《发展史讲座》是在岩田义道、野吕荣太郎的领导下开始编写的,其目的是"对日本资本主义的条件、它的本质特征、它的各种基本矛盾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根本性的研究",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合作的产物。就是说,《讲座》动员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和"产业劳动调查所"的主要人员,并有平野义太郎、山田盛太郎、大塚金之助、服部之总、羽仁五郎、小林良正、细川嘉六、山田胜次郎等人参加。由于不断受到镇压,核心人物被逮捕(特别是野吕被捕、遇害);由于应付检查而改用"奴隶语言"以及禁刊和涂改;各执笔人之间的理论不统一;再加上"讲座"写作、出版时间正值由"三一年政治纲领草案"向"三二年纲领"转变的时期,由于这一系列条件的限制,《讲座》的成果不一定是很理想的,并且也显得不统一。但是,它作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日本资本主义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分析,确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的成绩。其中尤其是在论证日本资本主义的封建性这点上,大体上是具有一致性和一贯性的,而且基本上和"三二年纲领"一致,从而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战略课题提供了科学根据,这是它的贡献。从《讲座》中,还产生了平野义太郎的《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山田盛太郎的《日本资本主义分析》(都是1934年出版的单行本)那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

"劳农派"的理论家们,如猪俣津南雄、栉田民藏、向坂逸郎等人,从他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段论立场出发,对《发展史讲座》进行攻击,"讲座派"的理论家还击了他们。"讲座派"的主要论战阵地是《经济评论》(1934年9月—1937年10月)和《历史科学》(1932年5月—1936年12月)等;"劳农派"的主要阵地是《大原社会问题研

究所杂志》(1923年8月—1933年11月，1934年7月复刊—1936年8月)和《先驱》(1935年6月创刊)，再有《中央公论》和《改造》等综合性杂志也常常为他们提供版面。这次所谓"日本资本主义论战"对日本社会研究的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的深入，有着积极的意义。特别是"讲座派"的理论家为维护"三二年纲领"的正确性而进行了深刻研究，进一步提高了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过，另一方面，因为这次论战只是在合法的学术报刊界舞台范围内进行的，并且因为几经镇压使阶级斗争进入低潮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削弱，所以这次论战应有的尖锐的党性和政治性被模糊了，最后流于同实践脱节的学究式的议论。后来对"讲座派"实行镇压(1936年6月—7月的"共产学派事件")，甚至理论论争也被暴力所扼杀。随着中日战争的爆发，劳农派也在所谓"人民阵线事件"(1937年12月，1938年2月)中被镇压。

这样，满洲事变爆发后，我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革命斗争出现了一个空前高潮，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规模和深度也达到整个战前时期的最高水平。但是，我国劳动人民没有能够阻止战争的发生，也未能打倒天皇制。这是因为共产党没能把人民的革命斗争引向胜利。而其最主要的原因，当然在于热中于侵略战争的天皇制用无以复加的疯狂镇压使党组织彻底破坏。(据司法省公布，从1928年到1934年7月间，以违反治安维持法事件而被捕的达五万九千二百四十人，其中经法律处分的达一万一千零十三人。)而从另方面看，这还由于共产党虽然也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和不屈不挠的重建活动，但并没有把自己形成为一个彻底克服宗派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粉碎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阴谋、顶住天皇制镇压的、政治上、组织上成熟的政治力量。由于多次逮捕和监禁，尤其是领导人被杀害(上田茂树、岩田义道、小林多喜二、野吕荣太郎等)，警方特务、奸细的混入造成内部混乱

和组织破坏，再加上干部叛变和派系斗争，使党遭受很大损失。

三·一五和四·一六事件的被告人197名在东京地方法院开展了日本审判史上前所未有的法庭斗争。在1931年7月7日到翌年10月29日一百几十次的公审庭上，被告人按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把法庭当作阶级斗争的战场，尽可能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表现共产党的英雄气概。市川正一在法庭上的陈述，由宣传鼓动部刊行为《日本共产党斗争简史》。这样，当大多数共产主义者身系囹圄仍战斗不懈，向工农群众发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打倒天皇制的号召的时候，共产党领导者中的一部分人却离开了战线，甚至投入敌人阵营。佐野、锅山的“转向”就是其中的最显著者。

自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担任领导工作的佐野学和锅山贞亲两人，于1933年6月7日联名发表了“转向声明书”。他们以满洲事变以来“国内外形势异常紧迫”为由，主张排外的民族主义，积极支持侵略战争，放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共产国际断绝关系，否认阶级斗争，从而向天皇制屈膝乞怜。简而言之，由于慑于天皇制残酷的白色恐怖和在军国主义狂潮中的孤立感和失败主义情绪等一系列思想上的动摇而投降了敌人。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刻开除了这两个最卑劣的叛徒。跟在他俩后面，狱中的高桥贞树、杉浦启一、三田村四郎、田中清玄、风间丈吉等干部也相继声明“转向”。据1933年7月司法省发表，全国共产党事件牵连者中，未判决的1370人中有415名、已判决的392名中有133名跟着“转向”了。这以后，从自觉地叛变到虽非本意但已逃避革命实践等各种动机、各种形式的“转向者”时有出现，出现了一个所谓“转向时代”。

当然，还是有不少像德田球一、志贺义雄那样的渡过苦难的“狱中十八年”而坚贞不移；或者像市川正一、国领伍一郎那样直到在狱中献出生命为止仍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的战士。不过，从出现

这么多"转向者"的世界少有的悲剧中，我们不能不看到，天皇制对日本人思想的统治力量之强固；排外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根深蒂固；马克思主义在日本人的思想中扎根的程度很浅。

"转向"带来的打击，再加上党内派系之争，使共产党的力量更加削弱。这时发生了所谓"多数派"问题。在党组织遭受破坏、与群众团体断绝联系、领导机关的作用削弱的日本共产党内部，意志不统一、互不信任更加严重、官僚主义横行以及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倾向等等都愈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1934年5月出现了一个叫做"夺回日本共产党中央全国代表会议准备委员会"（所谓"多数派"）的反中央的派系组织。"多数派"是党史上规模最大的帮派组织，不管其主观意图如何，它所带来的结果是用他们的双手破坏了组织的统一，使党的工作陷入瘫痪状态。共产国际在1935年第七次大会上决定对"多数派"进行批判，并为此发了题为《为争取日本共产党的统一而斗争》的文件，指出应当解散帮派组织，统一于中央委员会之下。然而这时全部党组织几乎都陷于崩溃状态。比如说，留下来的唯一的中央委员袴田里见也在1935年3月被捕，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遭到破坏。《赤旗》报也在同年2月20日发行最后一期第187期后而宣告停刊。从此以后，各地的共产主义者虽然进行了坚毅的重建工作，但一直到日本败战后的1945年为止，整整十年期间，共产党终于没有能建立起全国性的领导机关。

由于共产党的组织被破坏，革命的群众团体（全协、全农全国会议派等）和进步的文化团体相继遭到破坏，天皇制法西斯才得以顺利地走上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的道路。

1935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决定实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使这次大会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会。为了把人民战线策略运用于日本，冈野

(野坂参三)和田中(山本悬藏)于1936年2月在莫斯科联名发表了“给日本共产主义者的信”。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国内发生了推行法西斯统治过程中的具有决定性的事件陆军武装政变二·二六事件。

这封“信”在分析日本形势时指出，“对于工人阶级来说，现在最大的危险……必须与之进行决死斗争的主要敌人就是法西斯军部，这是极其清楚的。军部是天皇制机构中最反动、最野蛮的帝国主义者。”反对“军部法西斯专政危险”的斗争“是同反对金融资本和地主的斗争最紧密地联系着的。因为法西斯军部是真正代表大资本家中最反动的集团和寄生地主们的利益的。”

这封信还指出反军部、反法西斯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正在高涨。

> “反对军部法西斯专政危险的伟大人民运动形成的条件，目前在我国国内正在成熟。反法西斯的社会运动在工人阶级中正在扩大，正在集结力量。军部的权威正在衰落。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不满和摆脱困境的要求，愈来愈集中于反对过重的军费负担。在全国人民中间，尤其是在劳动知识分子中间，反对军部压制自由的斗争正在愈演愈烈。人民群众不满情绪的增长以及军部的冒险政策和垄断政权的阴谋活动，都使统治阶级阵营内部的斗争日益尖锐化。”

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二·二六事件前不几天，即1936年2月大选中，无产者政党有26名当选为议员。翌年4月大选中又增加到38名。虽然无产者政党中的最大政党社会大众党这时已经成为支持战争的党，但人民却希望这个党进行反军部、反法西斯斗争才投了他们一票。面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这封信指出：

> “把我国人民从法西斯和战争恐怖中拯救出来的道路，只能是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和以反法西斯人民战线为基础的伟大的人民运动。日本共产党的当前任务就是把一切劳动人民统一到反对军部、反对反动派、反对战争的斗争中来。”

“给日本共产主义者的信”秘密带到日本，成为共产主义者、战

斗的工人、农民、进步知识分子的行动方针。但是，这个方针并没有成为现实。诚然，这时期各工会开展过统一战线运动，知识分子也学习了法国、西班牙的经验，通过各种团体和刊物，从文化方面推动人民战线运动。然而，此时已不复有一个能把人民战线组织起来并成为它的核心力量的共产党了。各个地方虽然有共产主义者团体，也曾为建立党组织和结合群众进行过顽强的工作，但距当时形势的要求，其力量还过于软弱。因此，日本人民终于被拉进毁灭性的战争灾难之中。在中日战争（1937年7月7日）爆发那一年的年底，关西地方建立了以春日庄次郎为中心的"共产主义者团"，在其机关报《冲破风暴》、《民众之声》上，开展了大规模的反战活动，但不久即被取缔。东京、京滨地区的共产主义团体也相继被破坏。日本人民有组织的反战斗争只有在国外华北战场上由野坂参三领导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还在坚持进行中。战争是日本资本主义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可是没有能够阻止战争的发生，也确实是人民的失败。并且，日本人民没有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去结束天皇制发动的侵略战争，也大大影响了战败后日本的前进道路。

革命运动的败退、法西斯的称霸，使马克思主义停滞甚至后退。马克思主义研究活动的重点从分析日本社会现状转到研究古代史、中世史等历史方面（"历史科学"），同时，从探索具体的现实问题转到抽象的理论领域。有节操的知识分子组织活动的据点，这时是"唯物论研究会"（唯研）。"唯研"是以户坂润、三枝博音、冈邦雄为中心，于1932年10月成立的，直到1938年2月被迫解散为止，它发行了机关刊物《唯物论研究》（1932年11月创刊），编辑出版了《唯物论全书》（全五十卷）、《三笠全书》（全十六册），在艰苦斗争中，推动唯物论哲学的研究。"唯研"成员并不都是马克思主义者，随着形势的恶化，不少人动摇甚至掉队，但其中的户坂润作为一名战斗的唯物主义者，一直勇敢地、顽强地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奋战到

底，终于死在狱中。

中日战争爆发后，不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禁止发行，甚至阅读也是犯罪行为，而成为处罚的对象，不要说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就连普及也不可能了。而且在这种形势下，不只是由于研究者的变节或有意歪曲，甚至主观上虽是善意的研究成果，也难免产生偏差。正因如此，不能不认为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有一个为期十年的空白时期。这个伤痕的康复，与纠正战争时期的偏差，对战后的马克思主义来说都是困难的课题。

小　结

上面就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我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基本线索，作了概括。这里，笔者想努力贯彻这样一个观点，即不是以“解释”世界而是以“变革”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明显是不能和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斗争分开的。

对于日本人来说，马克思主义是“外来思想”。乍看起来，摄取马克思主义对于日本人好像是极其困难的，并不断反复出现错误，用它来批判、清除日本人的传统思想、感情和各种各样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也似乎没有成功。而且它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取得的进步，似乎也常常是在外国的指导下实现的（其典型就是共产国际对日本共产党的批判和领导）。我想这些都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自从马克思主义输入以后，已使日本人的思想发生变化，决不能说它在日本国土上扎根的程度是很浅的。今天，在系统地、全面地解释世界和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上，没有比马克思主义更科学的理论体系了。而且，在日本人的生活历史上，没有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在不断斗争中经受锻炼、考验，前仆后继地承担自己的事业，不惜任何牺牲去保卫、去追求

的"思想"了。

马克思主义是在近代社会阶级矛盾基础上产生的思想和运动，正因如此，那种认为日本资本主义社会是例外、马克思主义对它不适用的想法是毫无根据的。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非常尖锐，它才成为马克思主义迅速发展的丰饶土壤。历史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我想，对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弱点也有必要联系这种条件去认识。

要想对这个问题加以全面的论述，就必须弄清日本社会结构的特点和日本人的思想史的全过程。现在用一句话来说，我们必须看到由于日本资本主义的落后性和急速发展所造成的无产阶级的未成熟性，以及同欧洲、俄国、中国相比，日本人思想上的软弱所带来的日本革命传统的软弱。迫切需要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实际的那些条件，同时又制约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阶级矛盾尖锐是同缺乏政治自由联系在一起的。

应该认为，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性弱，反复出现宗派主义、极左主义等偏向的最大原因之一，在于形势急剧的变化和发展同力量对比下运动的中断所带来的经验的积累和成果的继承都不够充分。只要能提高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关心，认真总结历史教训，就会保持住日本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发展的阵地。

过去有过各种失败，未能取得胜利，但是不能由此而抹杀已经取得的带有根本性的发展和它的历史意义。胜利必将到来。

II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　河上、福本论战

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1879—1946年)在"利用大学教授的地位进行社会主义宣传"(《自叙传》)的意图下，于1919年创办了

个人杂志《社会主义问题》。1921年出版了《唯物史观研究》。这是他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立场给予社会主义理论以哲学基础的开端。无论明治时期的社会主义，或1915年创刊的《新社会》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哲学观点大体上都是进化论，再如大杉荣等无政府主义者的哲学，也多半是个人的自我哲学。河上肇则不然，他的《唯物史观研究》试图以马克思在《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概括出来的唯物史观的“公式”为指针，对马克思主义社会观、从基础到上层建筑整个体系进行研究。其中残存着“唯物论把一切事物都看作是进化的”这种观点，并且还忽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但他想从根本上研究整个社会的意图是很清楚的。

以后，河上出版了《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1921年)、《唯物史观略解》(1921年)、《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历史发展》(1923年)，其影响所及不只是知识阶层，并且还扩大到工人阶级运动中去。河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虽然首先受到同为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栉田民藏的批判，但福本和夫(《马克思主义》杂志，1924年)对河上的批判，无论在政治上或理论上，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更大。这是因为，福本是批判过“山川主义”的日本共产党的干部，并且在河上学说中明显地存在着倾向于“山川主义”的“经济主义”的观点。

福本从“我国最近阶级斗争的发展，使哲学领域中的这种小有产者倾向甚至中间党派有所抬头”(“唯物史观与中间派史观”1926年)这一观点出发，列举了这种倾向的代表就是“实证主义者高田博士的第三史观(或者社会学史观)”和“甚至已陷入经验批判主义的河上博士的经济史观”。河上对于唯物史观的各基本概念之间的互相关系，并没有从“交叉关系”(福本)去理解，而是从石原纯学说《科学的根本问题》(1925年出版)那里借用经验批判主义的“联系关系”来加以说明的。结果，河上认为“对作为现实基础的社会经

济结构的研究同时就是对社会意识中最主要的东西的研究。对前者的研究也就是对后者的研究"。或者甚至陷入认为"《经济学批判》以及《资本论》两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都是由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研究构成的"这样一种原则同格说之中。并且他还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看成是"一种政治思想"。福本在指责河上这种唯心论倾向时说，河上的"经济史观"的根源在于"从唯物史观抽掉唯物辩证法"。

福本据以批判河上学说的哲学理论当中之所以引用了不少列宁的论点，说明时代已经前进以及福本所处的政治地位。对于来自福本的批判，河上在《经济论丛》杂志上作过一些答辩，但不久就沉默了。后于1927年，河上在《社会问题研究》(第77册)上写道，在这里进行关于旧著《唯物史观》的"自我清算"，"兼答福本和夫氏的批判"。"故今年再次回到当初《研究》(《唯物史观研究》——引用者)的问题上来，重新考虑本人关于唯物史观的观点，同时借以回答福本氏的批判，如果可以的话，并想在此对福本氏的观点本身展开批判。总之，我是要进行自我清算的。……欠债还钱，如有可能，并想连本带利一起还上。我是很想认罪的，然而在别人看来，也许仍然有很多污垢——小资产阶级的、中间派的、经验批判主义的等等残渣——沉留腹中。如果真的如此，那将有待他日再行清理了。"河上的决心不管怎样是下定了。对于河上的这次"自我清算"和对福本的反批判，秋山次郎(是枝恭二)等人进行了反击，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杂志(1927年7、8、9月号)上发表的《公式社会主义者的哲学》和《唯物论和唯心论》等等。河上肇从此更加注意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果离开其哲学基础，是不可能有正确的理解的"，所以后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改造社版，经济学全集，第8卷，1929年)中，又增加了由"辩证法"、"唯物论"、"历史唯物论"三章构成的《马克思

主义的哲学基础》部分。

然而，福本和夫的哲学理论又是怎样的呢？

首先想从福本的政治理论方面来看。福本在批判"山川主义"的"经济主义""方向转变"（参看第十章）时，援用了列宁对"经济主义者"所采取的态度，即"在统一之前，而且是为了统一，首先必须从根本上划清界限"，据此而提出了他的有名的"分离结合论"。而为达到这种分离和结合，采取了"理论斗争主义"。通过"理论斗争"达到阶级运动的"方向转变"。但是，福本在这里所主张的是"把理论斗争从外面"搬进工会组织或其他团体中去，并不考虑群众自发的、直接的要求，另外，他还把政治斗争篡改成"理论斗争"。对于这一点，当然是可以叫做极左主义的。而在另一方面，他要求把"理论斗争主义"作为工会运动的主要形式，这就和山川一样陷入"经济主义"之中，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这在他的哲学理论中表现得很清楚。

福本在哲学理论方面的功绩在于，他把哲学理论看作革命理论。他说过，"哲学家……要改变世界"（《社会结构及变革过程》1926年版，序）。对于一直把哲学看作是探求"永恒真理"的传统哲学观说来，这确是一个革命。但是，和把"理论斗争主义"直接带入群众经济斗争领域一样，在这里，福本又同样要在"无产者阶级"的自发的"阶级意识"当中寻找哲学理论的革命性。

福本的著名命题是这样说的。

"近代资产阶级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其内在矛盾必定暴露出来，因此，它的对立阶级——即无产阶级必然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存在，这就不能不促使这个阶级形成。

"这就是说，资产阶级社会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必然地，不能不产生一个批判其本身的主体——即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化。"（《社会结构及变革过程》，1926年）。

"资产阶级"的"内在矛盾"与"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化"的关系;或者说从"自在的阶级"到"自为的阶级"之转化过程,福本认为是以"'资产者社会'的自我批判"的形式出现的。为了说明这一点,福本引用了这样一段文章:"资产阶级的经济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之后,才能有助于对封建社会、古代社会、东方社会的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着重点为引用者所加)。然而这里所说的"自我批判",任何人都明白,是不超越资产阶级社会框框的资产阶级的"自我批判"。而福本却把"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化'贴到'自我批判的主体"上去了。

福本理论的这种缺陷,也反映在他对唯物论学说的结构的理解上。他指责河上"从唯物史观抽掉唯物辩证法",但是他自己也不理解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根据,因而也就不理解自然存在是社会存在的根据,最后导致在没有弄清两者关系时就得出"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化"就是掌握辩证法这样的结论。简而言之,按福本的观点,一方面近代无产阶级是没有据以立足的"自然"基础的,另一方面,只要是近代无产阶级,任何人都是能够理解辩证法的。因此,在福本看来,过去发展史上的一切成果对无产阶级都没有意义。他认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序言中所说的"近代社会主义"首先有赖于先进的科学,这种提法是迂阔的,并指责恩格斯忘记了唯物史观是以"经济学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为其基本构成要素的,说什么"恩格斯也难免被人讥笑为他已经为自己准备了一条后来堕落为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但我们认为倒是在福本的这一见解中有着来自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主观主义。

二 三木哲学及其批判

在所谓"方向转变"时期把青年学生吸引到左翼运动中来的

"福本主义"的哲学理论，就是这样一些东西。"福本主义"的"分离结合论"虽然推动了党的重建（1926年），但其极左主义在1927年就遭到共产国际的批判，接着，在1928年的三·一五事件中，福本被捕。在这以后，沿着"福本主义"路线展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是三木清。据说三木这样想过，"福本能做的我也能做"（户坂润语）。福本曾经使用过布哈林的《历史唯物论的理论》，而三本清使用的则是德波林。两者正反映苏联哲学论战的影响。然而，三木也没有正确地把握自然辩证法，只是单纯的"唯物史观"主义。这一点仍然属于河上肇以来的潮流。并且"三木哲学"的秘密很多是"福本主义"中就有的。

三木是在自觉到"要求在意识形态的实现过程中进行所谓方向转变"时登上舞台的。与福本相比，三本在思索方面更为训练有素，哲学方面的知识也更丰富，当然他在政治上的目的意识方面是比较软弱的。可是不管怎么说，在我国最先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部门，乃是三木的功绩。下面我们只介绍一下三木的唯物史观中的"无产阶级的基础经验"这个概念。因为这个概念充分表现当时还没能正确理解自然辩证法和对人类来说自然是第一性的这种"唯物史观"主义所具有的缺点。

福本的所谓"阶级意识"的概念，到了三木又分解为"基础经验"和"意识形态"。首先看看什么是"基础经验"，他说"我所说的基础经验"也可以叫做"现时存在的全部结构"。这里"存在"这个概念和"自然"是相同的，对此，三木也不会不同意。因为三木说过，"劳动是以自然为感性，并且也是以人类为感性而形成起来的"。他还说过"把现实存在本身特称之为'经验'"。那么，为什么"自然"被译成"感性"，"现实存在"被译成"经验"呢？

"对于我们来说，单纯的自然是早已不存在的。自然也同样被历史地限定着。但是由于自然和人类是辩证地联系着的，所以，自然的历史

也是同人类的历史相互制约着的，因此，它们在同一个辩证法的历史的过程中发展。'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因此，唯物史观并不是关于作为同自然绝对对立的历史的理论，而是一个关于整个世界运动过程的完整的世界观。"它把全部世界的进程理解为自我运动、自发的发展、活的实在。"（着重点为引用者所加）

从这段话来看，以"唯物史观"代替"辩证唯物论"这一点和福本的观点一样，但关键问题在于，他不承认自然的独立发展，不仅如此，甚至还不承认自然的存在，只是在与人类历史的相互制约——或者说是劳动——中承认自然的发展。这就不难看出他所说的这种"自然"，实际上只不过是反映在人类历史上的"自然"的影子或"自然"的概念而已。因此，在三木看来，"自然"当然可以翻译为"感性"，"存在"当然可以翻译为"经验"。

按唯物论来说，人类原本赖以立足的"自然"的地位，在三木那里却相当于"基础经验"。而作为这种"基础经验"的"发展形式"则可以认为就是"意识形态"，这两者又互相作用着。因而据三木看来，"近代唯物论"、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在近代无产阶级的基础经验之中有其理论的具体根源的"。这就是说，"近代唯物论"乃是"近代无产阶级"的所谓激情的形式化。

1929年10月，"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成立。这个机构是在同年4月16日日本共产党遭受大镇压之后、为重新组织马克思主义科学运动而成立的。它包括"产业劳动调查所"（野坂参三）、"新兴科学社"（三木清、羽仁五郎）、"国际文化研究所"（秋田雨雀）。该研究所出版了《无产阶级科学》杂志，以扩大合法活动。然而，对于日本共产党来说，从此却出现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并存的"二元状态"（志贺义雄语）。

但是就在这前一年的1928年，在大山郁夫、河上肇主编的《马克思主义讲座》中，佐伯峻平（服部之总）写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

史观》，对福本主义同时也对三木清展开了激烈的攻击。该文指出，三木的唯物史观完全忽视了“作为整个唯物论的总的基本命题的哲学唯物论”，并且进而明确判定“三木哲学”的唯心主义本质。佐佰的这篇论文像彗星一样出现，震动了被“唯物论者”三木的著作所迷惑的人们，从此出现一场关于“三木哲学”的论战。而三木也马上于翌年1929年2月在《在新兴科学的旗帜下》发表了《唯物论及其现实形态——批判的批判》开始应战。这次论战虽然由于这一年进行的重组左翼阵营工作而暂时停止，可是到1930年又复燃起来，在《思想》、《无产阶级科学》等杂志上，论战很激烈。这期间的重要文章有这样一些：

三木方面的有，三木清：《唯物论的现实形态——批判的批判》（《在新兴科学的旗帜下》，1929年2月）；三木清、山崎谦、秋泽修二：《唯物论是怎样被唯心主义化的——再批判的批判》（《思想》杂志，1930年6月）。

三木批判者方面有，服部之总：《唯心论的乔装形态——三木哲学的再批判》（《思想》1930年5月）、服部之总：《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与自然——三木哲学中的自然》（同年7月）、栗原百寿：《相对主义的游荡辩证法——三木哲学批判》（同年7月）、山野幸夫（加藤正）：《走向辩证唯物论之路》（同年12月）、《关于三木哲学的论纲》（《无产阶级科学》，1930年8月）、还有《无产阶级科学》1930年6月号用内唯彦、寺岛一夫的三木清批判，加藤正的《关于三木哲学的笔记》（《无产阶级科学》1930年8月号）。

“公式主义”（三木清语）唯物论者对“三木哲学”的批判，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注意进一步引向基本问题，即引向“辩证唯物论”，使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这一点是有意义的。另一方面，“三木哲学”本身虽然仍继续活跃，但由于它提出了自称为学自马克思主义的“在历史中，存在是通过对存在的抽象而抽象为理论”（《唯

物史观与现代意识》序)、“理论同样也是历史的产物。一定的理论，在其下面被其时代的存在所规定，在其上面被其时代的理论意识所制约”(《唯物论及其现实形态》开始一段)等命题，也就是说，由于无论在生活上或思想上甘愿受“时代”的规定和制约，从而“三木哲学”的“现实形态”的实质也就愈发明显地暴露出来。关于“三木哲学”后来的发展过程，还可参看第十一章和第十三章。

三 唯物论研究会时代

1930年通过“三木哲学”批判结束了河上肇以来的“唯物史观”思想时代，开始进入“辩证唯物论”的开拓时期，苏联哲学界也开始了一个大转变。从1930年到1931年，以M.米丁为中心展开了一场所谓的“哲学论战”，以前的经验主义机械论派(布哈林)和孟什维克倾向的唯心论派(德波林)遭到清算，“哲学发展上的列宁阶段”的提法被确定下来。所说的“哲学发展上的列宁阶段”的主要内容是这样几点。列宁

一、从辩证唯物论立场对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以来的最新自然科学成果进行了哲学概括，并明确指出，最近的自然科学危机的叫喊正是科学丰富的成果同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那里借用来的科学方法论之间的矛盾的表现；

二、对新形式的唯心论进行了分析批判；

三、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唯物论的改造，加深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的理解；

四、明确了作为认识论的辩证法，从而加深了对反映论的理解；

五、确立了哲学上的物质概念；

六、明确了理论的党性；

苏联“哲学论战”的成果，很快就通过《哲学论战的总结和反宗教宣传》(永田广志译，1931年。青木文库《哲学讲座》第四卷《苏联哲学的发展》中有占在由重的重译文)传入我国。1931年成立“反宗教斗争同盟”(后改称“战斗的无神论者同盟”)。1931年9月，满洲事变爆发，1932年5月发表三二年纲领，对事变表明了态度。然而在当年3月，对左翼文化运动又伸出镇压的魔手，“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在9月改组为“无产阶级科学家同盟”。

面对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猖狂进逼，进步的科学家们认识到有必要进一步扩大战线。1932年10月，包括下列人士在内共40人作为发起人，成立了“唯物论研究会”。但这不是“无产阶级科学者同盟”那样的群众启蒙运动，而只是“研究会”。

发起人有：长谷川如是闲、服部之总、羽仁五郎、本多谦三、林达夫、舟木重雄、石井友幸、兼常清佐、小泉丹、小仓金之助、丘英通、冈邦雄、大竹博吉、三枝博音、斋藤晌、大塚金之助、杉本荣一、菅井準一、竹内时男、住谷悦治、户坂润、晖峻义等人。

该会章程的第一条是：

“以不脱离现实的课题来研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哲学中的唯物论和有助于启蒙为目的”。

当初有下列诸人被选为干事：

小泉丹、长谷川如是闲、小仓金之助、本多谦三、三枝博音、富山小太郎、丘英通、服部之总、斋藤晌、户坂润、冈邦雄、内田升三、石井友幸、并河亮、清水几太郎、羽仁五郎、林达夫。

“唯物论研究会”在成立之初，拥有这些铮铮之士，可谓人才济济。而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其中有后来成名的最右翼“皇道哲学”份子斋藤晌。《唯物论研究》第二号上曾登过他的《拥护反映论》一文。该会于1938年解散，以后由“学艺”出版社接续工作。《唯物论研究》杂志和《唯物论全书》(后来的三笠全书)显著地提高了唯物

论水平，并且把唯物论思想渗透到学生、知识界，因此可以说，“唯物论研究会”时代是日本唯物论史上最富有成果的时期。

这个研究会拥有很多能力很强的理论家。他们吸收了苏联“哲学论战”的成果，特别是认真钻研了辩证唯物论，同时还参加当时的意识形态批判的战斗。关于他们的活动我们不可能一一介绍。这里只介绍一下以该会为中心展开的两次论战，从而使大家了解它的活跃的战斗精神。

（1） 关于哲学（理论）的党性的争论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译者加藤正在日译本的序中曾这样写道：

> “唯物论方向的正确性并不是由于人们的某种生活态度得到合理化的，而是为事物的客观联系所证实的。”（日译本，上卷、序言）
>
> “现代的一切学院哲学及其或左或右的流派，对于客观地从必然联系和发展上认识自然及人类历史，竭力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却在一定形上对主观的伦理赋以某种形式的优先地位。其披着左的外衣的流派，则断然给这种伦理加上所谓阶级的实践呀，无产者的立场呀之类名称。这只能称之为滑稽，不能有别的什么客气的说法。”（日译本，下卷、序言）

这位加藤曾在《唯物论研究》（简称《唯研》）第六期（1933年3月）上发表《我国辩证唯物论的回顾与展望——写给唯物论研究会的个人意见》一文。这篇论文又一次对认为“辩证唯物论就是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表现”的“福本主义”和“三木哲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主张“辩证唯物论当中不存在必须坚持的无产阶级党性”。加藤的这种论点是在苏联的“哲学论战”中提出“理论的党性”这一口号之后提出的，并且其中也还存在着1930年批判三木时提出过但未能深入下去就搁置起来的“反映论”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这次则由研究会第一次作为学术争论提了出来。同时，对于这些已与政治基本队伍中断了联系的左翼理论家来说，“理论的党

性”问题事实上也确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参加这次论战的主要人物的论文，有加藤正的《论理论的党性》(《唯研》1933年8月)、《对批判的答复》(同年10月)，梯明秀的《哲学时评》(同年8月)、永田广志的《作为反映论的认识论的唯物辩证法》(同年4月)、《唯物史观与客观主义》(《历史科学》1933年5月)、船山信一的《关于研究的党性的论战》(《应当读什么?》1933年10月)等等。在这次论战中，船山信一同加藤的"客观主义倾向"的对立是最为尖锐的。当时船山从"三木哲学"脱离出来开始向左转，他是一位认真钻研"哲学发展上的列宁阶段"问题的青年唯物论者，曾受到人们的重视。就是这位青年船山提出，"《唯物论研究》中批判加藤的那些人承认认识的主体性、实践性、阶级性，但他们从未提出过真正意义上的党性"。

诚然，在这次论战之前，永田广志就说过："认识不断向客观真理接近和它具有阶级性和党性，……是在进步阶级的实践产生的理论才是更具有真理意义的认识这点上，毫无矛盾地统一起来的"，"只有按唯物主义所理解的实践，才能使认识论成为真正的反映论，……才能解释理论的阶级性和党性"，实际上对"阶级"和"党性"并未加以区别。此外，梯明秀也大体上持同样意见。就是说，永田和梯两人都主张"阶级"＝"党性"＝"反映论"这个公式。而船山对于这种说法则指责说：

"如果这只不过意味着单纯叫人们获得正确的一般认识，那么，关于哲学的党性问题就等于什么也没说"。

"关于阶级性，只要承认'人'所产生的理论自然带有他所属的阶级的烙印，为阶级所制约、所利用就足够了，但所谓党性，则意味着'人'必须有意识地积极地使理论活动服从自己阶级的需要。

"因此，'主题的积极性'将成为理论的党性最本质的因素。

"理论的党性问题不只是科学性、客观性同阶级性、党性的关系问题，而是更具有根本意义的政治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必

须彻底贯彻'政治对理论来说是第一位的'这个观点。"

这里，船山是从"对理论来说政治是第一位的"观点出发，主张作为"主题的积极性"的理论的党性。然而，加藤认为"主张党性者有一个公式，日政治党派所产生的全都是真理。党性是真理的源泉，是绝对者"。按加藤的说法，所谓理论的"党性"只能是"唯物论所具有的党性"，它并不是政党性质的党性，也不是阶级性。

"党（指政党。——引用者）的任务在于把对阶级和阶级活动条件的认识如实地带给阶级，并根据这种认识去组织本阶级的力量。这时，问题不在于认识是从谁的头脑中产生的。列宁在《做什么?》中说过，社会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意识是从阶级外部输入的"。

加藤认为理论问题上的"党性"和政治上的"党性"的一致点正是在这里。在这次论战中，"客观主义者"加藤的反对者们大体上都是从发生、起源上考虑"党性"的，而加藤则是从结果来考虑的。加藤曾说过"列宁的主要哲学著作在论及理论的党性时指出，要看它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着重点是引用者加的）恰恰是在这次"斗争"过程中存在着"理论的党性"问题。此外，加藤及其反对者在坚持"反映论"这点上都是一致的，这就比福本一三木时代前进一步，不过在谈到"理论的党性"时，则不能不提出"是反映论还是不可知论"这个问题。这次"理论的党性"论战的内容，在1934年开始的对西田、田边哲学、法西斯哲学、日本主义哲学的批判中更加具体化了。

再者，参加论战的加藤早在1932年就入党了，后来参加大阪地区党的重建运动，1939年被捕，船山后来脱离唯物论研究后，和他旧日的老师三木清一起加入"昭和研究会"。

(2) 大森义太郎批判

大森义太郎早在1928年就被东京大学革职。大森在学术上视

野宽广，并活跃在文坛上，是当时典型的左翼报界撰稿人。他同脱离日本共产党的山川派份子合作，在左翼阵营中持同日本共产党对立的立场。他出版过《历史唯物论》、《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读本》、《唯物主义战士》等哲学著作，作为一个"粗俗的辩证法"理论家，曾大挥其健笔。

大森对于那位慑于马克思主义的"流行"而采取"思想诱导"对策的思想家河合荣治郎和川合真一，对那位为了击败唯物史观而高唱"分配史观"的东大教授土方成美，对那位批判过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然实现论的小泉信三等人，曾以轻妙的讽刺加以对抗。同大森的这些令人注目的活动相比，当时的唯物论研究会阵营中，除户坂润外，其他都像是刚学马克思主义的学生一样。

大森除了使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外，还大量使用社会主义哲学家考茨基没落后出现的社会主义哲学家普列汉诺夫、列宁（大森和山川均合译《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以至布哈林、德波林等苏联理论家们的成果从事论战。但是，在吸收苏联"哲学论战。成果基础上对哲学理论又加以精雕细刻的青年一代唯物论者与粗浅的庸俗唯物论者大森之间，有着相当大的距离。1932年左右，开始批判大森。首先在《物研》（1932 年 11 月）杂志上，君岛慎一（永田广志）批判了大森的辩证法。接着在《普罗研》上刊登了《社会法西斯主义哲学》，对大森进行批判。以后又发表不少批判大森的文章，其中山本三郎（松村一人）（《最近论坛上的反映论问题》，见《应当读什么?》，1933 年 5 月?）批判了大森的反映论的不彻底性和暧昧态度，指出它"在敌人面前让步，是大倒退"。还有清水几太郎（《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学——大森氏是如何看待社会学的》，《唯研》1933年 4 月）对大森的提法提出疑问。大森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学"同历史唯物论的对象和任务大体相同，所以"历史唯物论既是合理地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认为它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这并不错"。

清水几太郎并提出把“历史唯物论”叫做“社会学”是否合适的问题。清水主张，当前不能“认为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学的关系是处于某种和平状态”，而必须努力阐明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学之间的对立，不仅“要看到两者是否相似”，更重要的是“正是在其相似时，就特别要求我们批判社会学”。

批判大森的文章多达十几篇。大森对此写了《对我的批判者的批判》(《改造》1934年3月)作为回答，其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 “当然并不尽是混人聚在一起，但却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呢？因为我和他们在政治见解上不同。他们总想把我干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可以的。然而他们并不止于此，他们一直是在所有问题上无事生非，总想排挤我”。
>
> “总之，来自极左主义的那些亲爱的左翼批评家们的迷信态度，必然要导致我们预言过的那种混乱局面。
>
> 亲爱的左翼批评家们，还是尽快放弃你们那种极左主义吧。”

“三二年纲领”称社会民主主义者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者”，把“左翼民主主义”看作是“最危险的”。于是，共产党系统的理论家对这派的大森发动总攻击，所以才作出结论说“社会法西斯主义哲学现在已经完全转到敌人营垒方面”(冈村隆雄：《船山信一》，《唯研》1934年4月)。可是后来当人民战线策略开始明确起来时，唯物论研究会对大森又作了这样的评价：

> “……关于运动的组织形式，现在集中在日本的人民战线问题上。……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广大社会运动和思想界的课题。最先开始进行这项工作的有评论家大森义太郎、清泽洌、马场恒吾等人；政客则有劳农无产协会的加藤勘十等人”(户坂润：《日本思想界的展望——论1936年的哲学科学》)。

唯物论研究会所开展的论战，早自1933年就已讨论过。“关于作为认识论的辩证法问题”(船山信一、石滨哲夫、吉田敛〔本多修

郎、小西荣治）和"生产力"问题（小高良雄、君岛慎一、永田广志、武田武治（沼田秀乡）、相泽秀一、相川春喜、冈邦雄）

1935年，对包括1932年泷川事件以后发生的自由主义倾向在内的文化运动的镇压，也对该会发生了深刻影响，本多谦三、三木清、斋藤晌、清水几太郎等退出该会。三枝博音、船山信一也在此前后停止活动。然而，山田铁夫（古在由重）却出现在机关刊物上。不过他们的唯物论研究会也开始从一个关于唯物论的广泛研究者群众性团体明显地改变成为唯物主义者的团体。时局益发紧急（1936年发生二·二六事件），当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文化运动已成为时代要求的关键时刻，研究会中迫切需要的成员却四散而去。但该会立即把自己的活动方向转向人民阵线的文化运动，同时还想极力保持它"独立于政治活动之外的研究团体"的性质。关于这一点，户坂润曾这样说道：

> "……现在人民阵线中的文化运动，实际说来，不外是目前形势下文化运动中的人民阵线。这是因为作为一个文化运动，只有脱离政治活动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统一成人民阵线，同时也是必须这样做的。这是关于文化运动在自由主义原则和反法西斯原则上实行的统一的运动形式问题，同时也是关于必须以自由主义或反法西斯主义为形式的文化内容的问题。"（《论所谓"人民阵线问题"》，1936年）。

这里可以看到当时是有通过自由主义的形式能使独立于政治之外的独立活动统一到反法西斯运动中来的这种思想。它表明文化运动已变成离开作为人民战线的基本队伍工人阶级的知识份子运动，它正在发生混乱并已作了退却准备。但是，从此以后，《唯研》杂志一方面组织一些关于文化领域的问题，人生论、文学论、人本主义论等题目，另一方面也还刊登了个别人的研究论文。并且充分表现出用"科学精神"、"合理精神"、"批判精神"抵制文化破坏狂（Vandaeism）的气概。户坂润在《什么是科学精神》（《唯研》1937年

4月)一文中这样说道：

"科学精神首先应具有掌握'当前现实'的魄力。……在日本，科学精神头等重要的是必须把握日本的现实。"

然而，"科学精神"并非把"日本的现实作为日本文化或日本人精神"来掌握的，这是因为日本的现实并不是以"日本文化"或"日本人精神"的形态而表现的。"日本的现实正是通过日本的社会机构、生产机构而在政治上表现的。"

这样，唯物论研究会外表虽是个"文化团体"，但对正在推进中的"政治上"的反动还是坚持进行"文化上"的进攻的。

1938年2月，唯物论研究会实行退却的方针而自行解散，户坂润、森宏一、永田广志、古在由重、石原辰郎、刈田新七、伊藤至郎、新岛繁、伊豆公夫、武田武志、本间唯一等人成立了"学艺发行所"，以新的形式支持《唯物论研究》杂志工作。

(关于唯物论研究会的完整资料有战后唯物论研究所发行的《唯物论研究》第一号，1947年)

第十一章　昭和年代的“现代主义”思潮

一　“现代主义”文学

“Modernism”一词，如果译为“近代主义”，很可能被理解为包括明治以来的一切“近代”化活动和运动，因之它不一定是符合原意的译语。Modern一词与其说指的是作为历史分期的“近代”，莫如说是“最近的”、“新的”、“新奇的”这些意思。一般地说，日本近代文学史中的大正末年到昭和8、9年(1933、34年)前后的昭和文学流派或倾向，才叫做“现代主义”。如前章所述，这个时期正是马克思主义高涨时期，所以在文学方面也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势力显著增长，并大有席卷整个文学界之势。为了抵制这个无产阶级文学势力，于是开始出现所谓的新感觉派运动，后来又从此演变出形式主义文学、新兴艺术派、新心理主义等等文学流派，这些就是“现代主义”文学。我们先谈一下“现代主义”文学的大致情况，然后再分析一下它的所谓“现代主义”特征。

作为昭和文学亦即“现代主义”文学开端的新感觉派的出现是在1924年。大家知道，在这前一年的9月发生了袭击整个京滨地区的关东大地震。当时，有人揶揄新感觉派文学为“震灾文学”。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因为从大正中期以后逐渐开始浸润我国社会的“新的”生活方式、生活意识乃至社会风气，在恢复大震灾破坏的过程中已居支配地位，并给新感觉派文学打上深深的烙印。这种社会风气一般称之为“美国主义”，也就是以“汽车”、“电影”为象征

的机械文明，以“咖啡馆”或“轻佻歌剧”为象征的“都市文明”。而随着这种机械文明而来的生活方式的机械化、非人性化带来了人性的丧失和个性的泯灭，而都市文明则产生了爵士乐式的得过且过的享乐风气。这一切都是我国资本主义进入危机阶段的征兆，都不过是资本主义文化腐朽和颓废的表现。人们说它是所谓“大正文化”的乐观主义的人格主义或理想主义的延续，同时也是它的崩溃。芥川龙之介（1892—1927）对未来感到“茫然不安”（《遗书》）而自杀，就是象征这一时代的精神状态的事件之一。“芥川的那种自杀、自由主义必然要转变为下一个某种东西，在这种转变到来之前，这位天才的自杀，乃是一群摆脱不了过去的文化重压因而精神衰退的作家们苦闷达到极点的表现。”（广津和郎：《话语心声》，1929年）。这时，无产阶级文学标榜变革现实社会和从世界观上革新社会意识而开始抬头，对此，新感觉派对于人性的破灭和丧失则只能是无能为力地承受下来，向着表现这种活生生的破灭感情和感觉的方向走下去。

新感觉派有代表性的作家横光利一、川端康成、中河与一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是明治30年前后出生，大正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点应特别予以注意。因为在这些人中间，像许多明治时代人所具有的儒教伦理那种形式的伦理观念已经很淡薄了，所以不可能从外部找来某种形式以阻止人性的破灭。正象川端康成所形容的那样，“新感觉派的表现可以比作一个从小穿西装长大的日本姑娘的姿态”（《号外波动调》1925年），“从小穿西装长大的姑娘”这种形容是非常恰当的。如果不是用大正文化的“西装”来培育就不会有新感觉派文学，而事实上它所产生的直接刺激也确是来自欧洲。不过穿着这种“西装”的日本人却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娴淑的“日本姑娘”，说不定什么时候她要换上圆领大袖的和服。事实也的确如此，到法西斯时期她真地换上了和服。

在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结束后，战败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自不必说，就连战胜国英国、法国也都陷入社会混乱和严重的社会不安之中。作为这种混乱和不安的反映，开始出现表现主义、新物质主义以及未来派、立体派、达达派等具有破坏、绝望、分裂症倾向的文学艺术，而这些东西早在大正中期就已经介绍到我国来了。这些欧洲最新文学和艺术的输入和介绍，乃是那些"新时代"的作家们为自己的主张寻求刺激和支持的结果。他们反对大正时期以前居文坛主流地位的自然主义体系的既成文学以及"白桦派"文学。当然，这种欧洲尖端艺术的输入和介绍，并不一定是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从内容上进行的。因为这些人虽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感到某种漠然不安，但毕竟不像欧洲那样对战争的惨状有切身的感受，所以就不具有欧洲尖端艺术那样以整个人性"反抗"旧时代的那种尖锐性。内田鲁庵曾批评他们说："虽然手法精巧的匠人能够模仿梵高、塞尚或勉强模仿马蒂斯、马里内奇，但那只能是形骸。无论多么新，形骸终归是形骸，里边并没有作者的气息。"(《貘舌》，1920年)。从新感觉派作家方面看，他们的强烈倾向也主要是从文学技法的革新方面摄取和吸收海外文艺思潮。日本就是沿着这个方向把新的海外文学一个接一个地输入、介绍过来的。当时，大震灾后弥漫着日本社会的是都会文明、机械主义的美国主义的社会风气，同时带有一种追求表面形式的浅薄感。"现代主义"意识不断追求时髦而避免规定本质。而新感觉派文学在极端的庸俗形式中甚至堕落成为"色情、猎奇、闹剧"文学。

所谓"现代主义"文学，大体上是可以作如上理解的。

"根本问题在于，当时的日本文化只是在外形上或意匠上模仿近代欧洲，而在实质上则是属于封建的近代以前的绝对君主制。结果，在作家采取欧洲的创作方法时，而与此种方法相一致的对象则是建筑物的欧式结构或女人流行的衣装和化妆……等等，只是一些没有同日本人的生

活实质相结合的现象，这种倾向却很强烈。"（《现代日本小说大系》第四十三卷解说）。

这是作为新心理主义文学的热心介绍者、提倡者而活跃于文坛的文学家伊藤整在第二次大战后，对当时的"现代主义"文学的缺陷所作的自我反省。一般说来，这指的是"近代"日本的整个文化，但也不能不看到它是昭和初年"现代主义"潮流所特有的显著缺陷。日本资本主义的畸形形成和发展，带着畸形的特征进入到腐朽的危机阶段。对于欧洲和美国在该阶段上的文化财富，并未考虑其所由产生的历史社会背景，便作为同时代的东西陆续输入日本，并拼命追求其新颖。这样追求到的新颖，只引起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兴趣，并未被群众所理解，或者说虽然被群众所理解，但仍未能化为积极的生活内容。在这个时代，尖端的文化和民众的生活是极端游离的。正好在新感觉派出现前后，大量产生不同于"艺术小说"、"高级文学"的"大众文学"和"通俗小说"。而且在1927年又创刊了"岩波文库"，这可说是与所谓"讲谈社文化"相对立的"岩波文化"的象征。所有这些都表现了这个时期文化和生活的乖离。这样的"现代主义"文化乃是"现代"日本文化的不幸。

二　"现代主义"思潮

由感觉派开其端的"现代主义"文学所标榜的是打倒大正年代的自然主义的既成文学，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主要对立面还是无产阶级文学、马克思主义文学。新兴艺术派评论家雅川滉写的《艺术派宣言——新艺术派是怎样产生的、要做什么?》（1930年4月），内容虽然空洞无物，但文章结构却很堂皇，罗列五条：一、为什么要先发宣言；二、首先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误谬说起；三、其次谈谈关于对马克思主义作品的不满；四、因此，新艺术派发表宣言；

五、新艺术派的实际情况。攻击的主要目标是马克思主义。另一个新兴艺术派久野丰彦所写的《新艺术派为什么抬头》(1930 年 5 月)也表明它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作品的。其中列出三点：第一、马克思主义所信奉的思想体系现已成为非现代的东西；第二、马克思主义文学的题材范围狭隘；第三、表现形式非常陈腐。他们加以反对或批判的根据则是一种庸俗的武断，他们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仅仅适于分析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而现代社会的结构可以用道格拉斯的"信用经济学"如实地分析。这时，拿出这位道格拉斯(C・H・Douglas)的《信用经济学》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声嘶力竭地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是田土杏村。当时，所谓的道格拉斯主义曾被经济学界视为俗论而几乎无人理睬，专门进行研究介绍的可以说只有土田杏村自己一人，因此他的活动就特别引人注意，他的论调也就为"现代主义"文学家们所利用。

但是，把土田杏村(原名茂)(1891—1934年)其人列入"现代主义"思想家则有些勉强。他先后毕业于新泻师范、东京高等师范，1918年由京都帝大哲学科毕业。早在就学于东京高师时，由于得到他所崇拜的田中王堂的帮助，出版了第一本论文集《文明思潮与新哲学》(1914 年)。在《文化哲学入门》(1923 年)的序中，他曾写道："我首先把哲学分为自然哲学和文化哲学。这里所说的文化哲学，就是论述人类活动的文化现象、即论述法律、政治、经济、语言、习惯、道德、教育、宗教、艺术、学问等一切在内的基础的哲学。"他的著作事实上也的确包括一切方面，涉及东西洋，写作数量确实很多。因之，确应评之为具有"大正文化"的特色。

从事多方面写作活动的土田，其本领，应当说在于他是一个文明批评家或社会批评家。他的立场是新康德派的"文化主义"哲学，特别是纳托尔普(Paul Natorp，1854—1924)等人的"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他在《马克思思想与现代文化》、《文化主义原论》

(1921年)、《社会哲学原论》(1928年)、《思想问题》(1929年)、《马克思主义批判》(1930年)等著作中,一贯从这个立场出发批判马克思主义。他认为,要使批判取得更大的效果,无论如何必须建立一个能够代替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经济理论。这时他找到道格拉斯的学说,感到"甚合吾意"而以极大的热情努力研究和领会。论述道格拉斯的信用计划论即所谓信用社会主义的《从生产经济学走向信用经济学》一书是1930年1月出版的。

以社会批判家和文明批判家为其主要活动的土田杏村,同时还在国语学研究、教育论、宗教论、人生论等许多方面进行写作活动,从大正年代到昭和初年,获得很多读者,他的十五卷全集也在其死后第二年即1935年开始出版(第一书房),一年出齐。其上述之特点在于始终坚持"大正文化"型的文化主义、理想主义。称其为"现代主义"则有些不妥。

保留"大正文化"型的特点但比杏村更加接近于"现代主义"的是和辻哲郎(1889年生)。他作为第二届《新思潮》(1910年)的同人和小山内薰、谷崎润一郎、木村庄太、后藤末雄等人一起开始走上舞台,到大正末年已经出版了《尼采研究》(1913年)、《瑟林·克尔恺戈尔》(1915年)、《偶像再兴》(1918年)、《古寺巡礼》(1919年)、《日本古代文化》(1920年)等专著和评论、随笔集,他那才华横溢的文笔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之所以把尼采、克尔恺戈尔首先选为自己感兴趣的哲学研究对象,是因为他后来形成的人学观点在这时已有所萌芽,当然也还意味着对当时学院哲学庸俗单调的反抗。

然而,"当大正12年关东大震灾时,稍有所感,决心再不写那些可写可不写的东西"(《假面和人》跋,1937年),从此他就停止在报刊上写评论的活动。1925年3月,由西田几多郎推荐到京都帝大文学部当讲师,6月任助教授,讲授伦理学。后又于1927年2月去德国留学,翌年回国,1931年任教授。

如前节所述，对于探讨“现代主义”文学或思潮，大正12年的关东大震灾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划时代事件，而和辻则是在这一年决心走向学院主义的。乍看起来，这好像是同“现代主义”分道扬镳了，但在他来说并非如此。留学前写的《日本精神史研究》、《原始基督教的文化史意义》（1926年）、《原始佛教的实践哲学》（1927年）等都是学院式的著作，这些著作对过去的日本文化、基督教、佛教都用现代的眼光加以看待，尤其《原始佛教的实践哲学》一书，是经过对原典的细致处理写出来的，这是过去那些僧侣之流的佛学家们所意想不到的，从而引起极大反响，把原始佛教的实践哲学引进“普通哲学研究者关心的范围内”这个意图是完全达到了。此外，还有德国留学回来后受到海德格尔（M·Heidegger，1882年生）解释学的存在论的启发而写的《作为人学的伦理学》（1934年）和《风土——人学的考察》（1935年），也都引起许多知识界读者的注意并得到好评，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它的现代外表，在于它巧妙地使用了风行一时（法语À La mode）的解释学方法。

作为人与人之间（人间）之学而建立起来的和辻伦理学的具有完整体系的著作《伦理学》上卷是1937年出版的，其特色与其说是其体系结构，还不如说在于风靡一时的海德格尔哲学等的巧妙运用，在他的天才素质方面，具有特色的应该说并不在于学术体系家的深邃的思索力而在于敏锐的直观力和丰富的艺术家感觉。最能体现他这方面长处的是他的留学成果、代表作《风土》。

“我开始考虑风土性问题是1927年初夏在伯林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时候。把人的存在的内容结构当作时间性来把握这一设想，对自己来说则具有非常深厚的兴趣。然而当时间性作为这种主体的存在内容结构发生作用时，为什么在其同时空间性并没有作为同等的根本性的存在内容结构而发生作用呢？这一点就是我的问题所在。”（序言）

考虑时间性同时也考虑空间性，这种着眼点，通过与历史性相对的空间性这一形式而具体化了。其素材是外游途中映入他“眼”中的各种各样的土地的“印象”。他在这里把单纯的“风土印象”顺理成章地整理为“季节风”、“沙漠”、“牧场”三个类型。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这本《风土》上又加上了《人学的考察》的标题，其用意所在正在这里，这里所说的“风土”毕竟是“人学”的范畴，绝不是自然科学的范畴。从“风土”所看到的是我们本身，作为与风土相互关系中的我们自己本身；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了解的型式就是“风土”的类型。因此，“风土”类型的考察就是试图“从特殊的风土现象的直观出发深入到人的存在的特殊性中去”。这本《风土》可以说是他“到处用来观察理念的眼睛”（谷川徹三语）的最典型的产物。其中贯彻着审美的、直观的态度。这种“大正文化”人的态度是贯通其全部著作的一种特色，与他的贵族主义反俗精神结合一起，决定着他学术研究的整个性质。

和辻哲郎在学院主义的框框里一直继续着极为现代化的著作活动，与其相反，在社会报刊界中称得起是“现代主义”的活动家则是三木清。

1929年2月的《改造》杂志大书特书地捧出了两个“时代新人”，一个是新感觉派的骁将横光利一（1898—1947），另一个就是这位才华出众的新秀哲学家、评论家三木清（1897—1945）。当我们考察与开端于新感觉派的“现代主义”文学并行出现的这一时期的“现代主义”思潮时，应该说追寻一下这位时代宠儿三木清的活动足迹是最为有效的方法。探讨这位极其敏感地反映时代动向并在思想舆论界起主导作用的哲学家、评论家的活动，不仅能够弄清三木清的问题，而且也能阐明这一时期的时代特征。

三木清1897年生于兵库县一个半农半商的家庭，是家中长子。前边已经提请大家注意过，新感觉派作家都是明治三十年前后出

生的。他们和三木清完全属于同代人。三木清曾就读于龙野中学，1914年入第一高等学校。下面我们引用三木清本人的回忆（我们认为下面几处引用不仅对三木清个人，即对了解和三木清同在昭和初年开始正式活动的一些人的成长过程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虽有些繁琐也还是引用了）。

> "我的中学时代，正值日本资本主义的上升期，是《成功》这样的杂志出版的时候。这个时代的中学生最欢迎的杂志有押川春浪编的《冒险世界》。在这样的气氛中，我们对待一切事情都处之以事业心和冒险心。"（《读书记》）

中学时代的三木清富于"事业心和冒险心"，是一个"相信自己要做的事情，不管怎样都能做到的"少年；是一个"任性而顽强地"幻想从事政治家、律师、法学家、文学家、批评家、创作家、新闻记者、哲学家等""一切引人注目的职业"（《无从谈起的哲学》）的少年。在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大正新时代的天助者"，后又以吸收大正文化而成长起来的三木清，正像他的同年好友所评论的那样："我没有看见过比年轻时代的三木清更汲汲于声誉、燃烧着野心的人。这当然是来自他对自己的能力和使命所怀有的强烈信心，而我对于这一点，无论在当时或现在，从来没有产生过非难或嘲笑的念头。"（林达夫：《回忆三木清》，收于《共产主义的人》）

三木在第一高等学校读书时，读了西田几多郎的《善的研究》，因深受其影响，于是决心学哲学而入西田几多郎讲学的京都帝大。这是1917年的事。这打破了过去一高→东大升学路线的惯例。紧跟着，谷川徹三、林达夫、户坂润、西谷启治、三土兴三等人也都步其后尘。其中除了若冠时自杀的三土和后来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户坂润以外，谷川和林等人都是和三木同时在昭和初年的"现代主义"思潮中从事文笔活动的人。前面提到的在《改造》杂志"新人评"中写过三木清其人的就是谷川徹三，那时，作为文艺评论

家的谷川徹三，其活动与三木清旗鼓相当。

当时的京都帝大文科院系，正如三木清所说，是"日本文化史上的一大壮观"。哲学科有西田几多郎、朝永三十郎、深田康算、波多野精一、田边元等；西洋史有坂口昂；中国文学有内藤湖南；日本史有内田银藏等，真可谓学者云集。值得注意的是三木入京都帝大是1917年，当然1914年开始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时还没有结束。这一年，俄国发生了苏维埃社会主义革命，第二年日本发生了米骚动。回忆当时的情况，三木曾这样说过。

> "回想起来，我的高等学校时代正是上一次世界战争的时候。我之所以说'回想起来'，是因为对于这种场合使用这种表达方法是恰当的。虽然我在最富敏感的青年时期碰到那么重大的事件，但如果不去回想就不能马上想起它来。我就是这样很少受到战争直接影响而过来的。我想不单是我自己，大概多数青年也都是这样吧。……尽管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么重大的事件，我们对政治是很不关心的。或者说我们能够做到不关心。后来支配我们这些人的却是那种叫做'教养'的思想。而这种'教养'则具有轻视所谓政治而重视文化这样一种反政治的或非政治的倾向。……总而言之，我所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我的直接影响，只是德文书籍弄不到手罢了。"（《读书记》）

这段回忆的话，作为"不单是"三木清而是"多数青年"青春时期的故事，确有其深刻含义。作为昭和年代"现代主义"思潮的倡导者而且在这当中积极活动过的人，正是那些由所谓"大正文化"所包括的"教养主义"、"文化主义"所培育出来的人。三木清在高等学校"宿舍楼内熄灯后，在蜡烛下阅读爱不释手"的著作是仓田百三的《爱和认识的起点》，是阿部次郎的《三太郎日记》。到了大学时代，他们自称"古典派或教养派"，"涉猎格罗特的《希腊史》，阅读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倾心于但丁和达·芬奇"。只要看一下《无从说起的哲学》（1919年）、《论个性》（1920年）和毕业论文《批判哲学和历史哲学》（1920年），就可以想像出在

"大正文化"中突飞猛进的优秀生三木清的形象。

"那时，当我在我们的校园里过着和平生活时，外界社会已经开始发生大的变化。乘那次世界大战的机会，日本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但是，我从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即大正9年，记得就是前所未有的总危机袭来的那年。随着这种变化，思想界也出现种种新的现象。大正7年末，东京帝大成立了一个叫做新人会的团体。《改造》——这个名称对当时的社会来讲乃是一种象征——的创刊是大正8年。同一年，还有长谷川如是闲、大山郁夫氏等人创办的《我们》。还有，主要是在《中央公论》发表文章的吉野作造的活动也很引人注意。因为我每个月都看这些杂志，所以使我也感到某种大的浪潮正在涌来。京都还是比较平静的，但是因《贫乏物语》而著名的河上肇博士正在逐渐吸引学生的注意。"（《读书记》）

但是，三木清对于这种时代动向，"并非不关心，可是没有产生投身其中的想法"。大学毕业后，过了两年，即1922年5月，这位京都大学建校以来"前所未有的秀才"曾去德国留学。选定的地方是海德堡，因为他要就学于风靡日本哲学界的新康德派头面哲学家李凯尔特（Heirich Ri CKert 1863—1936）。在海德堡学习一年后，他又去马堡，因为海德格尔在马堡。在这里"几乎完全接受了海德格尔教授的影响"，学亚里士多德，对以狄尔泰（Wiehelm Dilthey，1832—1911）为首的"生命哲学"很感兴趣，同时，对于为战后"德国青年学生提供精神生活环境的赫尔德林以及尼采、克尔恺戈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著作，曾以深刻的共鸣热心攻读。"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以及把作为"世界内在"（in der weit sein）的人当作研究对象的实存哲学本身，都不外是欧洲"战后不安的表现"。留学期间受到海德格尔的影响，对三木清是有决定意义的。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新感觉派的年青作家们通过输入、介绍过来的先锋艺术所知道的，以及后来在大震灾中所体验到的一切，三木清则通过在外国的体验和读书都已知道。

三木清带着安德烈·纪德的几本小说从马堡来到巴黎，这次并没有进大学，而是在旅馆攻读丹纳(Hippolyte Taine)、法朗士(Anatole France)、勒南(goseph France Renan)等人的著作。这期间，他偶然得到一本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的《思想录》，产生了"对！写写帕斯卡尔吧！"的念头，于是运用海德格尔的"解释学方法"写了《帕斯卡尔和生命存在论的解释》、《论爱的情念——读帕斯卡尔的笔记》、《帕斯卡尔方法》、《帕斯卡尔的赌注》等，这些都发表在《思想》杂志上。

三木1925年10月回国，翌年4月任第三高等学校讲师。同年6月，整理出一本题为《帕斯卡尔著作中的人的研究》的处女作并出版。据说这部著作只引起一部分人的注意，反响并不那么大。翘首待望中的京都帝大文学部的招聘因某种事件的牵连而终归无望，1927年，他移居东京，执教于法政大学，从此开始进入新闻界。

进京后，三木清相继发表了《人学的马克思主义形态》、《马克思主义与唯物论》等论文，1928年秋，同羽仁五郎一起创刊《在新兴科学的旗帜下》杂志。在德国深受海德格尔的影响并成为帕斯卡尔信徒而归国的三木清，看到昭和初年马克思主义的兴盛，尤其是"看到福本和夫的兴起，好象使他的野心油然而生。记得他似乎说过，福本能做的我也能做这种高傲的话。他的直觉能力很强，立即看出当时没有人可与他伦比，所以福本才得以占据新思想界。……于是他马上就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起来"(户坂润：《三木清氏和三木哲学》，1932年)。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大正文化中的"人格主义"在人学的形式下的具体化，并企图从这一立场出发对"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赋与"哲学"根据。这些，对当时多数年青的知识分子读者是有很大魅力的。因此，相继不断地出现左倾的人。户坂也是其中的一个。对于三木清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现在有人评之为"使唯物史观在人学上面倒立起来"的、不折不扣的"人学的

马克思主义形式”，同时，可以说他赋予的这种“哲学”基础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形态。

1930年5月，三木清以日本共产党的同路人而被捕，拘留六个月。从此以后，他退出学校讲台，专事著述。在他本人就是发起人之一的“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里，三木哲学也受到批判，三木哲学被判明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三木清的马克思主义时代从此即告结束。这时他最初着手写的就是毕业论文以后的课题《历史哲学》，该书于1932年出版。1931年发生满洲事变，日本法西斯化的进程加快步伐。在满洲事变的影响下，在知识分子阶层中增长起来的精神“不安”的气氛中，三木清写了《危机意识的哲学剖析》(1932年)、《不安思想及其超脱》(1933年)，接着又写了《关于谢斯托夫的不安》(1934年)。人们不禁想起“不安”哲学，“不安”思想，早在他留学德国时就深为接触、共鸣、并受其影响。用海德格尔的方法论研究帕斯卡尔就是他的处女作。

三木过去的老师海德格尔已加入纳粹党，当海德格尔就任弗赖堡大学校长发表《德国大学自己的主张》这篇就任演说时，三木清写了《海德格尔和哲学的命运》(1933年)。文中谈到“海德格尔已沈没于尼采之中”，并提出“对尼采的彻底理解、批判、克服”乃是现代哲学的重要课题，大声疾呼“纳粹的酒神式舞蹈要奔向何方？要恢复逻各斯的威力和理性的权力”！这种对海德格尔的批判、对纳粹的批判，必将联系到对逐步加强的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批判。他的立场是寻求“逻各斯和巴托斯(激情)的统一”的人道主义立场。可以认为在三木清强调恢复“逻各斯的威力”、“理性的权力”的发言背后，有他曾是出名人物时的马克思主义思考方式以及从前公开或暗中影响过他的西田哲学。在这以后，他急切地接触西田哲学。后来随着我国法西斯势力的加强和日益疯狂，甚至他的“人道主义”立场也被视为危险思想。但在另一方面，这种“人道主义”又

成为近卫新体制的智囊团。他本人就是"昭和研究会"的骨干。

他自己曾把大体上到此时为止的"思想经历"写在《构思力的逻辑第一讲》(1939年)的序里，他是这样说的。

> 前著《历史哲学》发表(1932年)之后，不断萦回于脑中的是，怎样才能把客观的东西和主观的东西、合理的东西和非合理的东西、理智的东西和感情的东西结合起来。当时我把这个问题定为逻各斯和巴托斯的统一问题这样一个公式，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把一切历史的东西分析为逻各斯因素和激情因素，然后论证它们的辩证统一。我是倾心于合理性的、逻各斯的东西的，但是主观性、内面性、激情性的东西，对我来说也是难以避开的问题。帕斯卡尔抓住了我(《帕斯卡尔著作中的人的研究》1926年)，以及海德格尔对我发生影响，都是这个缘故。我之所以从原来的历史哲学兴趣转到追求唯物史观的人学基础，也是出自同一心情。我的要求是为了追求逻各斯而不要忽略激情；同时，为了追求激情也不要忘记逻各斯，后来这种要求就以人本主义的形式出现了。这就是说，从人学发展为人本主义，体现这一发展的就是我的论文集《人学的文学论》(1934年)

读了这一段，人们可能认为三木清的"思想经历"似乎是在一贯追求一个问题。但实际上果真如此吗？他的这个"思想经历"的回忆总使人感到是后来精心编造的。不能想象三木清的特点在于他是一位始终一贯地追求问题并努力于建立体系的学问家。具有较大象征意义的逸话是，学生时代三木清的考试卷是极为优秀的，甚至比教授的讲义还高明。三木清是一个对任何问题都能深刻理解的人。"旺盛的求知欲、锐敏的感受性、广泛而丰富的理解力"(汉多野精一语)，这就是三木清的素质。但是使人感到，当他以"旺盛的求知欲"、"锐敏"地"感受"当时的一切并"加以理解"时，实际只不过描绘了好象是"思想经历"那样的东西。

这些情况，从三木清的著作和论文的思维方式上也可以看得出来。在更多的情况下，他在提出问题之后，不是直接了当地考虑解决问题本身的思路，而是大量罗列各家围绕该问题的论点，特别

是广泛搜集外国诸家的论点。其主要力量好象都用在这方面了。然后再通过介绍、解释进入议论。另外，有时甚至问题本身也是通过这种作法提出来的。“从其态度及性格上纵观先生的毕生事业，与其说先生是位思想家，莫如说他是位评论家、批评家。……先生在论及马克思或列宁、论及共产主义时，是怀着深切的同情的，但是直到最后也仍然不放弃其客观性，不离开其批评家、评论家、介绍者的立场。”（波多野精一：《关于三木清先生》）。他的《构思力的逻辑》是一本“研究笔记”，该书企图“发现”一个能从根本上拯救并升华“帕托斯”（激情）的“逻各斯”。就是这些一本书也只不过是单纯罗列海外诸家见解的一部研究笔记而已。他的这种方法和由这种方法产生的“思想经历”（海德格尔——帕斯卡尔——马克思主义——不安哲学——西田哲学——人本主义）正是昭和初期的“现代主义”时代潮流的集中表现。这个评语大概是适宜的。

这里还应该提一下这时期与三木、谷川等人一起活跃于文坛的文艺评论家小林秀雄（1902年生）的名字。1927年，他以《阿尔图·兰波》这篇毕业论文、毕业于东大法国文学系，1929年写了《各式各样的构思》，当选为《改造》杂志的悬赏论文（一等奖是宫本显治论芥川龙之介的文章《败北的文学》），他因这篇文章一跃而成为昭和文学的第一线评论家。他后来的评论活动的路程可以说就是昭和年代文学理论发展的缩影，他对昭和初年“现代主义”思潮在很大程度上是持批判态度的。

小林秀雄在其活动初期，立足于爱伦·坡、波德莱尔、兰波、纪德、瓦勒里等的法国象征派的艺术观，起着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旗手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对于以新感觉派为首的“现代派”文学也痛加批判，以他特有的文体辞藻投进当时混迷的文学界，给以很大影响。

他在学生时代的最后几年，曾倾倒于兰波，而在这前后他又倾

倒于志贺直哉，这一点就极其象征性地暗示出他的批评的两极性。小林秀雄在志贺直哉的创作中看到的是"和所有一切思想形式都发生共鸣的过剩理智"或"也要为无常现世和无可奈何的原罪流血并辗转于泥土之中的心脏"这种与近代末期"两重性格"完全无缘的"古典性"、"自然性"和"原始性"(《志贺直哉》，1929年)。他认为批判只不过是自我批评，他创造出一种主观上讲问题但又不失其客观性的创造性批评，而从根本上支持他做到这一点的则是他之所以倾倒于志贺直哉的那个内在的原始的古典人性格。

比如他读了三木清的《对新兴美学的怀疑》(1930年)以后，就批评三木是摆出一副"学者架子"，"想用小动作勾消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怀疑"的"只相信常识的人"。小林这样写道：

> 总用这样调子说什么社会、社会，对社会上的作家和批评家究竟有什么意思。所谓社会是活生生地摆在你眼前的现实。并不是在你头脑中偶然跳动的概念。但把现实的某一点分开都是同样一种社会面孔。这种社会，如同糖糕里蹦出来的金太郎① 一样没有用处。我也相信一切批评的前提应是自我批评，这乃是批评的唯一准则。但是，这并不等于艺术的批评开始同社会的批评结合起来，那种不以人世间的纷繁事物为素材的批评是不可能有的。所以说自我批评这个词应当是充满着人们的实际痛苦的。作家本人批评自己的感情与从社会角度去批评自己的感情，两者在现实中的区别究竟何在？试图找出这种区别，那正是所谓的学者根性。一位朋友曾说过这么一件事，"我小时候，硬要父亲给买两套书，一套是带到学校用的，一套是留在家里用的。后来这种根性发展下去，我才成为学者。"(《阿希耳和龟》，1929年)

这是对三木清的深刻批判。同时这也充分表现出小林秀雄的批评方式的特色。当然，必须考虑到文学和哲学两者专业的区别，但并不单纯是这个问题。

不妨再举一个例子。在谈到三木清的《关于谢斯托夫的不

① 金太郎：传说中的大力士。——译者

安》(1934年)这篇论文时，小林秀雄这样写道：

"三木氏的论文为我们分析了谢斯托夫的伦理观，这是一篇雕虫小技式的文章，内容说的是，与人是客体性存在的中心，与此相反，人是主体的存在论中心应处在什么地位，这时即产生谢斯托夫的悲剧。这是颇不得已的专业上的区别，谢斯托夫这个人发生的悲剧所在和三木氏读其书而产生的悲剧所在，是多么的不同啊！"

三木清认为，谢斯托夫的锐敏的心理描述虽然具有魅力，但其逻辑却是出乎意料的单纯，而这种单纯的原因也已弄清。但小林秀雄所怀疑的是，思想之中究竟是否存在着这种原因。

"他的逻辑归根结底可能是单纯的，而且也是暧昧的。然而，他的哲学的生、死，或者善、恶等概念却像孩童所使用的语言那样大胆而单纯。……我从谢斯托夫的论文里，感受到哲学以前的气息。说他带有所谓尼采式的书生气，也就是因为它有某种文绉绉的气味。在哲学上有些衰弱。…… 他在文化素养上有一种不懂专业的野性。他既不是悲剧主义者，也不是不安思想的宣传家。他只是一个大胆置身于当时的社会不安之中的人。如果说，在他的哲学中之所以不存在能够成为批评家的诱饵的那种结论，恰恰是由于这一点，那么，对他的哲学所作的解释，对我们的不安又能给与什么力量呢？我们学习他的，是置身其中这一点，这是产生他的悲剧的现实所在。"

这也可以说是对于三木清的解说性、介绍性的评论所作的彻底批判。同时也是对当时知识分子阶层中流行的"不安"思想的总批判。

"我不认为我国知识分子那么欢迎谢斯托夫。……像谢斯托夫那种否定性的极端思想，如果读者不是处于极端的思想饥渴之中，是决不会受其影响的。无论如何，我并不认为我国知识分子中会有这种人。当然，没有这样的人肯定是好事，索性一个没有更好。可是又怕如果真的一个没有会有损于知识分子的面子，也不好办。这才是今天知识分子的实际情况，因而就不必形容它是什么谢斯托夫式的不安了。"

这段文字极好地勾划出由于不断输入新的外国思潮，但又无

暇消化，因而弄得昏头涨脑的“现代派”知识阶层的“不安”（？）的实态。而使他们能够用来摆脱这种“现代的混乱”的，可以说就是早已存在于他们之中的那个“原始古典人”了。然而，在这些采取古典的保守主义立场得以渡过“现代主义”混乱浪潮的人们中间，又面临另外一种因而产生的危险。当昭和十年代战争危机逐步加深时，他们沿着默认战争、肯定战争的方向走去。他们返身又向省悟自己的原始宿命的方向走去，加深了同中世纪的日本人的共感，最后到达一种悟的境界。这就不能不说它是在批判“现代主义”倾向中具有积极意义的原始古典人的消极性和固有的局限性了。

最后应当指出，主要是户坂润（1900—1945）最先察觉到小林秀雄在日本法西斯化过程中的危险作用（《日本主义的文学化》1937年）；批判了“日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最时髦形式——和辻博士的现代哲学”（《和辻博士、风土、日本》，1937年）；不相信“解释家三木清的人道主义的群众性”（《三木清和三木哲学》1936年）。

前面已经说过，户坂的学历也是从第一高等学校升入京大，是三木的晚辈，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受三木的影响，一高时学理科，在京大哲学系读书时，他所关心的仍然是空间论以及其他自然科学基本研究。虽然入京大是因为慕西田几多郎、田边元之名，但他始终坚持科学的合理主义立场，对西田哲学的神秘主义非合理主义倾向持批判态度。大学毕业是1924年（大正13年）。服完兵役后，1929年任大谷大学教授，在三木清因共产党同路人事件辞去法政大学教职后，户坂接替他于1931年任法政大学讲师。积极从事评论活动，则是1932年创立唯物论研究会时开始的。著述有1932年的《意识形态概论》、1933年的《为现代服务的哲学》、《技术哲学》、1934年的《现代哲学讲话》、1935年的《日本意识形态论》、《科学论》、1936年的《作为思想的文学》、《道德论》等等。为了支持唯物论研究会的实践活动，从这时起他不仅仅单纯论述哲学问题，而

且作为一个社会评论家展开多方面的活动。他非常重视并强调批判主义、合理的批判精神，他的批评是极其大胆而坦率的。

从其批评活动开始的时期看，也能知道他批评的主要对象是已经活跃起来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它的支柱日本主义思想体系。而日本的法西斯化过程同昭和初年以来的"现代主义"潮流并不是毫无关联的。他批评"现代主义文学"说：

> "现代主义文学之所以首先被近代资本主义消费和生产的绚烂外貌所迷惑，当然是由于它的宿命，但同时也不能不说这是它致命的要害所在。说它象佛教的随喜一样，是从神经末梢出现的新感觉派开始的，很有道理。因为过份富丽的外表是首先刺戟末梢神经的。而最坏的则是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文学运动——它是不看绚烂夺目的资本主义生活外表而专事揭露其或隐或现的本质的——企图在纯文艺（虽然这个词那时可能还没有盛行起来）或新兴艺术名目下进行反动运动或逃避现实的人，就是这个感觉主义现代派的干将。更为恶劣的是，现代主义的这种感觉主义却成为一种感伤主义，而且一贯追随报刊杂志等报界所煽起的煽情主义，从狭隘性出发专门强调现代的新奇事物的感伤性一面。"（《论现代主义文学》，1934年）

户坂说，由于从各个方面同这种"现代意识"结合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人学主义"、"不安哲学"、"文学上（文化上）的自由主义"的大流行。而马克思主义"低潮期"出现的这些思潮丝毫不能抵制法西斯化进程。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过是"与民众的社会生活隔绝的文化人在其自我意识基础上产生的文化心理状态"。作为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评论家户坂润所面临的任务，始终是批判、攻击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扩大化，同时也要批判、击败这些"现代主义"的"人学主义"、"不安哲学"、"文学上（文化上）的自由主义"。

第十二章　日本法西斯的思想

一　法西斯思想体系的基本性质

日本的法西斯思想体系以超乎单纯传统的国粹主义或国家主义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开始出现在思想界，是作为对第一次大战后成熟起来的所谓"大正民主"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攻击者而出现的。同时，在从开始出现到战败为止这一时期里，它随着天皇制法西斯体制的形成和取得支配地位的过程，逐步发展到在思想上占完全统治的地位。不过，这一思想的发展过程，和我们亲身体验的、记忆犹新而且一目了然的历史事实不同，当我们想把它看作一种具有理论内容和方面的思想而加以整理和叙述其发展时，就感到面前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困难。而这种困难实际上和法西斯思想本身所具有的本质上的特殊性是分不开的。

一般地说，法西斯思想同其它社会思想或哲学，在性质上有着根本的不同。法西斯思想体系并没有一贯的理论和体系，它是按处于各个时期的具体条件，收集一些能煽惑人心的各种意识形态的片断和口号凑合起来的。即使这些片断既不统一又互相矛盾，那也不为法西斯理论家们所介意。法西斯思想体系的最终目的在于对整个国家机器实行法西斯控制和统治，把全体国民置于统一支配之下，为此，它就按需要，把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某些意识形态的形式和内容片断，通过巧妙的技术处理而加以利用。不论其是东洋的还是西洋的，尽管所有的法西斯思想体系都具有浓厚的复古主义的神秘主义色彩，但从上述意义看，这种思想体系的意图和机能过程，都属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都是高度近代化

的。因此，法西斯主义并不像其它社会运动或思想运动那样，有其一定体系的理论或哲学上和思想上的主张，然后拿它作指针开始运动并使运动开展下去。法西斯运动不是这样，概而言之，它的情况恰恰与此相反。但是，如果我们只注意到好象无思想性的这一面，而忽视隐藏在法西斯思想体系的杂烩性的杂乱状况之后的根本意图和动向，那就不仅是不正确的，而且也是非常危险的。现在我们根据丸山真男氏的出色研究和分析，把法西斯思想体系的基本特质整理为以下几个方面列举出来（平凡社版：《政治学词典》中丸山氏写的《法西斯主义》条目）。

第一，从整体看，它的思想体系和它的主张在某些方面缺乏连续性并互相矛盾，但是"从其政治机能看则是一贯到底达到惊人的程度。就是说，法西斯主义的所有意识形态都是'有系统地'服务于其反革命动员和战争动员的，服务于为达此目的首先必须进行的国民强制统一化这个目的的"。这一点，我们从上述法西斯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特异性看，是不难理解的。第二，可以归纳为，在法西斯主义的多种多样表现形式和意识形态的深处潜流着若干具有共同性的"一定的精神倾向和思维方式"。那就是：A、本国或本民族至上主义倾向（经常以相反形式表现为本国受损害的妄想型思维方式）。B、由天然的优越者进行统治的思想（从这里产生出种族歧视意识或人与人关系上的等级观念的恶癖）。C、对群众中潜在的创造力或自发的思考力极端不信任或蔑视（把群众只当作受操纵的对象，因而想方设法在宣传上使用低劣的欲望刺激和感情煽动）。D、对妇女的社会活动能力怀有疑虑（因而倾向于将妇女关在家务和育儿的圈子里）。E、重视本能、意志、直观、肉体能量，不重视理性和逻辑。F、普遍地对进步观念持嘲弄、否定态度。G、赞美战争，嘲笑持久和平。（因E、F、G项内容，认为社会科学是无用的，甚至是危险的；只尊重自然科学、尤其是其中的军事科学技

术的倾向)等等。第三，应举出的是“法西斯运动和体制当中萦绕着晦暗的虚无主义性质”。这是从面对尖锐的资本主义矛盾不能不采取战争和反革命手段的法西斯主义的本质中必然派生出来的性质。因为在这种场合，不容其有进积极性、建设性的思考，一切都以否定的、破坏性的设想为基础。

上面讲的这些法西斯思想体系的共同基本特点，大体上在天皇制法西斯主义中都有所表现。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具体分析，后面还要说到，下面我们把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发展过程，极其简单地叙述一下。不过在这里必须说明，这里说的只不过是一幅素描，谈到“日本法西斯”，这是个议论纷纷、众说纷纭的题目，现在还不是作出定论的阶段，这里只不过是以意识形态的发生和演变为中心，大体上观察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超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动向。为方便起见，这里权且列出一个全局性的时期划分表，估计不会有什么错误①。

一　日本法西斯的准备期

从第一次大战到昭和危机(1930年)

二　日本法西斯的活动期

从九一八事变(1931年)到二·二六事件(1936年)

三　日本法西斯的成熟期(同时也是它崩溃过程的开始)

从中日战争爆发(1937年)到战败(1945年)

二　日本法西斯的准备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坐获渔利从而取得飞跃发展的日本资本

① 关于分期问题实际上有多种不同的看法。举例说，田中惣五郎氏等人就把第一时期定为1931—1936年、第二时期定为1937—1940年、第三时期定为1941—1945年。但这种分期法过于拘泥于现象，尤其是对于法西斯前期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意义，恐怕是过于低估了。

主义。由于战争结束军需订货立刻消失，外国市场缩小，增大的生产力和狭小的国内市场之间的矛盾，顷刻之间陷入深刻的萧条之中。随着大战中出现繁荣景象，资本主义获得发展，逐渐使银行和大工业紧密结合起来、垄断资本走向称霸整个产业界的道路。这种情况必然引起劳工争议和参加工运人数的飞跃增长。更加上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给日本工人阶级以深刻的影响和鼓舞，这就使大逆事件以后在"严冬时代"不得不沉滞的社会主义运动，再次放出充满生机的嫩芽。这时期的工人运动与前代迥然不同的特点是，它已由以前那种由少数激进知识分子同志式的结合而发起的思想启蒙运动，发展为有组织的工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而且运动的思想水平、科学性和战斗性也提高了，它同通过普遍选举制和政党内阁制争取实现议会制民主政治的所谓"大正民主"运动两者相配合，给天皇制政权以重大威胁。（参看第十章）

在形势的触动下，大体上以1917年（大正6年）为起点，民间右翼团体不约而同地开始活动起来。和过去情况不同的是，现在陆续成立了一些独立的、具有新的人员构成和新的思想内容的右翼、法西斯团体。但是在第一时期（准备期）里，它们并没形成明确的法西斯主义行动组织，出现在政治史的前台，而只是作为鼓吹"防止赤化"和"发扬国粹"的反动团体，把力量集中在宣传活动上。不过，把这个时期的右翼团体活动轻视为"单纯的封建反动"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实质上，正是在这第一时期里，为后来大举进入活动期、成熟期的军部法西斯逐步进行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和其他国家一样，作为"战争和反革命"体制的法西斯主义，在日本也是首先作为反民主、反共产主义运动而登台的。比如这样一些事件：1920年头山满、内田良平等黑龙会、浪人会掀起的膺惩大阪朝日新闻社赤化事件，东京市神田发生的与吉野作造等人的对质演说会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在团体组织方面则有"大日本国

粹会”(1919年)、“关东国粹会本部”(1919年)、“大正赤心团”(1918年)、“纵横俱乐部”(1919年)、“犹存社”(1920年)、“自治学会”(1920年)、“防止赤化团”(1920年)、“经纶学盟”(1923年)等等，这些团体都是不遗余力地叫嚣“发扬国粹”和“防止赤化”的。下面举出的这些团体的纲领就能够如实地反映这一时期右翼的思考方式和内容。

当时最纯粹的反动右翼中有一个大日本国粹会。该会是由专门为了反对劳工争议和水平社运动而从事镇压活动的“侠客”组成的团体，它的纲领是：

一、本会为一凭意气而立、以仁侠为本领之团体。

一、以皇室为中心，广泛纠集同志，应国家之缓急，以期收奉公之实效。

一、本会会员尊重古来惯行于同志之间之血盟仪式，并以此维持之。

这完全是封建父系家长制的精神规范，充分表现该会的原始性。① 同时，又如下面举出的赤化防止团的纲领，典型地表现出它的明显的反共性质，这些都代表这一时期的基本动向。

一、因赤化乃破坏社会秩序之基础，诅咒人类之幸福，故本会誓以一死防遏之。

一、因资本家之横暴及富豪之专恣乃助长过激思想之原因，故应立促资本家富豪极力猛省。

一、劳动运动因最近与社会主义有联系而多受误解。对于真正出自劳动者之呼声，任何人皆不反对。本会力期劳动运动与社会主义分离。

上述诸团体中在准备时期最值得注意的是犹存社。在犹存社建立之前，由大川周明、满川龟太郎发起，于1918年组织过一个叫作老壮会的俱乐部。这个组织从1918年10月建立，维持了大约一

---

①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暴力团式的纯粹反动团体却是在头一个纯政党内阁的原敬内阁首相和床次竹二郎内相“多方努力”支持下组织起来的，其主要干部也都是政友会元老人士的“院外团”的人。这也足以说明日本型民主运动的一个侧面。

年左右时间，出入于俱乐部的人五花八门。其中有：

大川周明、满川龟太郎、中野正刚、高畠素之、权藤成卿、北一辉、茂木久平、岩田富美夫、鹿子木员信、堺利彦、大竹博吉、下中弥三郎、佐藤钢次郎、细信夫、草间八十雄、山口正宪、伊达顺之助、上泉德弥、岛中雄三、北原龙雄、远藤无水、沼波琼音、笠木良明、岛野三郎、宫岛大八、宫川一贯、长谷川光太郎、田锅安之助、大原达明、高尾平兵卫、小栗庆太郎、细井肇、江藤铁三郎、清水行之助等等

不管大川和满川是以什么目的搜罗了这样一些三教九流，但事实上这个老壮会的确为后来的犹存社开展正式的日本国家主义运动打下一个绝妙的基础，并提供了判断形势所需的情报资料。以老壮会的大川、满川、北为核心，再加上鹿子木、清水、岩田、笠木、岛野和后来加入的西田税、安冈正笃等，于1920年发行机关刊物《雄吼》，组成犹存社（“犹存”之名取自唐魏征的有名汉诗述怀中的“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句）。犹存社纲领是这样的。

一、建设革命的日本；

一、充实日本国民之思想；

一、合理组织日本国家；

一、民族解放运动；

一、贯彻道义的对外政策；

一、联络改造运动；

一、从精神上锻炼战斗的同志。

此外，以这个纲领的世界观背景为基础，机关刊物《雄吼》发表了这样一个宣言：

“吾日本民族必当成为人类解放斗争的旋涡中心。因之，日本国家乃是使我们世界革命思想形成之绝对者。日本国家思想上之充实与战斗化组织乃是为达此绝对目的之神自身之事业。马丁·路德所谓之家者伦理制度也之理想，方今将于日本民族之国家实现之。迫于目前之内外艰难危急，已不容吾人回避国家组织之根本改造与国民精神之创造性革命。我等并不以日本自身之改造及革命为满足。因我等坚信作为人类

解放斗争之伟大使者我日本民族之命运，是以决意祈先着手于日本自身之解放。”

从它这种主张、这种思想，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型法西斯思想体系的基本模式。同时也可以知道它同玄洋社、黑龙会、大统社、浪人会等古典型右翼以及当时承其流派的大日本国粹会、大正赤心会、大日本正义团等单纯反共、反民主团体的思想体系，显然具有不同本质的要素和思维方式。犹存社因北和大川的矛盾于1923年解散，原有人员分裂为以大川、满川、西田为中心的行地社、安冈的金鸡学院、岩田的大化会和清水的大行社。此外再加上上杉慎吉和高畠素之的经纶学盟、以赤尾敏和津久井龙雄为中心的建国会等团体，在此时期都各自提出法西斯主义纲领而开始活动，应当注意的是，大川、西田等人这时已逐渐同军部的青年将校们取得了联系。

此外，在第一个时期里，从思想史角度不能不予以重视的是，早在1918、1919年，已经出现日本型法西斯思想体系的若干基本源流。这就是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1919年执笔)和权藤成卿的《自治民范》(1919年出版)。如所周知，这两本书都是第二时期(活动期)的青年将校和民间右翼奉之为“圣典”的东西。此外，别成系统的高畠素之这时也经过一番“科学”打扮，自诩“我是国家主义者，因为我是国家主义者所以我是社会主义者。我又是社会主义者。因为我是社会主义者所以我是国家主义者。”1919年(大正8年)5月他出版了《国家社会主义》杂志，同时也就开始积极提倡组织争取实现天皇亲政下的“无剥削国家”的“无产爱国党”。再稍后一些，安冈正笃的《日本精神之研究》(1924年)和大川周明的《日本及日本人之道》(1926年)中，都各自全面展开了自己独特的日本主义哲学。关于这些思想的内容和意义，以后将进行稍为详尽的分析。在这里，我们只想明确这样一点，即第一个时期、从意识形

态方面来看也是日本法西斯的准备时期，而且在这时期中，其准备大体上已经完全完成。

三　日本法西斯的活动期

从昭和危机，九·一八事变到二·二六事件这一时期，正是日本法西斯一步步登上政治舞台；并通过民间右翼和皇道派青年将校相继发动的恐怖行动，军部法西斯逐步形成自身基础的时期。而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是陆军逐渐加紧侵略大陆战争的军事步骤。这里所说的相继不断的民间右翼和青年将校的恐怖行动，最先是1930年（昭和5年）11月樱会的组成以及因此而发动的在东京车站枪击浜口首相的事件（也是在11月）；第二年1931年（昭和6年）的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锦旗革命"事件）两起由樱会陆军青年将校发动的军事政变计划；1932年（昭和7年）二、三月间由血盟团员制造的暗杀财政大臣井上和三井理事长团琢磨事件；同年5月15日陆海军青年将校发动的五·一五军事政变；1933年（昭和8年）7月的神兵队事件；1934年（昭和9年）11月陆军青年将校发动的军事政变计划士官学校事件；1935年（昭和10年）由于强制罢免陆军教育总监真崎因而引起皇道派和统制派之间的矛盾表面化，并由此而发生刀劈永田陆军军务局长事件（相泽事件）等，经过这一系列事件，最后终于发生1936年（昭和11年）皇道派青年将校动员驻东京各部队官兵一千四百人的大政变二·二六事件。军部常常装出一副整肃军纪的面孔，但实际上，则以暴力为威吓手段，用这一个接一个的恐怖行动和军事政变为踏脚石，逐步取得政治发言权和主导权。

谈到这个时期的各个右翼、国家主义团体的活动，首先第一点应说的是1930年（昭和5年）因缔结伦敦条约而发生的所谓"干扰统率权问题"。以后，全部政治活动、宣传活动、组织活动显著活跃起

来。"造成最近一个时期日本主义运动兴起的直接原因是，滨口内阁时期的伦敦条约问题。……到滨口内阁时，十分露骨地暴露出其为金融财阀走狗的本质，在伦敦条约问题上，终于招致干扰统率权的嫌疑，缔结了亡国性的屈辱条约。因此才有草刈少校的自刎和佐乡屋留雄的愤起，所谓各位少壮军人胸中产生非除掉政党政治不可的决心，也是由伦敦条约引起的。"（津久井龙雄：《日本主义运动简史》，（1933年）事实上，此后几年间，法西斯团体确在飞跃增加。他们在危机袭来和随之而来的失业者、中小工商业者破产户的增加以及农村危机激化的社会动荡中，极其敏感地反映了这一形势，并且使其尖锐化。提出打倒资本主义、惩治财阀、排斥和打击既成政党、否定议会制度、确立天皇亲政、实行国家统制经济、亚细亚民族解放等口号。这些口号尽管尚不十分明确，但确实公开地表达了法西斯革命的意志。在此时期急剧出现的主要法西斯团体有：1930 年（昭和 5 年）结成的爱国勤劳党（天野辰夫）、爱国无产青年同盟、尊皇急进党、国体科学联盟（里见岸雄）等；1931年（昭和 6 年）结成的爱乡塾（橘孝三郎）、大日本生产党（内田良平）、以及国民解放社、解决满鲜问题同盟（头山满、朴春琴）、东亚振兴会、对外同志会（一条实孝、植原悦二郎）等，这些团体反映了九一八事变开始时的形势，以解放的名目开始宣传侵略大陆论调，1932年（昭和 7 年）成立的国维会（安冈正笃）、日本村治派同盟（津田光造）、神武会（大川周明）、国家主义青年同盟、日本国家社会党（赤松克麿）、日本国家社会主义学盟（石川準十郎）、新日本国民同盟（下中弥三郎）等等。这些组织与早有的法西斯团体一起，在第二时期开始展开积极的活动。

第二点，这个时期的法西斯团体的活动特点，应该说在于随着运动的尖锐化和活跃化，开始出现统一战线的动向。首先是1931年 3 月在津久井龙雄提倡下组成了全日本爱国者共同斗争协议会

(简称"日协"),从此开始,紧接着有国民协会筹备会、国难打开联合协议会、国体拥护联合会、日本国家社会主义全国协议会、爱国运动一致协议会的活动,但为时不长即告失败。具有强烈的父系家长制思想、壮士式英雄主义和感伤主义、浓厚的师徒如父子的关系,并且与军部或资本家都有很深的特殊资金资助关系的右翼团体,要想结成一个要求高度理论性计划性和组织性的统一战线可以说本来就是不大可能的。不过,通过这个统一战线的动向,不能不看到,在这种活动的背后,潜藏着各团体集结起来定会形成更大力量的认识和过去只限于一部分急进分子参加的运动和意识形态进一步扩大使之群众化的要求。但是,"这是为了使运动渗透于国民之中,而不像社会主义那样把组织主体放在群众的民主要求之上。它不是自下而上的组织,而是经常用国体精神进行统治和推动的自上而下的组织。也就是说它采用了群众组织中的日本性格。"(今里胜雄:《三代思想录》1944年,204页,着重点为引用者所加)。正如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回忆说的,这样的"群众化"的意图当然不会有什么可观的结果。

第三点应注意的是,在这时期里,所谓"新"官僚、"革新"官僚这一阶层的国家主义组织和活动以及在乡军人(主要是军官)的组织和活动迅速地活跃起来,并且形成一个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这样一些组织中最早的是1924年就已成立的国本社,其核心人物有平沼骐一郎、竹内贺久治、太田耕造、荒木贞夫等,参加者还有加藤宽治、本多熊太郎、铃木喜三郎、结城丰太郎、池田成彬、川村贞四郎、小矶国昭、真崎甚三郎、大角岑生、后藤文夫、河田烈、小原直等人,据说会员多时曾超过七万人。之后,1932年(昭和7年)1月,以安冈正笃、近卫文麿、冈部长景、大岛辰次郎、后藤文夫、吉田茂、酒井忠正、汤泽三千男为核心,结成国维会,这是一个囊括政府各部后起的中坚官僚而组成的强大组织。这些人在后来的新体制时代

占有何等重要位置和起过何等重要作用，是可想而知的。在乡军人的国家主义运动以前当然也曾以个人身份积极参加各种法西斯团体并起过核心作用，但到了这个时期，他们结束了本身的组织、变成军部法西斯体制在民间第一线的基层组织。走在这一步骤最前列的是1933年（昭和8年）4月组成的皇道会，接着有同年5月组成的明伦会、10月组成的三六俱乐部。特别是其中的皇道会，和平野力三一伙人的日本农民组合勾结一起，高唱兵农一致，在农村渗透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方面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此外，这些在乡军人组织抓住美浓部博士的宪法学说、制造了一个所谓"天皇机关说问题"，以此问题为口实掀起国体明徵运动，并在其中起了主导作用。

其次，简单提一下这个时期里几个思想史上的重要场面。首先应当作为第一点举出的是，当军部上层以恐怖行动和暴力为手段、换言之即以急进派青年将校和民间右翼分子的尸体作垫脚石逐步取得更大发言权时，随着军部法西斯基础的加强，对言论、思想的暴力镇压也愈益残酷。而此时的镇压亦不复只限于对共产主义，其矛头愈来愈多地指向"成为共产主义温床的自由主义"。共产主义者的转向首先是由其两个领导人佐野、锅山开其端，而后来则有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也从爱国的社会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堕落为货真价实的天皇制法西斯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沉默不言，或主动摇身一变成为法西斯份子。悲剧"黑暗的深渊"很快就开幕了。1933年（昭和8年）12月，陆军海军两省对所谓军民离间运动发表了威吓性的声明，说什么"最近，在预算问题等方面有不少人有离间军民之言行。从国防的根本看，此种军民分离运动，实乃破坏精诚团结之企图，对此，军部决不能默然视之"（12月10日陆军省声明）；同年4月内阁决定成立思想对策协议会；同年9月制定加强预防镇压取缔不稳思想方针；1934年4月设置思想

检查官制度；同年5月建立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同年6月文部省设立思想局；同年10月1日陆军省颁发“国防本义及其强化”方案：这一系列措施都是当政者为“统一国民思想”而进行的疯狂布署。在这种布署之下，他们策划了京大泷川教授事件(1933年5月10日)和天皇机关说问题(1935年2月25日)。尤其是天皇机关说问题，完全是陆海军和在乡军人为在思想领域取得决定性发言权而掀起的一次“政治运动”。同年3月贵族院众议院两院作出的“宣传国体之大义，指明人心之归趋，乃目前最大之要谛。政府将立即对与崇高无比之国体不相容之言论采取断然措施”的决议(3月22日众议院决议)；同年4月文部省向各学校颁发国体明徵训令；8月政府发表国体明徵声明等等，这意味着军部的思想统制的企图完全实现了。同时，在这个运动中，在乡军人会和右翼团体的联合组织国体拥护联合会起了很大作用，这充分表明向民间基层渗透超国家主义思想当中民间组织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国体明徵运动乃是军部法西斯发展上和法西斯思想体系统治社会进程上的重要里程碑。

这里还有必要说一下前述陆军省的“加强宣扬国体本义”的意义。拿“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这句名言作为开宗明义第一章、以国防乃“国家生成发展之根本原动力”一句以蔽之的这本小册子所具有的意义，用一句话说，就是把军部本身的根本方向——所有广义国防思想第一次大胆公开于国民面前。它虽然受到自由主义者的指责，陆军当局还是把它加以扩展，形成1936年(昭和11年)11月发表的“陆军军备的扩充及其要旨”，从此以后，随着侵略战争的逐步扩大，陆军的单独、直接发言权和影响力越发加强起来。这些小册子的内容包括对很多问题的判断和用词藻装璜起来的危险的军国主义世界观的说教，其根本思想则不外乎表达他们在国家总力战阶段上要求政治、经济、文化法西斯化和战时状态长

期化的愿望。现代战争已经不是军队对军队的战争，而是国民对国民的总力战，在这样一个阶段，脱离军事领导的国内政治是不存在的，政治是战争的一个分支机关、一种战斗工具。适应这种形势需要的指导思想就是广义国防思想，而在当前的日本却存在着很多阻碍实现这种迫切要求的思想倾向。“想以现有之机构救济贫困之大众，实现国民生活之提高，实行为打开非常时局所必要之各项紧急措施，以保障皇国之前途，实属至难。故必须从国际竞争之见地对国家全般机构加以重新考虑，对财政、经济、外交、政略以及国民教化断然实行根本改造，将皇国所拥有之巨大精神和物质潜力，组织统辖于国防目的之下，对之进行一元化运营，努力使之最大限度地适应于现势”（《宣扬与加强国体之本义》、第8页）。从这一要求出发，它力主“铲除无视国家的国际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真正统一于举国一致的精神”，要求按着“基于道义的全体主义经济观念建立适合实现皇国理想的经济结构”。这种主张显然比前一时期法西斯主义者的复古主义的、农本主义的抽象论以及志士风气的非合理主义的革命意识，向合理化方向、向现实前进了许多步，同时，原来由一部分青年将校策划的国家改造计划也逐步变成军部上层人物和全军的主张。等到中日七七事变以后，军部和金融资本完全勾结起来，确立起军部法西斯的阶段，这种思想动向就作为“高度国防国家”的政策，体现于政治或军事当局的方针、声明之中。

此外，作为这个时期思想史上的重大动向是日本精神论、日本主义哲学的统治。关于它的内容，虽然没有必要特别加以详述，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法西斯体制的加强，日本精神主义的内容也跟着逐渐增加了神秘主义、非合理主义倾向。从现象上可以举出一例，从大正年代到昭和初年的著作中，还可以看到一些理论性和说服性，但这个时期的教化文件、有关思想方面的书籍中，则完全不

加解释地使用了"皇"、"圣"、"神"等词汇，并且成为超乎一切理论之上的概念。还有那些不合逻辑、空洞无物的神秘的"行话暗语"也充斥于公开场合的发言和文件中，到该时期之末，这些东西就被正式承认是正常的，保险的语言表现而为群众所接受。镇压了一切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之后，当权者硬行灌输到人民中去的正是这些不合逻辑的、毫无内容的东西，它甚至够不上什么日本"主义"，而只不过是用"行话暗语"说出来的天皇教的咒语罢了。不久，使一切价值全部从属于以天皇名义发动的长期战争的军事价值的黑暗时期到来了。

四 日本法西斯的成熟期

这个时期是二·二六事件之后、中日七七事变、太平洋战争时期。这个时期，通过军部与金融资本和官僚相结合，由军部执其牛耳的"自上而下"的日本型法西斯＝军部法西斯体制完全形成。它与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确立在时期上是一致的。我们所以特别称之为"自上而下"的法西斯主义，是因为它和德国、意大利不同。德、意法西斯形成过程不管使用了什么样的欺骗手段，总之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的，即核心的法西斯团体通过在下面争取、动员群众发动法西斯革命或法西斯政变夺取政权。日本并不是这样，它是以现有国家机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军部逐步法西斯化，继之由这个军部掌握国家政权的主导权，是采取这样一种逐步演进的形式进行的。两者有这么大的差别，根源就在于绝对主义天皇制的政治结构和它在精神方面所起的作用。关于这个问题，这里就不再深入论述了。

这个时期的历史进程，人们是记忆犹新的，所以只简单地举出一些突出的场面。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概括日本法西斯体制的完成

期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确立时期的性质。日本资本主义一开始就由于半封建的生产关系、低工资和落后的农业关系而造成国内市场十分狭小，因此必然具有军事侵略性质。而到了这个时期，在这种固有的性质上又加上法西斯本身具有的侵略性，日本资本主义的侵略性和脆弱性就暴露无遗了。换言之，结构完备的法西斯体制的建立，必然直接导致冒险战争，并且必然使自己走上崩溃的道路。可以作为法西斯完成期标志的，在经济方面和法制方面是1938年4月1日公布"国家总动员法"；在政治机构方面是发起所谓"新体制运动"和1940年10月12日成立大政翼赞会。这时期，在国内方面，一切民主主义运动几乎全被扼杀，社会主义政党自不必说，甚至资产阶级地主政党也声称"事关日本民族之兴亡。对外应下勇断，于内则不许立异相争"（1940年8月15日《民政党解党宣言》）而自行解散；工会组织被大日本产业报国会所吞并；甚至国家社会主义团体也在"如真以国家为重，则不必仍立以任何社会主义之名称。此际应断然以国家主义贯彻始终"（绫川武治：《斥国家社会主义》）这种指责下，不得不转变为纯粹"日本主义"。1936年（昭和11年）8月制定"国策大纲"；1937年9月发表"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要纲"；同年12月发生矢内原事件和第一次人民阵线事件；1938年10月发生河合荣治郎事件；1939年7月公布"国民征用令"；1940年11月成立"大日本产业报国会"等等，这些都是这一历史进程的轨迹。

对外方面，这个时期是从中日战争急转直下走向太平洋战争失败的时期。在国内以复古形式不断加强天皇制绝对主义的政治机构，对外则以此强大的政权力量进行无止境的侵略战争。然而，以天皇制、绝对主义为本质特征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并未能建立起象德国法西斯那样的强有力的政权组织，面只能在一切责任最后归于天皇这种形式下进行活动，因此它不能以高度责任感保证贯

彻"领导者"的意志。那些新体制或翼赞组织的网络，也只能以一阵鼓噪而告终。究其原因，就在于它是"自上而下"地通过逐步演变而形成的法西斯体制和未曾建立近代的中央集权统治机构；其内部存在着派阀斗争和互相推卸责任；立身处世主义和明哲保身习气还在支配着他们；因而不可能产生积极的、前进的施政方针和措施。甚至在天皇制法西斯体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军队内部，由于兵员急剧增加和实行战时编制，训练及内务也有所松懈，其"严明的军纪"也每况愈下，日趋颓败。在一般群众中，由于生活上和感情上的欲望受到极大的压抑，厌战情绪和反对官吏的情绪愈来愈浓厚。这种种因素互相在起作用，终于使天皇制法西斯体制内在的崩溃因素尽管缓慢但是正在成熟起来。

比之第二期，这个时期的超国家主义团体的作用和活动明显削弱。这是因为随着法西斯体制的完成，无论其思想因素和人的因素几乎全都吸收到政权机构之中。另一方面，他们也就依靠攫取到的部分政治权力在民间社会进行无孔不入的五花八门的活动（各种国民运动和生活运动）。

关于这时期的思想动向（特别是知识界的动向），将在第十三章中加以详述，这里不再多说。兹举出下面一些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事例和情况。作为国家官方思想，这时期只允许《国体之本义》（1937年5月）、《战阵训》（1941年1月）、《臣民之道》（1941年7月）所表达的神话性的国体学说或以死为终极体现的天皇归一主义，并且要求把这些思想浸透到个人内心生活的信条中，因为按他们的说法，"信仰应完全建立在扶翼皇运的诚心上"（《新体制下改造基督教团体之方针》）。

五　法西斯思想的派系和代表人物

在前面的章节中概括地叙述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发展过程，

在此过程中有什么思想派系和代表人物在活动呢？各个派系，不仅意识形态上有一致性，甚至含有共同体式的人际关系和上下级的联系，这里可以指出大体有如下四个派系。但是这些派系，不论从组织上或从思想上都不可能俨然分开，现实中，有些派系或互相组合，或混杂一起，也无须特别加以说明。

（1） 玄洋社、黑龙会系统

该系统并不具有独特的思想和理论，把它叫做传统性的单纯右翼行动派倒是最为合适。从历史上看，该系统最初源出于福冈玄洋社，而1901年（明治34年）组成的黑龙会和作为它的不同派系于1908年（明治41年）组织起来的浪人会等则是它的直接源流。在人员方面，它是以内田良平、头山满为中心而纠集起来的一些人。这些人的典型特征是，身穿印有黑色家徽的褂子作为同仁标志，重仁侠与忠孝，自命为"天下浪人"，"以悲愤慷慨之调谈论天下国家"。这就是他们的特有形象。这些人作为所谓大陆浪人、破坏罢工的暴力团、恐怖主义者，曾大肆活跃于近代历史舞台的幕后。在思想方面，他们一贯打着国家主义国权论的旗号，并在嘴上总是高唱要进行国内改造，但在理论上却几乎等于零。在世界观方面，也是立足于全面肯定封建的人际关系上，他们的国粹主义、日本主义也都停留在神秘主义的教条上。该系统的基本思想脉络在黑龙会的纲领中表现得比较完整。黑龙会纲领是这样的：

一、吾人恢扬肇国之宏谟，阐扬东方文化之大道，进而图东西文明之浑合，以期充任亚细亚民族兴隆之领导者。

一、吾人将清除百端积弊如法治主义之偏于形式，束缚人民之自由、缺乏时务之常识、妨碍公私之效率、埋没宪政之本旨等，以期发挥天皇主义之妙谛。

一、吾人将改造现行制度，振刷外交以图海外之发展；釐改内政，增进国民之福利；确立社会政策解决劳资问题，以期巩固皇国之基础。

一、吾人奉体军人勅谕之精神，振作尚武之风气，举国民皆兵之实，以期充实国防机关。

一、吾人力图根本改革模仿于欧美之现代教育，建立渊源于国体之国民教育基础学说，以期发展大和民族之公德良智。

为大正民主风潮所激怒的社会势力，以黑龙会会员为中心发起了膺惩大阪朝日赤化运动，于1918年（大正7年）把朝日新闻社社长村山龙平带到中之岛公园内，在众目睽睽之下缚之于灯笼柱上，并挂上写着"替天行道诛国贼村山龙平"字样的旗子。从这一行动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本质。同年11月，在浪人会员向吉野作造的对质演说会上，他们被驳斥得体无完肤，威信扫地以后，其活动才渐渐有所收敛。第一时期主要进行活动的右翼团体大日本国粹会、关东国粹会本部、建国会、大日本正义团、内治外交振作同盟、东亚联盟义会、满鲜问题解决同盟、东洋共存会等等，都属于这个系统。

（2） 老壮会、犹存社系统

这个系统无论在世界观方面和理论方面，都具有最完整的思想体系；在实际运动方面，也应该说它是一个能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把第二个时期即活动期的日本法西斯急进份子拉进来的主流派。关于老壮会和犹存社，前面已有所叙述，这里不再多说。然而只要我们看一下集结于该组织的人员名单（参照本书第85页），就可知道该系统已成为日本法西斯的主流，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其源流。在理论方面，涉及行动目的和政治经济问题的，应以北一辉（1884—1937）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为代表；涉及世界观和历史哲学方面的要以大川周明（1886—1957）①的《日本及日本人之道》、《国史读本》（后经修改，改名《日本二千六百年史》）、《日本精

① 大川周明，战犯，在押期间精神失常，释放后，死于1957年。——译者

神研究》等著作为代表；而別具地位的则有权藤成卿（1868—1938）的《自治民范》和《君民共治论》等。如前所述，其中《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和《自治民范》是急进的民间法西斯份子和皇道派青年将校奉之为"圣典"的。可是这两者的理论内容却相距甚远，甚至可以说是互相反对的。尽管如此，在接受者的头脑中两者却又并存，在某种场合下又混合在一起，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日本的急进法西斯主义的无计划性和无领导性以及不断发动军事政变的冒险性和唯心主义幻想性的心理根源。

北一辉的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高度中央集权下的国家社会主义。他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写了这样一个《绪言》，《绪言》就是他的根本志向的概述。

"方今大日本内忧外患并至，正面临有史以来未曾有之困难。国民大多数为生活之不安所困扰，又一意步欧洲各国崩溃之后尘。而以政权军权财权为一己之私者，唯以隐蔽于龙袖，惶惶终日以图维持其不义。……欧洲各国之大战，实上天罚其骄奢乱伦而以'诺亚'之洪水声也，不能闪大破坏之后吓得狂奔狼狈之人求取完备之建设蓝图，此乃当然之理。与此相反，在彼遭破坏之五年中，我日本则得天独厚，充实五年。在彼应曰恢复，在我则可推行改造。全日本国民冷静观察上天赏罚所以如此分明之根本，认为必须确立改造大日本帝国之根本方针，制定举国一致而无一人非议之国论，以全体日本国之大同团结最终奏请发动天皇大权，卫护天皇迅速完成国家之根本改造。支那印度七亿同胞，如无我扶导拥护则无自立之途。我日本亦以五十年间增加二倍之人口增长率之发展，百年之后不得不拥有足以养育两亿四五千万人之广大领土。国家之百年等于一人之百日。忧此明日之将来而悲彼邻邦之悽惨者，又何能安于教条社会主义者流之妇孺和平论。吾人不否认起因于阶级斗争之社会进化。然而蔽眼不见人类历史以来之民族竞争国家竞争者，何谈其为科学哉。当欧美革命学说之权威诸士皆立足于其肤浅之哲学，终不能悟得'剑之福音'之时，具有高深的亚细亚文明之希腊率先以自己传统之精神完成国家改造任务，同时，举亚细亚联盟之义旗，执即将到来之世界联盟之牛耳，以宣布四海同胞皆为佛子之天道，垂其范于东西。……"

站在这种历史认识和使命立场的北一辉，要求彻底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机构，和"日本国民一家可以拥有之财产限度为壹百万元"、"凡超过私有财产限度额，应无偿交给国家"的经济政策。在中央集权制度下，实行土地改革；城市土地皆归市有；大森林、大片未垦地、大农场归国有国营。行政组织分为：银行省、航海省、矿业省、农业省、工业省、商业省、铁道省，最主要的是要求这些部门加强统一和提高工作效率。当然，在这样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中，不但禁止工人罢工，同时也禁止企业主停工。对于北一辉所勾画的这种国家形象，我们可以直接了当地说那就是高度发展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一辉的理论确有其锐敏的预见性，并且充分具有成熟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内容。此外，他的思想的独特之点还表现在天皇观上，他和其他日本主义者、国家主义者不同，他完全从神秘的天皇神格化和唯心主义国体论脱离出来，承认天皇或国体都是历史前进过程中的产物。北一辉把它概括为：

"天皇本是后世对原始时代人的一种谥号，他是一个建立在小地区和人数不多的人民之上的、由原始宗教信仰形成的家长，同其他小家族团体的家长互相争夺。在藤原时代以前，天皇实质上是一个拥有日本全国土地和人民的至上的强者。在镰仓以后的贵族国家时代，同其他家长君主一样，是其所管范围内的真正的家长君主，另外还以神道的罗马教皇的身分与镰仓的神圣皇帝不断抗争。到维新革命之后，成为代表国家主权的最高机关，经过二十三年，又大有进化，成为可与帝国议会共同组织最高机关的因素。"(《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1906年)。

由此来看，"维新革命"以后的"公民国家时代"的天皇，已不是"作为国家的所有者——家长这种意义的古代内容"了，而是"拥有国家特权的一份子，即美浓部博士所说的广义之国民"。当持有这样的天皇观的北一辉提出"拥戴天皇"时，显然不过是把天皇作为强大的"专制力"的公的集中点而加以衡量的。

权藤的思想概括言之就是农本自治主义。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他的倾向是复古的浪漫主义、无政府主义。其思想的基本观念是“自然而治”和“君民共治”，他强烈反对一切官僚主义、国家主义、中央集权的官治主义、霸道主义、王道主义。日本的国体、政治体制的理想是“天安河原之神集”，不外是建立在“自然而治”基础上的“君民共治”的实现。

“这种顺其自然而治之的‘自然而治’也可以称为‘原始自治’，它形成为自治之主体。此自治之主体产生于大众自然意志，产生修睦和协之规矩，设立合衷共济之准绳，以约束一乡一村，调整一郡一国，扩大之于全天下则为大同自治定制之起源。……如问余此自治究为何意，则答之以一语曰自然而治者大众约束之精粹也。”(《农村自救论》，1932年)。

这种自然自治的基本单位是农民，从这里导致他的所谓“社稷体统”学说。“我国之农村乃国之基础，成俗之根源”(同上书)，因此，在他看来，破坏可称之为日本国力源泉的农村的“自治力”的中央集权和重视城市，是最可痛恨之事。“现行法制之目的精神是与古制之原则完全相反”的，它不过是“以利已主义为基础，对资本主义之权力予以一切保证”而已。必须早日“将其统治权能之基础置于多数人，无偏颇地调整多数之福社，置重心于人之权能，将土宝财货利用于人之生存”、必须复归“纯正之自治主义”和“自治共存之农民运动”。这一抽象复古主义就是权藤的结论。津久井龙雄曾极力揭露这种观点的反历史的复古性，抨击其时代倒置性，大力主张“已被当今资本主义结构大环所联结起来的农村，仍想只靠农村的力量争取自救和解放，这是何等的错误”，尖锐地批判它是在国家“改造过程上完全缺少方法论”(甚至可以说是主张用不可能的方法)(《评权藤成卿氏的思想》)。这当然也有其道理。继承权藤的思想传统并把他的浪漫主义，稍稍用现实的政治蓝图和改造方法加以补充的，有《日本爱国革新本义》(1937年)的著者、爱乡塾

长崎孝三郎。

大川周明思想的基本主题是，在同西洋文明、西洋思想的对立中强调“日本精神”、“日本人的民族意识”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在这个意义上，应当说大川是“东洋道德，西洋艺术”这一主张的继承者。在他的思想出发点中，还没有完全把重心放在天皇神性传说上。倒是可以说，他的构思中心是日本的国家生命和革命=革新的关系以及日本的道义生命在世界文明史中的作用等问题。按大川的思想，日本精神的伟大和独特性，在于对各种文明成果和思想起“规定方向”的作用。而这种作用的基础又在于“直至今日国家之生命未曾中断过”的“生命一贯”性，就是“不失其旧而又能包容其新”的源泉(《日本言行》)。而这种“规定方向”的国家生命力即行扩大，就同日本精神宣扬于世界和民族雄飞海外论联系着。“国家之革新不仅势在必行，并且由于日益更新，因此国家之本质，从而吾人自身之本质亦正在逐步完全实现”(《日本及日本人之道》序)。这种国家生命发展论本身，在大川的思想中则与作为“东西文明的统一”者的“必将书写世界史新篇章的日本”的使命论相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大川总是为他所期待的日本法西斯进程提供历史哲学和文化论的理论根据。

(3) 经纶学盟系统

这是从1923年高畠素之(1886－1928年)与上杉慎吉(1878—1929年)一起建立的经纶学盟这个流派演化出来的系统，从成员看，石川准十郎、津久井龙雄、天野辰夫、小栗庆太郎、矢部周、中谷武世等都属于这一系统。从理论上说左翼转向者中的许多人和林癸未夫等人可算是这个系统的。这个系统和犹存社系统是日本法西斯运动中的两大流派，但该系统活跃于理论方面的人远比活跃于实际运动方面的人多的多。从思想体系看，它当然在更大程度

上属于正统的国家社会主义。因此，对纳粹和法西斯运动的理解和宣传介绍方面，该系统最为活跃，并且他们也最适合于这方面的活动。然而在日本型天皇制法西斯体制完成阶段，其国家“社会主义”性质也受到批判，并转化为纯正日本主义。这已在前节讲到了。

该系统的思想，实在庞杂，他们的各种详尽的改革方案之间也是有很大差异的。大体上看，它们的共同性显然在于“天皇中心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革命归根到底不外是天皇制法西斯革命。在这一点上它和北一辉系统的思想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在方法论上应把革命的主体放在何处这个问题上稍有区别。高畠素之的主张是该流派基本思想的典型。

“国家之本质在于统治（支配）。统治先于剥削。……这一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出现之后，出现了剥削与被剥削之间的对立。剥削阶级利用既有的国家职能及机关以维持其剥削并对被剥削阶级实行镇压。这样一来，剥削就与统治结合起来，于是产生了特殊的国家形态。”（《国家社会主义大义》）

“如上所述，如果国家的根本职能在于统治，那么，国家之最、理想之处将在于其统治中心的稳定，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如统治之中心经常浮动，则将妨碍统治权之圆满发挥，阻碍国家统一成长和发展。根据这一点可以断言，日本之国体是最理想的。……我国皇室实际是经常以我们所理想的‘无剥削国家’为理想，经常以人民之经济解放为其衷心愿望的。”（同上）

如果用这种颠倒的理论，把天皇主义和似是而非的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那么其后任何奇谈怪论都可以变成正当的。他的门生津久井龙雄就在“日本式的社会主义”的旗号下，大言不惭地胡诌其不合逻辑的而又露骨的侵略主张，说“满蒙不问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它是日本国民绝对需要加以占领的土地。因此，这是无论用什么手段都必须坚持到底的。”（《提倡日本式的社会主

义》）。这种论调看来也就不值得人们大惊小怪了。

（4） 国本社、国维会系统

上面已经说过，这个系统是网罗各个部门里的革新官僚而组成的国家主义团体。属于该系统的人都不喜欢把自己看作法西斯分子，而且还一直把他们的组织标榜为教化修养团体。这大概是由来于日本官僚的保身传统和“官僚”意识的心理作用。但是，在实际策划和活动方面，这一派官僚却最接近于纳粹、法西斯主义的合理性和计划性。这一派系并没有独特的指导思想，但在思想上是深受安冈正笃的影响，并且同他有很深的关系。

安冈最初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只要看看他对日本精神的论点（《日本精神之研究》，1924年，1937年增订版）就可以知道他用东洋哲学知识重新说明日本精神的倾向是很强烈的。因此，他的政治哲学的中心概念是“王道”主义，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他的革命论——“锦旗革命”论。所谓“王道”，一言以蔽之即“天子之德”、“君主之德”之道，这是与专制的、压制的“霸道”直接对立的理念。这样一种政治道德论的展开，正是新官僚集团所接受的，至于“王道”主义，无论怎样宣扬其为道义性的善政，但毕竟不可能是落脚在群众基础上的，只能是站在对被治统者民众的独善的从政立场而已，这一点在思想上完全适合于绝对主义官僚政治的要求。还应当指出安冈的独特性表现在他的革命论中。这里，他把东洋哲学中的“王道”主义和日本精神主义结合在一起。

> “……当国家生活早已陷于用平常手段不能有任何作为的萎靡沉滞状态时，国家也必将出现一个生命之飞跃——如同个人所体验到的更生一样。天道一以贯之。其国家只要天命未绝，则必将出现生命之飞跃。这个生命之飞跃即谓之曰革命。”（《日本之国体》）

这种革命不同于中国的易姓革命和欧洲的“颠覆君主之革

命"，因日本有其独特的"国体"，所以只能是"维新革命"。

"国家中的革命本来也应是天子之德。当国家濒临灭亡危机时，经常是以天皇之权威发动革命以打开新局面，唯此才成为真正的道义国家。这种情况是日本所独有的。日本之所谓革命，乃为政者对辅弼重任怠颓已极而遭受天谴之谓也。因此，其革命是奉举锦旗而发动的，反之，如果是竟敢引弓发矢射向锦旗这样的大逆不道的革命，那将纯属暴动叛乱，绝非真正的革命。而且这样的革命从来没有成功过，因此也无成功之理。"（同上书）

安冈就是以这种理论号召那些活跃于国家主义潮流中的官僚实行"革新"，而这些官僚也就以统治者自居，接受这个得到"王道"支持的"锦旗革命"。

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上述系统分类方式有时是按人的关系划分的，有时是按意识形态的同类性划分的，这都不过是姑且处理而已。这种划分系统的作法，作为线索使用虽然方便，但把它固定化，则很危险。

六　天皇制法西斯的思想内容

最后，我们想概括地讲一讲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内容和它的历史特点。

首先要说的是它的思想因素的共同倾向。这个问题从上一节也看得出来，大体可以列出下述五项思想内容：

（1）　消灭共产主义、社会主义

关于这一项，无需详细说明。无论从以"反革命"为其根本目的的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性质看，或者从日本法西斯的具体发展过程看，这一点都是很容易理解的。不过，应当注意的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经常以"国体"观念为中心论题，把共产主义说成是"国体"

的破坏者。例如，"击灭国贼共产党、全协、亚流共产党(全国劳农大众党)、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众党)"(大日本生产党政策)；"坚决反对无视国性的无产政党，以期消灭之"(爱国勤劳党纲领)。

(2) 现存资本主义体制的革新

革新的方向大致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反对的矛头几乎完全不指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而只批判现存的日本资本主义(有时还对日本的资本主义置之不问，只批判先进的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企图依靠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绝对主义政权向国家统制经济体制过渡；另一条是，像第二时期的自治主义各团体所主张的复古的农本主义。其中前者，无论它用什么样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旗号来煽动人心，实际上总是希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到来和巩固。属于后一条道路的，除农本自治主义外还有一种倾向，那就是肯定中央集权，但又一贯高唱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财阀的高调。应当看到，所以出现这种倾向，是因为不论东方或西方，法西斯主义首先是利用中产阶级的不安和动摇，动员一切可能使用的煽动手段以争取他们，同时也还必须看到昭和危机以后的日本社会情况。危机的恶果当然最强烈地、最尖锐地集中表现在日本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农村。金融资本的统治在这时期必定集中体现在对农村的压迫，因而造成中小地主、上层自耕农的没落，农产品价格暴跌、离村外出谋生者大量失业等等凋弊景象。在这种形势下提出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财阀、提倡农本主义和自给自足的自治主义等等，这是最能吸引动摇于地租争议和破产危机之间的中小地主和中上层自耕农的。此外，自从经济危机以来倍受金融资本及财阀的压迫、并且由于购买力下降而日益感到没落失望的大批中小商工业者，也对他们这种法西斯煽动越发抱有一线幻想。再就是已经陷入这种不安深渊的中产阶级，这时也成为支持日本法西斯

的一个重要阶层。当然，进入第三时期，金融资本、军部、官僚、元老重臣的联合已然实现，天皇制法西斯在体制上已经完成，这时大多数法西斯主义团体已被吸收到政权机构之中，因此上述这种反资本主义宣传也就销声匿迹了。

（3） 改革现有政治机构

在这一点上，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和主张。既有所谓"排斥议会主义"，又有否定议会本身存在之必要的，还有反对议会中心主义的和反对由既成政党摆布的议会主义的等等。一般说来，其多数是缺乏具体性的无计划、无方针的破坏主义，其共同性内容则可举出"天皇亲政主义"和"排斥既成政党"。至于"天皇亲政主义"在实践上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形式，还不明确。而后者，很多人认为这些既成政党是信奉"共产主义的温床自由主义"所以应予排斥。并指责他们是"财阀的走狗"。但到法西斯完成期，这种口号也几乎完全销声匿迹了。

（4） 雄飞世界论

关于这项内容，大概无需说明。"进入全世界"、"八纮一宇"、"日本精神发扬于全世界"、"发扬皇威"、"由日本民族解放世界"、"大和民族的伟大历史使命"、"领导亚细亚的盟主"、"东亚共存共荣"等等，其表现方式真是不计其数，总之，不过是用美丽的词藻使帝国主义侵略合理化而已。这一侵略主义的社会基础，最重要的当然在于日本资本主义的本性，而其直接原因则在于日本法西斯的支柱——城市和农村的中产阶级不可能通过进步的、革命的变革摆脱其困境，必然走上海外侵略主义。因此，他们总是赞美自给自足经济（说的不是在现有条件下的自给，而是把版图扩大到足以自足的程度），强调日本是"一无所有者"、日本是"世界各国中的无

产者”。经常唱的高调中最多的是“生命线”。于国际间处于无产者地位之日本，在正义之名义下有自彼等垄断手中夺取过来之开战权。”(北一辉:《日本改造法案大纲》)

(5) 天皇主义、日本国体论

日本法西斯的意识形态由于派系的、团体的和个人的原因，具有各种各样的主张和有时是相互矛盾的思想内容。在这当中，具有共同性的，同时也是超越于各个理论因素之上的，不言而喻是天皇中心主义；以及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主张，这种主张认为日本国体在世界史上具有其独特性和优越性。关于这一点，前面已有零星的说明。在这项内容方面，实际上并没有一定的一致方向和一致的思想内容，只不过是因人而异地表现为各种提法不同的天皇论、日本国体论、日本精神论。在家族国家观、民族使命观、皇统一系论等方面，虽然大体相同，但从其多样性上也可说明天皇中心主义和日本国体优越论等说法，决不像这些论客们所说的那样，是先天的、超历史的，而它不外是历史和意识形态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只是一种任意制造的信条，同时也只能是一种“政策”而已。然而，天皇中心主义或日本国体论的这种统治地位无疑是日本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最普遍的内容要素，这倒是必须充分注意的。

下面我们应扼要地谈一下日本法西斯的历史特点。

日本法西斯的最主要同时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特点，一言以蔽之就是日本法西斯的绝对主义性，用另外一种说法说，它始终是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直到现在，我们还经常听到这类说法，说什么日本并不存在法西斯主义，日本法西斯在本质上无非就是天皇制绝对主义。说明这是一个很难说清的问题。但是我们大体上还是可以这样说，当我们称二·二六事件时开始显露头角而在中日

战争发生后确立起来的反动政治体制为法西斯主义时，指的是其机能明显地法西斯化，但从机构上看，则是采取了加强天皇制的反动性和绝对主义性的形式。这不仅仅说明日本法西斯的出现是简单地利用了封建的或半封建的生产关系的残余以及群众意识形态的落后面和复古的封建意识形态，并且说明在进一步加强这些因素的基础上，日本法西斯主义得以形成，并加强了天皇在政权中的相对独立性。如上所述，日本法西斯主义总是以天皇作为意识形态上的根据，在思想上和实践上尽力沿复古方向加强天皇制。在法西斯体制完成期，这一侧面仍然占主要地位，所提出的主要口号也必然是"大政翼赞"、"臣道实践"。因此可以说，从思想体系上看，天皇制法西斯、绝对主义性，是日本法西斯的基本特点，在这点上，它同带有近代虚无主义色彩的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有着很大的区别。

尽管这些只不过是公开拿出来的口号或"表面语言"，甚至只不过是彻头彻尾蛊惑人心的东西，但这种神秘主义的、复古的、绝对主义的思想之所以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支配着国民，而且只是靠外力才把它打倒，这不是简单地把它看成是"神魔附体"的滑稽剧而一笑置之的问题，而是我们必须十分认真地加以考虑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用急躁的政治判断或表面上的判断把问题不了了之，或者只是把现象上的因素客观地罗列出来，都是毫无意义的。现在只想指出，日本法西斯的兴起和统治，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硬行刺向整个日本近代文化、近代思想的一把用来自戕的匕首，是一纸决算书。

第十三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思想状况

一　向超国家主义方向的推进与牵制

"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满洲事变、中日战争和后来的太平洋战争，都是在军部提出的这个口号下发动和进行的。然而这些战争究竟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创造和什么样的文化呢？是化为废墟的广岛和长崎。是三木、户坂令人痛心地死于狱中。这些事实活生生地说明这个口号是何等的虚妄。日本军事法西斯在"八纮一宇"的美名下屠杀中国民众，在国内则是在"国体明徵"的喊叫下麻痹民众的良心，窒息知识界的批判。第二次大战中的思想状况，一言以蔽之是这样一个过程，即超国家主义者与军事法西斯相勾结用"八纮一宇"和"国体明徵"制造了一个"黑暗的深渊"，不知有多少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前仆后继地进行艰苦的挣扎，最后不是滑进这个深渊就是被踢进这个深渊。由于太平洋战争中的溃败，这个过程总算打了一个终止符。但是，正如原子弹的惨祸仍然深深潜流在被害者的血液之中一样，知识分子在此过程中所受的精神创伤现在仍在隐隐作痛。知识分子对战争和法西斯采取了什么态度？不管怎说，他们是过去受过大正民主和昭和年代马克思主义的洗礼的人。真正无条件地赞美战争和法西斯的人，应该说是少数。尽管如此，特别是进入太平洋战争以后，几乎"没有进行抵抗"，这倒可以说是第二次大战中日本的思想状况的特点。战争时期的一个综合杂志编辑人曾这样说过，"然

而大多数知识份子心里是想要抵抗，而实际上却无所作为，他们各自分散地活下来了"（美作太郎《新日本文学》1956年8月）。知识分子同民众没有联系，他们分散而零星的抵抗几乎等于毫无作用。再加上企图通过伪装合作从内部削弱其恶果的那种尝试，客观上也产生了各种反效果，并接连遭到惨痛的失败。亡命是不可能的，甚至连保持沉默的自由都很难做到。现实的动向与自己的出路和自己的思想极不协调。公开发言和内部发言之间差距很大。公开发言时，只要一想到这可能是要公开发表的言论，那就除了维护国体和支持战争的话以外，什么都不能讲。然而动机和效果又不一定完全一致，说不定什么时候假面具甚至会腐蚀肉体。更为令人痛心的是，在这样的思想状况下，许多正处于精神形成期的青年，或相信"圣战"，或持怀疑态度，都派到各个战场上去（《听！海神之声》等笔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为什么知识份子必须被驱赶到这种境地？对这些发问我看必须这样回答，从根本上看，应当说是明治时期以来日本知识份子的历程本身，招致了这种处境。根据这种看法，对这种状况的分析就应该是集中精力从根本上对远东的落后国日本的近代思想及其体现者知识份子所具有的根本弱点进行研究。下面我们在考虑这一点之同时，对这一过程进行探讨。

战后追究太平洋战争责任的远东军事法庭的"起诉书"就特别重视这次战争的思想因素，其中写道"日本国民精神被那种宣扬日本民族远远优越于亚洲以及全世界其他民族的有害思想所毒害"。这里所说的"宣扬日本民族远远优越于亚洲以及全世界其他民族的有害思想"当然指的是所谓"超国家主义"（Ultra nationalism），即以"八纮一宇"或"皇道宣扬"等口号为代表的体现天皇制国家的日本至上主义思想。很明显，这个口号被用作美化日本发动侵略亚洲战争的一面"皇家锦旗"，而这句话的依据则出自日本神话里

的神武天皇诏书中的“掩八纮而为宇”(《日本书纪》卷三)。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八纮一宇”这句话原来就含有向外侵略的超国家主义的意思，也不能认为它早就是作为建国以来的理想而提出的。换句话说，“八纮一宇”这一“建国理想”并不是日本侵略亚洲的原因，而只不过是为了找到一个能够使侵略亚洲的帝国主义战争这一既成事实正当化的口实，是从日本建国神话中发现并加以夸张解释的一句话罢了。这句话原来并没有“天皇统治世界”这样明确的意思，正如外交文件中常见的译文“Universal Droitherhood”所表达的，它不过是“世界同胞主义”这样一般性的词句。所以问题不在于“八纮一宇”这一词句本身的思想内容，而是在于近代日本某些人在某种意图下利用了它。从这样的角度回顾一下，我们发现有两件很突出的事实。其一是“八纮一宇”这个口号用作日本对外政策的旗号是从1931年满洲事变以后才特别明显起来的。另一个事实是正当对外使用这个口号时，与此相呼应，对内，为了控制思想随即选用“国体明徵”这个口号作为“皇家锦旗”而挥舞开来。这两件事实表明，法西斯军国主义对外为了发动以“八纮一宇”的超国家主义为理念的侵略战争，对内就必须把那些对侵略行动可能持批判态度的一切思想全部纳入不合逻辑的“国体明徵”之类的超国家主义范围内。然而，“八纮一宇”或“国体明徵”当初作为一种口号，其思想内容是有很大通融性的，因而并不意味着残酷的思想镇压立即到来。可是，“八纮一宇”所表现的具体内容只能是以军部法西斯为主导力量的日本帝国主义正在进行侵略亚洲这一事实；同时，“国体明徵”所表现的具体内容也只能是那些与军部、官僚的思想统治机构相勾结的国粹主义右翼法西斯份子正在进行着的疯狂告密活动，因此，这两个口号实际上就必然成为残酷镇压的工具。这样一来，就在表面上何等漂亮的“八纮一宇”的皇道与“国体明徵”的臣道这一合奏曲的吹奏过程中，现实社会的思想界便一步步

地滑进超国家主义独裁的"黑暗的深渊"中。

当时，在"国体明徵"或"学术维新"的口号下进行的逮捕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活动中，最为卖力的是超国家主义思想集团，首先是以蓑田胸喜和三井甲之为首的"原理日本社"。它是1925年蓑田胸喜(庆应大学予科教授、后任国士馆大学教授)成立的右翼思想团体，成员有三井甲之(歌人)、佐藤通次(九大教授)、河村干雄(九大教授)、高田真治(东大教授)等。它以陆军为靠山，并在贵族院反动议员(井田磐楠、三室户敬光、菊地武夫等)、文部省教学局、内务省警保局、检察厅的支持下，主要以"帝大教授的思想问题"为其攻击的目标，指控自由主义教授和他们的著作为"反国体"，"昭和研究会"等也时常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下面要讲的泷川事件、天皇机关说(美浓部)事件、矢内原事件、河合事件、津田事件、京都学派事件等一系列昭和时期人所共知的思想镇压事件，几乎都和他们的活动有关。其机关刊物是《原理日本》(1925年11月创刊)，后来又以《读书人》为其活动据点。蓑田的主要著作是《学术维新》(1941年)，战争失败后因精神失常自缢身死。"原理日本社"的发起更要早些，它可以溯源于1923年成立的"人生与表现社"。在其成立宣言的一节中有这样一段话："就我们日本国民来说，'日本'就是'世界'，就是'人生'。'日本'就是活在我们心中的'宇宙'、'永远生命'，就是'信顺意志'。它就是为维护祖国日本的实践意志，就是一贯坚信'日本不灭'的信仰。"这种荒诞的日本至上主义就是他所主张的"日本世界观"的基调。那么它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从"人的直接经验是'心'，'心'的核心表现是'语言'"(《学术维新》，23页)这一原理出发而展开的语言魔术式的说教。

"思维与存在、理论与实践的问题，用不着以西欧式的认识论进行反思，言即事，意味即事之心，真理者乃对真事之分辨(Urteil・判断)，

コト(真)一词清楚地包含了真实、真言、真心、真理之全部意义，再联系到ミコト即真人、命、尊、神，从现人神天皇(スメラミコト)之统治表示“知天下事”，即怀抱无穷之至高认识——御言(ミコト)、诏(ミコトノリ)等绝对真理之词汇、语脉找出其解决的原理。这就是日本逻辑学语言之道(コトノハノミチ)的真髓。”(《学术维新》序、第2页)

按此逻辑，他们最后把《明治天皇集》宣布为“国民宗教礼仪之诵读圣典”(同书302页)。蓑田胸喜则更高喊“希望首相大臣在帝国议会作奉行庶政演说或声明时，使用‘诗’、‘言语之灵’，使之成为‘祝词’①！”(同书第7页)，在把这种神灵附体思想付诸实行的第一阶段上，他们首先提出“日本皇化之学术维新”，作为“昭和维新之前哨战”或“世界皇化之先决条件”。他们所谓的“学术维新”意味着以下内容：

“康德哲学、黑格尔辩证法思想使文艺复兴、法国革命以来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崇尚多数的’民主主义，以及可说是‘纸妖怪’、‘宗教的变种’、在社会科学领域落后于时代的荒谬理论之集大成者马克思主义横行跋扈；至今其‘幽灵’仍在徘徊而不能尽扫其祸害。学术维新意味着对这种康德哲学、黑格尔辩证法思想影响下的世界思潮、和当前日本的大学学风、教育界、言论界进行一次‘学术革命’”(同书、2页)。

按照蓑田的说法，“当前日本万恶之根源归根结蒂在于被视为‘思想参谋本部’的帝国大学之违宪反国体学风”(同书108页)，尤其是其法学部、经济学部的“民主、共产主义学风”和与之有密切联系的文学部哲学科的“康德、黑格尔学风”。西田、田边哲学也是“崇洋思想”=“侮日思想”=“危险思想”，本质上不过是一种“胡诌”而已。因此，他宣称“帝国大学之学风”一直是“非科学的因而是反国体的，因是反国体的，所以也是反国策的、旧体制的。”因而与其同伙一同表示“以真理名义，为了维护学术之权威”，坚持到底，“不见其改革绝不罢休”(同书110页)。“唯神之道”就是“真理”，“语言

① “祝词”在这里是祭神时的祭文之意。——译者

之道”就是“科学”，他们以这种狂信为前提，得出如此奇谈怪论，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在知识份子看来，这不过是可笑的“胡诌”。但是蓑田一伙却根据“诏勅”或“御制”的权威，把“国体明徵”口号吹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把学院主义的权威思想家一个个赶下台，从而成为所谓昭和维新的学界先锋。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看出与“帝国大学”学者有联系的“机关说天皇制”一派势力，逐渐被利用这些军犬般的思想家的军部“统帅权论天皇制”的革新势力所压垮，或强拉过去，是这一政治史过程在思想史上的反映。这些右翼思想家对“现人神论天皇制”的疯狂赞美，反映了军部、官僚法西斯的“统帅权论天皇制”势力的增长，它们互相利用，致力于建立思想界的独裁体制。1932年(昭和7年)，蓑田一伙向社会各方面散发了题为“司法官赤化事件与帝大赤化教授”的小册子，报纸《日本》和杂志《原理日本》也发表了同样的报导。被指控为赤化教授的有东大法学部美浓部、牧野、末弘等教授和京大法学部泷川教授，蓑田一伙说司法官员赤化的原因就在于受了这些赤化教授的思想影响。在他们来说，问题根本不在于对思想的科学批判，而只在于分为“美玉”、“坏玉”，亦即分为“合乎国体”或“违反国体”，凡是“违反国体”的思想都贴上“赤化”标志，被打击的教授进行学术申辩，他们是根本不入耳的。尤其是到了满洲事变之后，这派势力与军部的侵略亚洲行动相呼应，也就开始大肆进行国内思想界的侵略。当然，它也并不是单独突如其来地冒出来的，同一时期还有纪平正美、西晋一郎、鹿子木员信，大川周明、平泉澄等一连串“皇道哲学”派的抬头，他们都是从明治以来根深蒂固的国家主义、日本主义潜流中浮到表面上来的。

但是，用“八纮一宇”、“国体明徵”口号封上知识阶层的批判之口，还不能不经过几个过程。当时的知识阶层中，大正民主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以及昭和初年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影响

还是相当广泛相当深刻的。因此，就知识份子来说，满洲事变并不是他们所欢迎的。因为过去学得的理论告诉他们，这个战争的本质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尽管他们对此抱有反感和危惧，现实形势仍是在向战争与法西斯方向发展。早自三·一五事件、四·一六事件以来，国家权力机关便对以无产阶级政党及团体为核心力量的反战反帝运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到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以后，生活受到严重威胁的大多数国民，不愿由于中国的抗日运动而失去其贫乏的海外市场，还因为对政党政治已经厌倦、失望，于是就对企图以直接行动打破现状的军部革新派的活动频送秋波。因此愈益冲动的军部愈来愈烈地燃起其征服亚洲的欲火，同时又进一步同国内右翼势力相勾结，加紧建立军部独裁法西斯体制的步伐。知识界过去所轻视、蔑视、甚至几乎无视其存在的右翼思想家们，也正是在他们认为时机已到的时候横行霸道起来的。五·一五事件(1932年)、神兵队事件(1933年)、二·二六事件等血腥恐怖不断地在这时发生。有见识的知识份子多半是皱起眉头陷入不安，但舆论界对这些暴虐无道的行为仍然认为是出自爱国之念而报之以比较宽恕的评论。与此恰恰相反，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控制则日益加强。尤其事变以后的一个显著倾向是，其统治压力开始从施之于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扩大到自由主义思想。这个事实说明，日本资产阶级自明治时期以来用以镇压反资本主义思想的"国体"观念，随着与右翼思想家相勾结的军部法西斯的猖獗，现在已变成用以镇压原为资产阶级思想基础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工具了。过去本是对那些反对与垄断资本相勾结的天皇制政府的共产主义者才使用的"赤色"这个词，现在已扩大范围，使用于那些在承认天皇制的前提下为保卫民主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了。把"天皇"神格化，另一方面把"赤色"恶魔化，这就使得军部、官僚、右翼团体沆瀣一气展开"围剿魔女"的活

动。特别是对那些被他们视为反战反帝运动思想支柱的共产主义者的镇压，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五·一五事件第二年的1933年，河上肇、大塚金之助等被捕，小林多喜二在筑地警察署被杀，共产党干部佐野学、锅山贞亲等最后在狱中交了转向声明，接着出现大批转向者。恰恰就在此时，这一年的1月，德国希特勒获得政权，在"学术政治化"的美名下开始镇压学院学府，爱因斯坦等卓越科学家一个个被迫流亡。而作为日本驱逐自由主义学者事件第一声的有名的"泷川事件"，也是在这一年4月发生的。

在2月的第六十四届议会上，由于蓑田等人的指控，京大法学部教授泷川幸辰的刑法理论被列为"赤化思想"问题。当时的文部大臣鸠山一郎认定泷川所著《刑法议义》和《刑法读本》，在通奸罪上主张应当根据男女平等的原则；在内乱罪上主张因其动机出自追求实现较好社会的善意，所以不应把它与其他可耻的犯罪行为等同看待是"反国家的"，强迫泷川辞职。对于文部当局的这种处理，京大法学部认为是侵犯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而不予接受，学生也掀起抵制运动，而政府当局则根据文官高等分限令对泷川采取了非常手段，给以停职处分，并对抵制运动采取分化策略，把佐佐木惣一、宫本英雄、末川博、恒藤恭等八教授孤立起来，而这些教授则坚持节操不得不离开大学校园。泷川的刑法理论决不是什么"反国家的"，当时的知识份子大多数也都这样认为。但是，事件的发生和结果说明，虽然是仅此程度的自由主义思想也不能不成为镇压的对象；面对如此暴戾的镇压、即使是多么的不讲理，而当时知识阶层和学院学府的有组织的抵抗，也只能说是极其微弱的。

事情还在向前发展，这个事件的第二年（1934年），在陆军省新闻班发布的小册子《国防之本义及其宣传强化》中，军部抨击自由主义思想的用心更加露骨。前面引过的"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这句话，就是这本小册子的开宗明义第一节。论述的主要之点

楚，首先强调应时局之要求建立国防国家体制的必要性；因此必须将外交、经济、思想各方面活动按国防的目的加以调整；特别是思想领域必须排除国际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向国民贯输国家主义精神和必胜信心。

军部法西斯本来就以"天皇"的御林军自居，在"天皇"名义下极力攫取独断独行的权力，所以首先使"天皇"成为拥有"统帅权的天皇"，而使之超然于议会政治之外，进而又使它成为"拥有神权的天皇"，从而把天皇捧到无限万能的绝对权力所有者的地位。因为只有这样才更便于建立国防国家体制，同时为培植必胜信心也有此必要。但是，在他们实现其意图的道路上，广大知识阶层中的"机关说天皇"思想就成为一个麻烦的障碍物。所以，他们首先把矛头指向多年执教于东大法学部讲授宪法理论的贵族院议员美浓部达吉的学说，即所谓"天皇机关说"。在1935年的第六十九届议会上，陆军退役中将、国本社社员、同蓑田一伙有密切关系的贵族院议员菊地武夫，指控根据国家法人学说主张统治权主体在于国家，而天皇只是国家最高机关的美浓部学说是"反国体"的，并辱骂美浓部为"谋反者"、"学匪"。美浓部在议会上的"申辩"尽管条理清晰，可是指控者们却进一步把问题说成"超出学术的日本观"问题而毫不放松其扼杀之手。他们这次进攻的真正意图不在于对美浓部一个人，而是利用这个问题打击政府里的机关说支持者，如果顺利的话，则将进一步发动倒阁以图法西斯势力飞速发展。果然，右翼团体联合提出召开扑灭机关说全国大会的动议，在乡军人会也发表声明攻击机关说，陆海军两大臣联名以军方一致意见主张扑灭机关说，甚至众议院也以当时的在野党政友会为中心纠集势力，提出要求政府采取"断然措施"的决议案。慑于这次大举进攻的冈田内阁，第一步先对美浓部的有关宪法的著作处以禁刊处分，美浓部辞去议员职务，但军方、尤其是陆军不满足于此种处理，还强烈要求

发表声明，在政府内部抨击机关说。于是政府又发表"国体明徵声明"，正式表示否定机关说，说什么"天皇机关说是违反我国神圣国体的，是乖离我国国体本义的"，不仅如此，他们还发誓说，"政教以及其他一切事项均需按万邦无比之我国国体之本义行事，并显现其真髓"。这样一来，军部和右翼团体的法西斯联合战线就通过这个事件，把他们的"统帅权、神权天皇"思想成功地提到官方批准的正统思想的地位，从而建立起他们排击议会政治运动的理论上的桥头堡。所以说，法西斯势力这次取得的胜利，不仅暴露了政府和议会在军部压力面前的软弱性，并且也表明在他们的"国体明徵"旗号面前，不仅法学界，而且一切领域中的自由主义思想都陷入与"机关说"同样的命运。

自由主义没落的命运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但是，知识阶层还是在可能的范围内采取反法西斯的态度。不过他们的抵抗还没有形成为政治上的反法西斯阵线的组成部分，只是在舆论界进行零星的反抗，因此，他们实际上就不能够阻止法西斯势力向超国家主义方向推进。泷川事件发生后，以德田秋声为会长成立了坚持保卫学术艺术自由的"学术自由同盟"(1933年)，在西欧"反法西斯人民阵线"(1935年)的影响下，大森义太郎、清泽洌、马场恒吾、加藤勘十等人大声疾呼结成人民阵线的必要性，但没有产生实际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反对上面镇压的势力只有求诸下面的支持。但是，知识分子几乎失去与人民群众同步调同想法的体制，他们的抵抗，一开始就充满了悲观失望情绪。在以"治安维持法"和"出版法"为背景的"国体论"这种禁忌的压力下，人道主义也不能不有所收敛，科学的批判精神也不得不萎靡下去。处于这种境地的知识阶层开始进行自我批判，一时轰动论坛的则是"知识阶级论"。这时的知识阶级论和法西斯威胁下的欧洲知识阶级中流行的"不安"和"危机"思想一样，是同主观主义的"行动主义"倾向及存在主义的新"人

道主义"一脉相通的。新"人道主义"的倡导者之一三木清，在1935年就曾写道："当客观真理对我们极其不利时，我们能够甘于停留在这样的客观必然性面前服从它的摆布吗？不安时代的根本问题之一是怎样才能把客观的必然性主体化。现在，对于已不能以唯心主义的理想主义自持的人来说，这是很必要的，应当看到，为了使不安的人们站出来成为真正能动的人，要求提出人性论的命题。"（《关于行动中的人》，《改造》杂志），这就是当时知识阶层苦闷的自白。三木清等人的新人道主义论，从内容上看是暧昧的，但它毕竟吸引了当时慑于法西斯淫威的知识分子，支持他们站到这唯一保留下来的抵抗据点上。然而，三木的这种立场实质上并没有超出以前知识分子追求的文化主义的界限。1936年发生的二·二六事件更加震憾了知识分子的心境。用户坂润当时的话来说，那时候，"知识分子文学的'不安'突然消除"，知识分子现在意识到的确是"现实世界的现实不安"（《两种不安》载《中央公论》），知识分子面临的基本现实的"国家"或"民族"问题，要求他们重新进行沉痛的反省。昭和9年（1934年）以来展开的田边哲学所谓的"种"的逻辑，可以说是以这时的知识分子的心境为母体产生的。田边后来谈到他"不能不思考'种'的概念的动机"时，这样说过，对于当时的田边，"种"亦即"国家"，首先不外是在现实中"威胁着自我的一种存在"。换句话说，他是以"诉诸个人的良心、对照人类的普遍良心而不能不予以承认的特殊性"为内容，而且还应意识到它是"用其权力约束和强制"与之对立的个人的存在。而且，这种"威胁着自我的存在"不仅是一种"与我的意志相对立、并且具有否定它的力量的强制性存在"，"无论如何也是否定不了其实在性的"存在；而且同时"它也就是自我存在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和自我的生命根源所赖以产生的基体"的"民族"，从而也是"自我存在必须为之牺牲的"那种存在。在面对这种矛盾，考虑怎样生怎样死，这就是

迫使田边创造其"种"的逻辑的现实课题（参考《种的逻辑的辩证法》，1947年）。

田边对"威胁着自我的存在"的"种"的抵抗，在当时《改造》（1936年10月）上发表的《科学政策的矛盾》一文中有坦率的表现。他在这里勇敢地卫护了科学的批判精神，因而同小仓金之助和石原纯的科学评论一样赢得了知识阶层的共鸣。这篇文章在尖锐地揭露当局的科学政策的"矛盾"时说，"一方面对文化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加以限制，大肆鼓吹情操、信仰并用以代替知识，另一方面又主要以充实国防为目的，极力奖励自然科学"。并且指出这样的政策"结果只能模糊对现实的认识，削弱对现实的批判，因而使来自认识和批判的革新精神整个受到压抑，以达到其维持现状的目的。"从另一方面看，科学家们则"完全丧失其对国家社会缺陷的关心以及追究产生缺陷原因的责任感，而采取只要是一个能支给自己研究所需的经费的政府，不管它的所作所为是怎样的不合理也与自己无关的态度"。田边对此表示"深为遗憾"。蓑田一伙抓住该文中的"如同热爱真实、热爱善美一样，如同人类最高活动的古典希腊精神所体现的那样去热爱科学，追求不以任何实用目的为前提的纯粹知识这一点正是一般东洋思想所缺乏的"这样一句话，扣上"侮日思想"的罪名；并且还抓住"对于那个继承西欧科学文明并且科学地完成国家设施的国家现在正在强盛起来，对于这一事实，随便贴上科学文明破产的标签，这种作法终归不外是一句空话"这样一句话，就攻击为"赞美赤俄"（《原理日本》，1936 年 10月）。田边反驳他们说，"艺术精神不能直接代替科学精神"，"忧国并非侮国，因为爱它把缺陷说成缺陷并不是侮辱"（《原理日本》，1937年 5 月）。蓑田还想进一步挑衅，但田边已看透争论下去也没有什么益处就未予理睬。但是，另一方面，田边在这篇论文里又说到，"由于对国体尊严的信仰和表现于神话传说中的民族感情，作为自

觉认识我国的世界历史使命的国民的实践意志而产生，所以科学知识才得以主体化”。这就表明，他对于作为“自我赖以成立的基础的存在”的“种”，根本上是肯定的。在这样一种思想脉络基础上，田边后来终于大讲其对“自我必须为之牺牲的存在”的“种”的觉悟，展开其“历史的现实”哲学。以后又发展成为京都学派所大讲特讲的“自觉认识我国的世界历史使命”的“世界史哲学”。

二　两种“东亚新秩序”论

二·二六事件之后组成广田内阁，该内阁标榜“排除列国在东洋的霸道政策以图日满华三国共存共荣”，于1936年（昭和11年）8月按此原则制定了第一个“帝国国策基本纲要”，内阁往往首先根据军部的行动而不是政府的政策来确定日本的亚洲政策。根据纲要的方针于同年11月缔结了“日德防共协定”，第二年7月，以芦沟桥事变为开端，进入中日战争。应当注意的是，这个“纲要”清楚地规定实现“八纮一宇”口号的具体方针策略，为大东亚共荣圈这个国策思想打下基础。当然，实质上这是对军部发动的既成事实的承认，是决心沿军部的侵略路线走下去的进程表，同时也是为从理念上唤起东亚各国反对欧洲先进各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主义的抵抗意识而特制的以大义名分为号召的进程表。实际上它是充满矛盾的：如一方面它挤在西欧列强之中进行疯狂的侵略战争，一方面又高唱从西欧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亚细亚；名义上是共荣思想，实质上是侵略思想。围绕“大东亚共荣圈”论所产生的这些矛盾的性质在下述两方面已经暴露出来，即第一次近卫内阁的“建设东亚新秩序声明”（1938年）背后表明同中国民族主义政权绝缘；第二次近卫内阁“签订日德意军事同盟”表明同世界反法西斯人民战线进行对抗，可是，至少从中日战争到太平洋战争初期，这个“共荣圈”

理想无论在对外方面和对内方面，都是具有相当迷惑力的口号。这个口号，在开始时，对不少亚洲国家的群众和独立运动领袖们，还可以说带来利用日本实力扫除西欧帝国主义势力这样一种希望。而且在日本的群众和知识分子甚至某些战争领导人中，就个人来说也不能说没有抱着通过这次战争求得亚洲各民族的真正解放这种心愿的人。然而，战争进程中出现的日本的实际行动，特别是战争地点的军队的掠夺和暴行，以及军政部门的独断独行，逐渐践踏了亚洲民众的幻想和日本某些个人的善意。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被日本战争领导人称之为基于建设"共荣圈"理想的"圣战"。可是，战争的理想并没能够使战争的实质神圣化，倒是本来是在"八纮一宇"口号下由军部和右翼法西斯提出的思想体系"东亚新秩序"，现在又被那些调节资产阶级和法西斯之间矛盾的最后一张王牌"重臣"们接了过来，变成第一次近卫内阁的"声明"，并且由近卫所成立的"昭和研究会"(1936年11月—1940年10月)加以"理论"化。这些事实就使"东亚新秩序"论形成的思想史过程极其复杂化。与此过程相并行的是，第二近卫内阁推行的可以称之为"日本新秩序"论的"新体制"运动。它原是以前军部法西斯所希望的"建立高度国防国家"，而现在又通过官僚之手具体化了。近卫所采取的通过与军部法西斯妥协以消极地加以抑制的缓和政策之失败，已为后来历史所证明，同时这也是当时作为智囊团与近卫合作过的那些知识分子的失败。这里，我们首先从"东亚新秩序"论当时的思想环境入手看看中日战争中知识界的状况。

在近卫提出他的"东亚新秩序声明"前后，思想界大体上有两种互相对立的"东亚新秩序"论。两者都是站在肯定中日战争的立场上的，一个是与"国体明徵"运动结合的日本至上主义的"新秩序"论，另一个则是根本上对前者抱有知识分子的反感的所谓日本领导权主义的"新秩序"论。后者当时被称为"东亚协同体"论，它

是在"国体明徵"论方面不得不倒退的知识阶层企图以某种方式打开局面而制造出来的命题。所以,"东亚协同体"论有着"以中国民族解放为重点的左翼观点直到标榜民族主义整体观的右翼革新论这样的宽幅度",而且是带有"站在批判资本主义路线上以图某种国内改革的知识阶层的自我解嘲色调的逻辑"(《中央公论社七十年史》),它产生在中日战争的年代。这两种对立的"东亚新秩序"论从根本上看都是唱着共存共荣的调子,以否定中国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借以粉饰日本的帝国主义统治。同时,它对理解后来国内思想状况的演变过程是有着重要意义的。那么就先从与"国体明徵"论相结合的日本至上主义的"东亚新秩序"论说起。前面已经说过,蓑田一伙的"学术维新"是以作为"世界皇化"的前提条件的"日本皇化"为目标的运动,但这种"世界皇化"的思想原理作为共存共荣的原理,在"唯神之道"和"语言之道"里却很贫乏。即使用作法西斯军事行动的御用理论,在国内还可勉强行得通,但在国外宣传上则是根本拿不出手的。这一点它大体上同其他日本主义思想一样。由于知识份子的指责,于是他们就想把它充实起来。三木清说道,"七七事变至少首先使我们明白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过去那种只着重强调日本特殊性的日本精神主义在这里不能不遇到严重的限制。因为这样的思想是不能成为日中友好、日中合作的基础的。正如日本有日本精神一样,中国也有中国精神。能够使两者结合的只能是超越两者的东西。"(《日本的现实》、《中央公论》,1937年2月)

站出来回答这种反击、并从日本至上主义的立场最卖力气地鼓吹"东亚新秩序"论的是"皇道哲学"派的一员、同时又是"大亚细亚协会"干部的鹿子木员信及其一伙。鹿子木原是九州帝大哲学教授,崇拜柏拉图、赞赏尼采,随着"非常时期"的喧嚣声他也化为一个日本主义、大亚细亚主义的热心传教士。所以他的日本主义

教义也不过是纪平正美的亚流，是极其肤浅的，然而他是把它同大亚细亚主义和纳粹主义式的全体主义掺合一起，这一点使他成为军事法西斯甚为得意的哲学家。攻击学院自由主义的蓑田一伙在学院主义者当中也找到了得力的应声虫。那就是继承井上哲次郎的"国民道德论"渊流而自成其敕语教义学和神话解释学的纪平正美和西晋一郎等人的哲学。纪平当上"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的哲学领导人并成为文教官僚的思想统治政策的积极合作者，他曾作过这样的发言，"到今天还有许多人不了解帝国宪法和教育敕语是伟大的哲学"，还说："吾等日本人只有国体之哲学，而没有将国体和哲学并立并拜倒于哲学面前而为其所支配的那种哲学，如果有亦应否定之"（《国体与哲学》序、1940年）。而西晋一郎这时也开始大讲其极端的臣民之道，说什么"吾人并非诉诸理性始知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并非经过批判求诸于道理始接受敕语之教"；"皇军是受天皇敕命而征讨支那的，并非判定其为正义之后才去从军的"（《教学之说》）。文部省教学局编的《国体之本义》（1937年）和《臣民之道》（1941年）都是沿着这条宣扬"皇道哲学"路线发行和普及的。那么，这个学派究竟想从这种说教中得出什么样的"东亚新秩序"论呢？积极承担这一任务的鹿子木是这样说的。

"东亚协同体的根本原理，实质上不外是我皇国日本的'肇国之精神'"。"宣战，十一月三日我帝国政府声明在阐明建设东亚新秩序原理时称：'惟东亚新秩序之建设，渊源于我肇国之精神。此大业之完成乃现代日本国民所负有之光荣责任也。'""肇国之精神实质在于'臣服'。""而在我皇国日本，'臣服'之心早已形成，此即早已成为俨然之客观事实之天皇御治之国，东亚协同体主观指导精神之形成，……亦不外奉天皇为永远不动之中心，以皇国为根本基石而建成东亚之新秩序、实质亦即'皇统亚细亚'者也。""上述表达，如去其文饰而直言之，日支两国之关系可以一语道破，即支那希望按其历史必然之命运'被征服'，而日本则于意识历史必然之使命下意欲'征服'支那。实际上此即所谓'东亚协同体'原

始的、历史的自然所赋予之形态。"(《皇统亚细亚》，1937年)

这真是不知羞耻的侵略主义的赞歌。当然，对于把"臣服"的伦理道德强加于日本人而不感痛心的他们来说，把它更扩大适用于对待中国人民而毫不感觉羞耻，那也就不足为奇了。从这种立场出发，他们首先把仇恨的目光集中于中国的三民主义思想。

"不幸的是孙文的民族主义并不是像我们的或者说日本的民族主义和德意志民族主义所主张的那样，以其民族的最高精神作为理想内容的民族主义，而是以可谓近世西方精神之糟粕民权主义、社会主义作为内容的。然而，信奉民权主义在理论上必然伴随有侮日的思想；容忍共产主义则自然产生抗日思想。由此看来，孙文的民族主义实际上乃是满装侮日排日抗日思想火药的反日炸弹。""凡欲征讨支那者必须征讨其三民主义。无论在支那或在日本国内皆如是。"(同上书)

由此观之，鹿子木的"东亚新秩序"论又是同"国体明徵"联系在一起的。不久以后，他于1942年就任"言论报国会"会长，任该个会长后他对言论界究竟采取何种态度当然是可以予想得到的。

下面我们还要看一下另一种"东亚新秩序"论，这种"东亚新秩序"论是作为前一个极端的超国家主义的稀释剂意识而出现的。知识阶层的"东亚协同体"论开始时，与其说是出自对"协同体"的热情，不如说像三木清所说的那样，它更多地是消极地企图通过强调"东亚"去抑制超国家主义者们的狭隘的"日本"至上主义，通过强调"协同"去抑制他们赤裸裸的"侵略"和"独裁"意图。这个时期，知识阶层的心理活动是极其微妙的。既使心里怀有反战反帝情绪，但由于现实已经实行了思想统制，因而口里不能明说。然而完全闭口无言，这对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又等于生活费的枯竭。另外他们又不能象欧洲的知识分子那样逃亡国外。这已经是伴随着战争

的发生而带给他们的不可改动的现实。因此，问题是如何接受这种现实。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对已经发动起来的战争不去鹦鹉学舌，如果是自由主义者，那就尽可能从理念上把战争引上“民族协和”的道路，从而摆脱“军国主义侵略”的罪孽后果；如果是马克思主义者，那就提出“反对西欧帝国主义”争取国内资本主义体制的社会主义化。正是这种明哲保身和坚持抵抗两种心理的交织，才产生当时知识分子的“东亚协同体”论这样一种“饰以自我辩解的论理外衣”的东西来。这种心理活动，不管是自觉的或者是不自觉的，在当时知识分子大多数人中都有过。这就正象把“天要下雨了”不能不说成“还是带把伞出去罢”一样。因为时代就是这样的时代。(洼川鹤次郎：《现代文学论》)但知识分子的悲剧还不止于此。当他们在权且采取协助战争的姿态的过程中，总想使这一姿态合理化的主观努力所招致的实际结果，却常常是使本属内心思想活动的东西被逐渐拉到支持战争的路上去。甚至这种从消极肯定战争的现实出发的“饰以自我辩解的理论外衣”，在恶性循环中，却使不少思想家成为相当积极的战争肯定论者。比如以三木为首的“东亚协同体”论者中的多数人和继承其源流的“京都学派”，从他们的活动当中，以及从小林、河上、龟井等“超越近代”派的论调当中，尽管其表现形式各不相同，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种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悲剧。

参加当时的“东亚协同体”论一派的，除三木外还有腊山政道、船山信一、井伊亚夫、杉原正巳、尾崎秀实、三枝博音、相川春喜等等。这里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以三木、腊山、尾崎为主要成员的“昭和研究会”提出的理论。前已说过，该会是以后藤隆之助为中心组成的近卫文麿的智囊团，除上述诸人外，还有笠信太郎、佐佐弘雄、平贞藏、矢部贞治等人作为思想家而参加。从该会出版的《新日本的思想原理》(1939年1月)、《协同主义的哲学基

础》1939年9月）、《建设东亚新秩序之理论与方略》等一系列小册子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人所设想的"东亚新秩序"和"日本新体制"的理想。这些小册子还说明它深受三木的思想影响，而三木在该会实际是居领导地位的。那么，"昭和研究会"究竟想通过中日战争设想什么样的东亚新秩序呢？他们说：

"对现今世界所有国家来说，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是最重要的课题。因此，从时代说，七七的意义就在于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由此看来，从时代上看是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从空间上看是实现东亚的统一，这就是此次事变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

"树立建设新秩序所依据的崭新的哲学和世界观，正是我们日本人的责任。正因如此，它必须建立在协同主义原理之上。"

"日本本身也要参加到在日本领导下成立的东亚协同体之中去，因此日本本身也必须服从协同体的原则，在这个意义上，当然必须承认日本的民族主义也是有限制的。"

"不允许使日本主义成为一种单纯的复古主义。特别是在今天，有一部分日本主义者既主张日本文化的独特性，但又强烈地模仿德国，这是甚为遗憾的。"

"东亚协同体的使命必须是在东亚各民族协力合作基础上创造出有如希腊文化那样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新'东亚文化'"。（见《新日本的思想原理》）

从这些文字看就可以了解，他们所主张的以协同主义为基础的"东亚协同体"的理想，明显是反日本至上主义的，同时也是反资本主义的，还是尽可能站在世界历史的立场上的。那么，从积极方面看，他们设想的协同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协同主义是扬弃个人主义和全体主义而站在更高立场上的。它有如全体主义认为社会先于个人，承认个人据以存在的社会的实在性，但这并不等于否定个人的独立性；而又有如个人主义、尊重个人的人格、个性和能动性。"

"全体并非客观上的有，而是东洋哲学所说的那种无，它是必须从主

体性去认识的。这种无是绝对无，并不是同有对立的，而是绝对的存在。绝对和相对也不是抽象地对立着，有和无始终是相区别的同时又始终是统一的。"

"有如二元论的辩证法，它承认过程性的意义，同时又有如多元的辩证法，它尊重一即多的根本的调和。这一点对协同主义来说，只有不把历史的存在单纯只当作历史的存在，而是把历史的存在和永远的存在理解为统一的东西才是可能的。协同主义是采取了二元的和多元的辩证法的。"

"协同主义的核心是形的思想。"（见《协同主义的哲学基础》）

这样的话是三木以外的任何人说不出来的。所谓协同主义哲学，无非就是以西田哲学为背景的三木哲学。正因如此，它也就是"昭和研究会"提出的"东亚协同体"论的思想核心。协同主义排斥个人主义同时也排斥全体主义，它的理论强调"领导者并非独裁者而是群众的代表"。这种思想具体地意味着国内以近卫内阁为领导者的新体制运动，和国外以日本为领导者的新体制运动。再具体一点说，前者是通过加强官僚统治更好地为军方服务，后者是通过继续与中国民族主义联合政权作战以叛卖亚洲人民群众的希望，这也是明显的事实。这种"东亚协同体"思想本身，即使不是蓑田所攻击的"欲往西行但又装作东进，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迂回最后还是向西而去"，但是它总还是想要用尊重国体的迷雾多少蒙盖一下军国主义的色彩，这一点大概是无可怀疑的。如果说在"协同体"论者当中，真有象蓑田说的那种表面上比旁人更为卖力地支持国策而在背后使用各种策略进行反战反帝运动的人，那就是尾崎秀实。他作为第一次近卫内阁的内阁嘱托起草过"国民再组织"方案，同时他通过佐尔格同共产国际联系，从1941年（昭和16年）6月到9月，努力防止同德国相呼应的日本对苏开战。他在把日本的进攻矛头从北方引向南方的活动中所表现的出色能力，可以说是

动乱时期中最勇敢最坚忍不拔的知识份子的一个典型。尾崎作为一个"协同论"者曾活跃于社会舆论界，主张东亚和日本应从资本主义体制下解放出来，同时还竭力主张如果不是由中国的进步分子出来干，则任何"协同体"蓝图都只不过是纸上谈兵。1941年10月被捕时，他明确回答说他的行动是基于他所信仰的共产主义思想。他还明确地说，他的"协同体"论的真正意图在于，通过苏联和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以及可以与这两者进行合作的日本三者实现新体制而建立"东亚新秩序"，并把它当作"世界革命"的一环。战前的反战主义者尾崎在战争时期成为败战主义者。他认为只有日本失败才能把群众从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拯救出来。虽然有些"过信自己的力量"(像在《爱情有如陨星》中的自我反省那样)，但无容置疑他是一位纯洁无瑕的爱国者和思想家。可是法庭却宣告"要以性命谢罪于国民"，1944年11月，他被送上绞刑台。

自从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以来，近卫内阁对外打出"东亚新秩序"的口号，同时对内开始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这个运动是为了控制由于战时统制甚至涉及人民生活领域而引起的民心动摇，所以提出"浪费乃大敌"的口号，并且叫人们发誓"感谢皇军"、"消灭罢工"以提高战争意识。然而，结果只能是引起物资和言论泛滥于黑市，"精动"只不过是无能为力的精神运动之代名词罢了。可是，思想镇压的黑手一点也没有放松。1937年9月，东大法学部教授矢内原忠雄的论文《国家与理想》(《中央公论》，1937年9月)有问题，勒令撤销全文。这篇论文提出国家的理想应在于正义和爱，明确主张国家之目的不应只限于扩大和保卫主权、人民、领土，而且还必须尊重国家意志中含有的个人言论自由。这个事件的结果是，同年12月矢内原不得不辞去东大教授职务。此外，从1937年末到1938年初，山川均、荒烟寒村、铃木茂三郎、加藤勘十、黑田寿男、大森文太郎等四百多人被捕，继而又波及大内兵卫、有

泽广巳、胁村义太郎、美浓部亮吉、宇野弘藏等"学者集团"，并勒令解散日本无产党、日劳全国评议会等组织。这就是所谓"人民阵线事件"。从此以后，作为单纯"学说"的马克思主义课程也从学院讲坛上消声灭迹，《岩波文库》里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三十几种著作都被迫绝版，有关这方面的经典文献也从全国各书店全部拿掉。正是从这时开始，日本的"人民民主阵线""已非正式存在，它被禁锢在拘留所和未加宣判的及已予宣判的监狱中，监狱之外只能在所有有良心的知识份子的心底深处形成为一种潜在力"(服部之总:《东条政权的历史背景》)。在共产主义者或社会民主主义者中出现转向者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当中却出现了坚决的非合作者，河合荣治郎就是其典型。

1938年10月，东大经济学部教授河合荣治郎的《社会政策原理》、《法西斯主义批判》、《时局与自由主义》、《第二学生生活》等著作全受到禁止发行的处分。过去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而知名的河合，随着法西斯主义的抬头而变成战斗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了。他在二·二六事件发生之当时就这样说过："法西斯之所以最坏，就在于它是极少数一部分人动用"军事"(原文为开天窗)力量蹂躏国民多数的意志。……暴力也可能暂时统治世界，但它将因暴力本身的自毁作用而瓦解。真理可能一度陷入泥沼，但神之永远时光是属于真理的"("论二·二六事件"、《大学新闻》、1936年3月9日)，这段话表现了他继承康德以及格林传统的人格主义的理想主义者的气魄。他还坚决反对对矢内原教授的迫害。军部和右翼团体的攻击矛头当然集中到河合身上。1939年1月，东大当局终于对一直拒绝辞职的河合教授予以停职处分，而处分又是用不正常的手段进行的，那就是同河合一起停职的还有法西斯合作派的土方成美教授。同年二月，检察厅以河合的思想有损天皇之神圣、拥护共产主义、动摇国民思想为理由提出公诉。在法庭上河合引用苏格

拉底的故事，申明自己的思想对国家没有任何危害，如果法庭判定其为危险思想，则坚决希望处以重刑（木村健康：《河合荣治郎的一生和思想》）。后来河合被剥夺了公开发言的权利，在为自己所热爱的国家前途而忧心不已之中于1944年2月病逝。当时东京帝大因反对处分河合而辞职的有山田文雄、木村健康、腊山政道等人。此外蓑田一伙在攻击矢内原、河合的同时，还把矛头指向京大哲学系的天野贞祐。天野在其著作《道理之感觉》（1937年）中指出，日本教育的"根本缺陷在于教育没有真正的独立性"，其原因在于"第一，受军事教练（应该说军事教官）的极大束缚"；"第二，行政机关剥夺了教育的自主性"。蓑田等抓住这一点，怂恿军部，迫使这本书自发地绝版。这是后来镇压"京都学派"事件的一个伏线。石川达三的从军小说《活着的兵》（1938年3月），以"描述皇军士兵杀害非战斗员、进行掠夺及军纪松弛的情况"为理由，以违反报刊法论处，也是在这个时候。就在同一时候，在内务省警保局图书科主持的"出版恳谈会"上，"当局作为内部指示提出冈邦雄、户坂润、林要、宫本百合子、中野重治、铃木安藏、堀真琴七人的名字，要求查清杂志刊登这些人的稿件的情况"（畑中繁雄：《言论弹压史》，昭和时期）。以后，不断发出这类内部指示禁止写作的名单日益扩大。1938年11月末，"唯物论研究会"的主要成员被捕，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开始了。1940年2月，又根据蓑田的控告，早稻田大学教授津田左右吉的著作《神代史研究》、《古事记及日本书纪的研究》、《日本上代史之研究》、《上代日本社会及思想》全都受到禁止出版的处分，到了3月，以"冒渎皇室之尊严"的嫌疑而被起诉。实证主义的日本史研究也是不允许的了。

结果，知识份子完全被置于孤立分散状态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被弃置于"现实界的现实不安中"的"人道主义"只有两条血路

可寻。其中一条是在坚持反对法西斯思想家的非合理主义、日本至上主义的抵抗意识基础上产生的合理主义的"科学精神"和世界主义的"历史精神"的道路。另一条是主张在对于知识份子的文化教养及学术脱离人民群众的倾向进行自我批判的基础上批判继承民主文化传统的"重返日本"的道路。事实上，这两种主张在方向上都包含有正确的方面，只是这一点，可以说它好像是在"黑暗的深渊"的暗处开放的几朵鲜花。在"科学精神"的方面，可以举出户坂润的《科学论》(1935年)、石原纯的《科学与社会文化》(1936年)、小仓金之助的《科学精神与数学教育》、田边元的《哲学与科学之间》(1937年)、三宅刚一的《科学的形成与自然世界》(1940年)、下村寅太郎的《科学史的哲学》(1941年)等等。在社会科学方面，还可以举出在马克思主义遭受镇压之后，仍有风早八十二和大塚久雄等人的有实际内容的研究成果。在"历史精神"方面，其先驱是三木清的《历史哲学》(1932年)，后来有高坂正显的《历史的世界》(1937年)、高桥里美的《历史与辩证法》(1939年)、田边元的《历史现实》(1940年)、西谷启治的《世界观和国家观》(1941年)、铃木成高的《历史主义和国家理念》(1941年)等等，这些都是所谓"京都学派"中引人注意的著作。在"传统文化"发掘方面，开始有和辻哲郎的一些著作，还有西田几多郎的《日本文化的问题》(1940年)和谷川徹三的杂文，也都是引人注意的。在这方面特别突出的现象是马克思主义作家和评论家转向日本主义。"不安"意识，反过来说就是寻求"安心"或"觉悟"的意识。因受镇压而"违心的"转向者因追求"由衷"的境界而彷徨。在这方面有岛木健作的《生活之探求》(1937年)、龟井胜一郎的古寺巡礼、浅野晃的冈仓天心著作的日译本、林房雄的《论转向》(1941年)。林房雄认为出现大批转向者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镇压这一消极原因外，还有其积极理由。按照他的说法，在日本说来"马克思主义只是单纯的理论而并非大义"。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所谓大义必须是"人们乐于为之而死"的，但是战场上的事实却说明，那些没有为马克思主义殉节的转向者倒是"和其他士兵一样战死在那里"。因此，"所谓转向，实际上就是到达舍弃一切信仰并献身于我国国体这种境界之谓也"。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后退和战争的进行乃是欧洲近代合理主义在非合理主义现实面前破产的反映。小林秀雄也是这样，他曾这样说过"我们竭尽全力运用思想去观察现实并分析自己，所得到的结果与其说是获得了思想，莫如说给我们被强制的面部表情上带来了无可奈何的迟钝感"（"家徽与风雨可以逞强"），这是小林写的。当他面对战争的现实时又说，"日本的历史现在已经成了这个样子，大家都很担心。这个时候，抱有日本果真是在进行正义战争吗这种想法的人，可以说是对历史毫无所知的人"（《文学与自己》），最后还是到达"如果到了不能不拿起枪来的时候，将欣然为国而死"这种"觉悟"地步。他的现实主义是把他所处的现实的战争和民众的传统绝对化，并使自己通过对这种绝对现实的"觉悟"而投身其中。这个过程就是"从柏格森到宫本武藏的道路"（本多秋五：《小林秀雄论》）。龟井胜一郎回忆说："对于当时的我来说，不能不意味着已'近代化'了的日本精神恢复到病态。战争是民族复兴的愿望，战争是'超越近代'。无数的阵亡者在我眼中都是神圣的。他们在明确的行动中，实现了一种'纯粹性'"（《日本近代化的悲剧》，《中央公论》，1956年8月）这种"超越近代"是返回原来的日本和走向世界历史的共同课题。不久以后，也就是在1942年，就在这个课题之下召开了知识份子们的"知识界合作会议"。

三 "世界史哲学"和"皇道哲学"

1941年（昭和16年）10月8日黎明前，日本海军机动部队偷袭

珍珠港内的美国舰队，正午广播了宣战诏书。这一天，老诗人高村光太郎感到“为天皇虑，如今唯有舍身，拟弃诗而写诗”(《暗愚小传》)。战报相继发表，老歌人斋藤茂吉在日记中写道：“老生之红血沸腾!”。这类“恐惧”、“紧张”、“激动”的言词，坦率地表达了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大多数国民感情上的波动。可是，继续进军整个亚洲太平洋的“皇军”行动，使人忘掉开始时的“恐惧”心情、“紧张”感也淡薄下去，只有对军方的“感动”和对英美的“优越感”高涨起来。而使国民从醉梦中醒来，再次回到“紧张”和“恐惧”情绪之中的，是1943年(昭和18年)以后战争进入后期开始意识到战争前途的暗淡。开始时，怀有更深刻的“恐危”心情的知识阶层的大部分也都卷入国民感情的激流之中，尽管一方面仍然对思想控制抱有反感，但对于少年航空兵也是报以“鼓掌”的。在军事处于优势的情况下，开始负有一种“超脱”西欧理性主义的“使命感”，甚至他们那种“恐惧”的心情都将为之云消雾散。然而，这只不过是昙花一现。战局的恶化带来思想控制的加强，在国内，反倒出现在“超脱”近代理性的招牌下不得不行“拥护”近代理性之实的这种矛盾现象。而且相继不断的镇压对这样的发言也完全封锁，到了战争末期，终于出现由“皇道哲学”统治整个思想界的局面。当然，这是在濒于毁灭的军部的歇斯底里大发作的情况下产生的，因此它也必然随着战争的失败而化为乌有。然而败战并不单是崩溃，同时也是射进“黑暗深渊”的一线朝晖。太平洋战争时期思想状况的推移大体就是如此。下面我们对于这一过程的重点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当时第一高等学校教授竹山道雄关于这个时代学生层的精神状态有过这样的记述(《迪达露斯之翼》，1954年)。

“最为深刻的问题是，面临着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要来到的入伍命令和死亡的精神准备。……如何对待这个问题才能使自己从内心肯定它

是有意义的呢？关于这个问题的逻辑大体上可分为两种。

一种可以叫做历史主义。就是说，我们处于进步的、前进的历史当中，能够成为一个起积极作用的因素。

另外一种回答则是更为浪漫的，它更积极地显示人的伟大，对人们的引诱力也大。那就是，来自主体性自觉的精神，无论把它放在什么条件下，它都是自由的。"

"处在这种形势下的许多青年人认为，可以解决被灌输的理念与他们自己思想之间的矛盾的并且又是他们唯一爱读的，则是京都学派的历史哲学，是那种用充满艰涩的文字和复杂的逻辑技巧装璜起来的体系。"

当然，我们想到"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要来到的入伍命令和死亡"，已不单是学生层的问题时，就能够知道"京都学派"的"世界史哲学"对于当时的知识阶层所起的作用之大。不管知识阶层是否愿意，总要求有一种能够对即将来临的"入伍、死亡"有所"觉悟"和"使命感"的思想，而"京都学派"的哲学正好完满地回答了这个要求。它的回答方法是这样的巧妙，以致许多青年学生都靠他们的这种回答"强制地自己说服自己"（木村健康：《学生思想的变迁》）而丧生于战场，也正因如此，"京都学派"在战后才被追究责任。对于这个学派的思想内容和性质，第八章已有所论述，对我们来说，现在问题是，在这个时期它面对什么样的现实，以什么目的给以什么样的观念上的思辨。田边元的《种的逻辑××》所要达到的目的，前面已经说过了，现在再看一下西田几多郎的说法。蓑田一伙对西田哲学的攻击始于昭和二年，到昭和一十年代攻击更加厉害。对于蓑田的攻击，西田在思想上是相当在意的，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扩展，他曾这样说过，"好像有那么一股很大的潜流（Undercurent）在滚滚流动。反正是被它推涌着。一开始就觉察到了但没有挺身而出，这是聪明的，但总要走上战场毁而后已，我想这大概就是义务。"（《书简》、致和辻哲郎，1937年11月19

日）他已经予感到悲剧，表示了抵抗的决心。这同提倡“东亚协同体”论的三木清的心事是有关联的，三木曾说过：“无论我们想如何超然，如何持傍观态度，但我们是处在一种不能不全被卷入一个命运中去的形势之中。……如果是一种难以逃脱的命运，那么就应当说知识分子应该在它面前积极地站出来，主动参加解决现实问题的活动”（“写给知识阶级”、《中央公论》，1938年6月）。所谓“京都学派”的“世界史哲学”就是在这种意图之下提出来的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世界新秩序”论。“京都学派”把这种意图理论化为“主体的立场”、“世界史的立场”了。“主体的立场”指责当时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对战争所持的批判、傍观态度，是在现实中“没有把主体性责任感当作思想本身内容”的一种立场，而他们自己则认为，“生活于国家之中的国民”“应该始终立足于国家和国家生活中的政权这一方面，对国民本身从内部以否定方式提高其正义价值，进一步使自己的国家在全世界国家关系中成为主持正义的主体”，所以，“也应该在这种主体性实践的立场上形成自己的思想”(西谷启治：“宗教学”，《哲学年鉴》，1943年版)。他们就是从这种立场出发，试图从“神国日本”等一类口号中除掉日本至上主义者们的“观念上的单纯自我优越的陶醉”，而代之以“从所谓的当为即事实、事实即当为的立场出发重新把握它”(西谷：前书)、改造它。因此，关于“八纮一宇”的内容也想找到一条“在全世界面前能够从公正立场说得通的道路”，使它成为一种“超越近代西欧思想的具有远大前途的思想”(高山岩男：“日本精神史”、《哲学年鉴》，1943年版)，并且使之成为“包含有利于以日本为领导力量的建设大东亚的新未来世界的思想”。这就是“世界史立场”。持这种立场的先驱者是三木清。早在1939年三木清就这样说过：“从思想上看，最近提出来的东亚协同体也必须以新的世界史哲学为基础。它可以说是一个必定要出现的、能够说明当前世界历史发

展的、具有思想统一性的唯一哲学，也必须是一个足以扬弃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史哲学。"（"世界史哲学"、《知性》1939年1月）。

太平洋战争初期，为回答这个问题而提出"世界史哲学"的是京都学派中以高坂正显、西谷启治、高山岩男、铃木成高为主要人物的集团。这四个人在《中央公论》杂志的座谈会上发言（《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1942年1月，《东亚共荣圈的伦理性和历史性》、1942年4月，《总力战哲学》、1943年1月）的目的就在于对战争这一现实的"觉悟"和"使命感"赋以理论性。这几次座谈会在当时对政府提出的口号或超国家主义者们的说教还不甚接受的知识阶层当中产生很大影响。座谈会记录后来编成《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一书（1943年12月），曾风靡一时。同时期，又发表了高坂的《民族之哲学》（1942年4月）和高山的《世界史哲学》（1942年9月），并几经重版。该学派的"世界史哲学"的理论渊源于西田哲学的"当为即事实、事实即当为"理论，我们认为它的魅力和弱点也正在这里。该学派并不象超国家主义者们那样简单地肯定和赞美战争的事实。他们主张"像康德所说的那样，战争并不是必然要有的；或者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战争应当成为过去的往事"（高坂：《民族之哲学》）。可是，同时他们又把战争的事实看成合规律的世界史的当为，从而为肯定战争的主体性打开道路。"我们总想避免战争，这一点，人们可以回忆一下日美会谈。然其所以未能避免，正是因为那里有一个世界史的必然性。因为那是世界史的意志"。（同上书）那么，"世界史的必然性"又是什么呢？"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因于欧洲本身处于穷途末路，大东亚战争起因于西方世界体系处于穷途末路。一个来自欧洲本身的矛盾，一个来自欧洲与全世界的矛盾"（铃木：《世界史立场与日本》，下面引用的座谈会发言书名从略）。"亚细亚的抵抗是现代世界史形成的重要因素"（高山）。"我们并不是同美国或英国打仗，而是同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体制打

权。"(铃木)。这派人物是把太平洋战争这一事实当作亚细亚反对西欧帝国主义的一场解放战争的正当事业看待的。履行这一正当事业，也就能够把"模糊不清"的中日战争，即"被误解为和欧美一样的帝国主义侵略"(西谷)纯洁化、正当化。因此也就出现"世界历史在召唤日本、号召日本。我对'八纮一宇'就是这样解释"(西谷)的说法。

对于这些人的这一目的，十九世纪欧洲落后的德国的"世界史学家"朗克所使用的"Moralisch Energie"(道义的生命力)这个概念，正好是他们进行理论创造的得力武器。第一次使用这个概念的朗克的《强国论》(1833年)，正是一个把新兴"强国"普鲁士的抬头合理化的理论：这种理论既反对乘法国革命之机而兴起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这两个当时欧洲的巨大思潮，同时又排斥与此相对立的服务于维也纳体制的反动思想，从而企图在祖国普鲁士的历史进程中发现"正义"与"力"的统一、即"道义的生命力"。朗克在该书中写道："我们在世界历史发展中所看到的是各种力，而且是精神的、创造出生命的创造性的力，是生命本身、是实质上的道义的生命力"(《强国论》)。他还写道："只有依靠这种道义的生命力才能在竞争中打败竞争对象"(《政治问答》)。总之，在朗克看来，世界历史上"强国"的胜利并不单纯是"力"的胜利，实质上乃是"道义的生命力"的胜利。从这个观点出发，京都学派进一步把朗克的欧洲"世界史"的概念加以扩大，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序幕战中日本和德国的胜利，看作是"道义的生命力"的胜利。"我认为德国打胜乃是德意志民族所具有的道德生命力的胜利"(高山)。"虽然中国拥有道德，但是日本拥有道德的生命力。……中国日益受到西欧的侵略而失去其抵抗实力。与此相反，日本在目前的转变时期中能够把英美合在一起加以打击，归根到底也是由于日中两国的上述差别"(高山)。"夏威夷海战中所表现的海军精神，……非常清楚地表明

科学和精神二者是完全能够结合为浑然一体的”（西谷）。总而言之，他们想从“和魂洋才”最高现实表现的“帝国海军”精神中去发现二十世纪亚洲“强国”日本的“道义生命力”的典型体现。但是有一点是他们所否认不了的，那就是从“帝国政府”的亚洲政策直接发掘出“道义生命力”来还有“某种说不清楚”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同西欧帝国主义还有着类似的“合作和强制”之间的矛盾和二重性。所以这里就存在一个“对这种关系应当怎样加以无矛盾地说明”（西谷）的问题，从而也不得不想到“不要使所说的各得其所成为一句空话”（铃木）。

这样一种朗克式的“道德生命力”论，如果不从帝国主义时代政治与伦理两者不可克服的乖离这一事实去观察并不加深刻批判就拿将出来，结果就会有产生美化“强国”所拥有的现实“实力”的危险。京都学派的“道义的生命力”论正是如此，它对于日本的亚洲政策中的“实力”和“正义”两者间隐蔽着的矛盾，只不过表示一下对此矛盾“应当怎样去加以无矛盾地说明”，而他们那种想以“正义”去控制“实力”的善意也终究不能不以“一句空话”而告终。战后，铃木对这一点曾反省说：“在日本，国家的道义性和实力性两者没有用合理性作媒介将其结合起来，而恰恰相反，是想排斥这一合理性的媒介，这正是缺陷之所在。……结果是实力性背叛了道义性而变成暴力性，道义性最后也只能堕落为欺骗性而已”（《世界与人性》，1947年）。概括起来可以这样说，贯穿于战争时期的西田—三木—京都学派中的基本意图在于，一面顺应日本帝国主义的动向，一面尽可能地阻止它向自私的侵略主义发展。为此，暂先在名义上承认超国家主义者们所提出的“国体”或“八纮一宇”的口号，然后从内容上使之转化为西田哲学的历史哲学理念，通过这个办法使它对现实的实际进程发生反作用。这就是他们所采取的方策。可是恰因如此，他们这种哲学一方面不仅招致国家主义们的激烈

反击，而且另一方面对于亚洲各民族来说，又起了如下的作用，即为在“八纮一宇”名义下统治亚洲的日本法西斯提供了从内容上加以美化和转化的思想理论，进一步说，对于日本国内的知识阶层，也起了作用，即在“圣战”的名义下，使他们诚心诚意参加和支持这场实际上充满各种矛盾的太平洋战争。包括西田几多郎在内的“京都学派”的悲剧也就在这里。

几乎在和“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座谈会的同时，也就是“在开战一年来的理智战慄中”，又召开了一个以“超越近代”为题的座谈会(1942 年 7 月，发表于《文学界》，单行本于 1943 年 7 月发行)。参加座谈会的除文学界的小林秀雄、河上徹太郎、龟井胜一郎、三好达治、中村光夫、林房雄等人外，还有哲学界的西谷启治、吉满义彦、下村寅太郎，史学界的铃木成高，科学界的菊池正士，艺术界的诸井三郎等人，成员可谓多彩矣。他们想要为处于战争中的知识分子找出一条生活之路，首先提出“日本人之血与西欧近代理性的对立”这个题目，他们回顾了近代日本所一意追求的“欧洲式近代化”的真正内容，由此提出“现代日本人怎样做才可能”这样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应该把太平洋战争看作摆脱“近代西欧”的战争，这一点几乎是一致的，但在如何同时又克服文明开化的“日本式的近代”这点上出现了明显的对立，这就是认为应把它看作“屈服于近代西欧”因而主张“回到纯粹日本去”的林房雄的国粹主义和认为“对西欧的近代化还理解不透”因而主张向“世界史立场前进”的京都学派世界史主义两者间的对立。龟井和吉满等人则从佛教甚至天主教立场出发，主张丧失神的“近代”“再恢复神”。在这场混乱的议论中，三好、中村、下村等人对那些“回到日本去”或“超越西欧”论等轻易的主张进行抵制，他们作了有力的发言。他们说：

“或将我国古典文学中表现出来的阴郁幽暗部分牵强解释为深玄庄重；或将本属不足道的修辞末节硬说成是雄伟壮丽、古今无比；或对纯朴

的风土习俗附会以神秘意义；凡此种种，都是把我们心中希冀、要求引物来的东西硬行与过去的残缺不全的遗物联系在一起，以使人们觉得这就是实现了过去世界（不折不扣的架空世界），这种天真而又可悲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属于什么性质的呢？"（三好）

"正象过去肤浅的崇洋论横行一时一样，现在则是廉价的西洋否定论充斥耳鼓。……这些人过去曾经拥戴西洋，现在又以同样的调门拥戴我国的古典。……他们'迫不及待'地汲汲于适应时局的表面动向，成为丧失独立思考习惯的那种精神状态的人，而这种人甚至越来越多了。……恐怕是在所有的领域里，形成当前社会母体的明治文明开化政策，现在以其反面来报复我们了。"（中村）

"我们如果想要对问题始终坚持自主性，那就必须重新考虑超越近代这个问题本身。如果一方面把近代化批评为愚劣，而我们自己的现实情况又没有达到那个程度，那就只能是厚着脸皮胡说。……我们应当从'能否否定近代'这一点重新开始考虑。"（下村）

这些发言者显然是把"超越近代"论所由产生的"日本式的近代"本身之"超越"作为问题提了出来。这种论点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导致分析使它的民族主义内容与亚洲的民族主义相背离，和使知识分子的理性内容与民众生活相游离的"日本式的近代"的特殊性。但这种分析一直到太平洋战争最后惨败时也没有彻底进行。

虽然如此，从 1943 年起，京都学派的"世界史哲学"也遭到"皇道哲学"派的猛烈攻击，并逐渐退出思想舞台。代之而来的是"皇道哲学"派的季节。在这种交替的背后，战局在恶化，陆军和海军的对立在激化。1943 年 2 月，德军在斯大林格勒败退、日军从瓜达康纳尔岛撤退。战争领导人逐渐失去对"世界新秩序"蓝图的陶醉余地，不得不千方百计地设法鼓动国民的战争意识。这时，除了狂热宣传"神国不败"的信念之外，一切批判的理性都成为有害而无益的。这样一来，有利用价值的思想就剩下"皇道哲学"了。此外，围绕败战的责任问题，陆军海军之间的反唇相讥也愈演愈烈。在

这种背景条件下，“言论报国会”以及“出版会”里那些充当陆军报导部警犬的超国家主义者们，对一直受到海军支持而执思想界牛耳的“京都学派”以及为它提供发言阵地的《中央公论》便发动了猛然袭击。“情报局”和“内务省”等军方官僚们也参加了这一攻击。这场攻击的急先锋“大日本言论报国会”（1942 年 12 月成立）的成员有这样一些人。会长德富苏峰，事务局长鹿子木员信，理事中的实力派人物野村重臣、斋藤忠、斋藤晌，还有井泽弘、大串兔代夫等“日本世纪社”的一些人。“日本世纪社”（1941年成立）中主要有花见达二、井泽弘、斋藤忠、西谷弥兵卫等同人，他们曾接受“陆军参谋本部给的十万元资金”（森正藏：《风云之碑》），是作为言论统制的御用的第五纵队而成立的，它的机关刊物《日本世纪》和蓑田一伙的《读书人》一样，都是以告发自由主义思想家为专职的。还有[illegible]用机关“大东亚研究所”所属的阿部仁三等人也在言论统制的黑幕下活动，另外还有一个从编辑部方面同他们沆瀣一气的法西斯集团（《公论》、《现代》、《文艺春秋》等），他们掌握着“日本编辑人协会”（1941 年成立）的实权。“大日本言论报国会”是由内阁情报局牵线，以上述各色势力为基础组成的，它的活动是专门从事超国家主义的宣传和国内思想战。“世界史哲学”与“皇道哲学”的对立，实际上是在《中央公论》同《公论》和《现代》以及“海军”同“陆军”的对立基础上出现的。

早已开始了的“皇道哲学”派对京都学派的批判，到1943年达到极点。《中央公论》（1943年 6 月号）刊登的高坂正显的《思想战的形而上学根据》受到陆军情报部和情报局的斥责，并且该杂志的 7 月号因此而告停刊。《日本读书新闻》刊登了署名陆军报道部部员的批判京都学派的文章，《读书人》在 7 月号上刊登《哲学书批判》专辑，几乎全都是攻击西田哲学和京都学派的文章（内容是：佐藤通次的《从观者到听者》、纪平正美的《无概念的玩弄》、三井甲之

的《有关西田哲学应警惕的几点》、田中忠雄的《文化形态学批判——蛆虫猬集的的哲学头脑》等等)。还有《现代》、《公论》等也都成为这次进攻的阵地,它们的论点无非是说西田哲学是"使国民志气丑丧"(佐藤)"对乖离臣下身分的倾向没有坚定地防之于未然"(田中)、应把京都学派"从其脱离国史的理论立场出发而贸然思考"的态度看作"严重的邪念之兆"(田中)等等。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批判。1944年,野村重臣在《读书人》2月号中断言京都学派的思想是"反军的、失败主义的、反国家的",因而是"国贼",并要求《中央公论》、《改造》停刊,露骨地暴露了他们的意图。文部省当然也不能坐失时机,于同年3月成立了"思想审议会",对此问题进行审议,但由于海军教育局的抵制而不了了之(高木惣吉:《联合舰队始末记》)。但在1944年2月,就已发生由神奈川县特高警察一手策划的所谓"横滨事件"(以1942年8月号〈改造〉刊登细川嘉六《世界史的动向和日本》被禁止发行为开端的逮捕学者、编辑人事件),到了7月,《中央公论》、《改造》两家杂志被迫停刊,《日本评论》和岩波书店的命运也如风前之烛。就在这个7月,塞班岛的日军全部覆灭,东条内阁下台了,军国主义日本的崩溃时刻在迫近。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通过一种政变形式掌握思想界领导权的就是"皇道哲学"派。这一派自从太平洋战争一开始,就通过出版井上哲次郎主编的《现代哲学丛书》逐步巩固了他们的地位。这部丛书中的代表著作是,佐藤通次的《皇道哲学》(1941年)、田中晃的《生命哲学》(1942年)、斋藤晌的《日本的世界观》(1943年)、矶部忠正的《神话哲学》(1943年)、难波田春夫的《经济哲学》(1944年)等等。佐藤、田中是九州帝大的副教授,斋藤是日本出版会的书籍部长,矶部是学习院教授、难波田是东京帝大(经济学部)的副教授。还应提到的是属于这个系统的还有"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的纪平正美的《果然的哲学》(1942年)和利根川东洋的《创生哲学》(1942年)。该学派的基本思想路线

是沿国学传统，用解释学的方法阐述日本神话的一种哲学，主张只有这种哲学才是真正省悟日本人的主体性的哲学和世界观。它所强调的根本点，显然在于“绝对顺从”天皇的伦理和鼓吹“神国不败”的信念。他们解释神话的主要目的在于制造所谓“国家起源”的故事。他们说，对于日本人来说，最根本的事是“生成”而不是西欧哲学所说的“思维”和“行为”。因此，日本人的哲学不是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出发，而是从“父母生我故我在”（佐藤）出发的；不应该是西田哲学所说的“从被造者到制造者”，而应该是“从出生者到生者”（田中）的逻辑。从这里又产生认为根源性的东西不是“存在”而是“生成”、从而赞赏“果然”的哲学（纪平）；又出现煞费苦心地说明生使“成立”和“制作”如何发生的那种逻辑（利根川）；甚至还有主张在“作为生自父母的儿辈的觉悟”基础上对“生身父母（祖先＝皇祖）”的绝对权威应该“必恭必敬”尽其“绝对顺从”的伦理（矶部）。如此这般，从“出生”的原理，也就顺理成章地导出这样的结论：现代与神话时代是连续的，日本人是神的子孙，现人神天皇统治下的日本是优越于万邦的不灭之神国，国民之生命只有献之于其生身之天皇才具有最高意义。然而，企图以“神话”扬弃“历史”与“科学”的“皇道哲学”，恰恰因此而失掉其“哲学”资格，落得个只不过提供一个日本版的《二十世纪的神话》而已。最后败战的事实导致了用天皇自己的话证明了神话的虚妄性这种讽刺性的结果。

败仗的征兆已经很清楚了。开战当时的“激动”和“优越感”已经消失，国民的战争意识已经丧失殆尽，知识阶层的“恐惧”感更加深重，但这些并未能成为表面的声音。有少数人企图相信世界的“明日”将在崩溃的现实中到来。他们不能否认“死”也可能比那个“明日”更早到来。他们这种忧虑只不过寄托在政治之外的某种事物上面间接地表现出来。这就是知识份子根据良心所能表现出来

的最后"抵抗"形式。把这种忧虑寄托在"希腊哲学"上，我们可以举出出隆和田中美知太郎的话作为例子。出隆在他的《哲学的扼杀者》(当初投稿于《改造》和《哲学杂志》，后收入《希腊哲学与政治》、1943年)中就有这样一段话。

"…… 总而言之，'哲学'在它最初的苏格拉底一代，与雅典政界绝缘了。雅典在杀害苏格拉底的同时也扼杀了'哲学'，从而以后的哲学被抽去主要内容。或则，因哲学厌恶政治而变质为不问政治的哲学。在不允许直言存在的政界，直言也被敬而远之。因而扼杀、疏远直言者的无主见的政界不久也就自亡其国了。……迫切要求哲学的政治性，同时也要求政治的哲学性。我们的政治不应该是杀害苏格拉底、遏制柏拉图的直言那样的雅典政治。同时，我们的哲学也不应该是回避现实的、既无理论又无气力的个人伦理。"

这是出隆对日本政治的"一片忧虑"的由衷之言，同时也是对他所属的东京学派"学院哲学"现状的严峻的自我反省，而且也是使人预感到他的战后思想活动状况的话。与此同时，田中美知太郎在《逻各斯与观念》(1947年出版，所收论文为 1938 年到 1943 年期间的文稿)一书中所说的话，同样是忧虑当时国家处境的表现，同时也含有暗地批判京都学派的"世界史哲学"之意，虽然和出隆并不完全相同，但也暗示了战后田中本人所要走的道路。他说：

"……我们应向哪里寻求现实？胜者相信阿谀奉承的言词而忽视现实，败者不顾现实反而想寻找救助之路。……胜者之不幸究竟在哪里？说起来就在于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指望现在。而且现在只有在现在才有指望。如果我们始终指望它，那么我们就要被自己指望的东西所欺骗。现象就变成了假象。这已经被这一二年来的形势所证明。这正如同所谓 sub specie bienui的世界史考察一样，已经被世界历史本身所驳倒。所谓现实，这个问题也是如此。……因此，我们所应寄以希望的必须是某种超越现在的东西。实际上那就是永远常存的东西。"(《现实》1942年)

这种"忧虑"已经成为现实，而既已投之于现实中的"当为"又违背了当初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摆在思想家面前的道路只能

是，在期待于"明日"当中，从现实里寻找通往"永远"的觉悟境界。1943年末，出隆对"开赴战场的青年学生们"只说了这样一句话，"诸位，壮丽地死去吧！这是我唯一的祝愿。"(《诗人哲学家》序、1944年)这绝不是爽朗地"肯定战争"的语言，而是出隆对自己本人说出的痛心的"必定走上死路"的话。田边元早已"为国家与自己个人之间的矛盾、引伸为自己本身的分裂与绝望而苦恼"，"自从昭和十六年秋即已绝于笔墨而不发一文"(《种的逻辑的辩证法》序)。1944年务台理作也在寻求着关于"我们生于此长于此又不能不死于此的场所"的逻辑，写出了《场所之逻辑学》。1945年西田几多郎在《日记》中写了"蔬菜也渐渐没有了。只好吃野草"，"昨夜京滨西南地区遭受轰炸。炮声隆隆，闪光赫赫"等一些话。这时，一直到死，他专心致志于数理哲学和宗教哲学的研究。他的绝笔之作是《关于我的逻辑》(1945年6月)。这一年的5月，一直被囚在东京拘留所的户坂润被送到长野，战争结束前夕的8月6日死在狱中。疏散到崎玉县继续撰写其遗稿《亲鸾》和《西田哲学批判》(遗失)的三木清，以违反治安维持法嫌疑被捕，在战争结束后的9月26日死于丰多摩拘留所。死因是"营养失调和疥癣"引起的急性肾炎。这期间，一边是"一亿玉碎"的鞭子仍然抽在国民大众的身上，一边是政府内部以重臣元老为中心策划结束战争工作于密室。这件工作当然不是为国民着想的，而是为了"维护国体"和"防止共产革命"，也就是说为了摆脱内外危机局面设法找到保存天皇制统治体制的办法罢了。以"肇国精神"为大义名分而开始的战争现在已经不得不在"维护国体"的大义名分下考虑收拾残局了。但是，结束战争的工作一直落后于战局发展的速度。德国已于5月投降，7月发表了"波茨坦宣言"。这个宣言决定废除日本的军国主义和实行民主主义，并劝告尽快决定讲和。然而政府和军部却在下不了决心接受中过日子。8月6日，美国终于在广岛投下原子弹，一瞬之间，二

的几万市民遭杀害。接着，8日，苏联宣布对日参战，9日，又一颗原子弹投到长崎。终战诏书送上无线电广播电波是8月15日正午十二点。仗是打完了。战争的失败对日本的知识份子和民众来说，与其说是屈辱倒不如说是解放。而且，这也是思想上的解放，也必然是思想上的解放。

第十四章　近代日本思想史上的一些问题

一　近代日本思想史中的传统思想和外来思想

1

本节的主题是"近代日本思想史中的传统思想和外来思想"问题，为什么在从方法论上对近代日本思想史加以检查和探讨时，必须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呢？

一般说来，思想史的任务在于从思想赖以产生的社会整体中尽可能具体地把握思想。那些由思想家们规定的不同角度的方法论，可以说是完成上述各种思想史任务的不同途径。当我们从方法论上对近代日本思想史加以检查时，提出近代日本的传统思想和外来思想两者的互相关系问题，也不外乎想在活的具体的整体中把握近代日本的各种思想。

战后的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不是从文化史、社会经济史以前的旧政治史出发，而是从经济深度和意识形态广度上理解的政治史出发"的，也就是说，它是作为"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的政治史研究这一史学新动向（例如远山茂树的《明治维新》）之一环而出现的。或者说，它是在上述新动向的启发下，开始着眼于政治思想领域，去研究作为相对独立于"基础"的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对"基础"的反作用的，从而开辟了一条克服战前那种已陷入"经济主义""反映论"的思想史方法论的途径。

由于找到了这样一种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才使得"历史唯物

主义”的“意识形态论”成为有效的思想史方法论并收到丰硕成果。而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论”，用经典语言表达的话就是，以作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生产关系的总和——为“现实基础”，去把握或说明建立在它上面的，并受其制约而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上层建筑——法律、政治、宗教、艺术以及哲学等各种意识形态。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问题在于把只靠这种从内容上把握思想的“意识形态论”观点，当作全面解释近代日本思想的方法论，是否完全可靠。

思想是活的。所谓思想是活的，就是说任何一种思想，只要它称得起是一种思想，它就应当起到从根本上制约人们日常伦理行为方式的作用，因此，活的思想是深深扎根于其所由形成的民族精神环境的土壤之中的。正因如此，活的思想同其所由形成的基础即固有的民族精神环境常常是相对的。但是，这同主张人类社会的经济结构分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近代资产阶级的”相继发展阶段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是不一样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发展阶段上，都有着与其相适应的一定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对于“社会经济结构”总是相对的。而我们的论点则是，从根本上承认思想的民族精神环境的相对性，但并不等于承认思想具有超乎民族精神环境差异性之上的人类普遍合理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同我们相反，因为它是以思想的超民族精神环境差异性的人类普遍合理性为前提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论”实际上是以思想的国际普遍性为前提而制定其自己的科学普遍规律性的。作为历史的例证，人们可能举出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叶西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直到现在仍在广泛普及和传播着这一事实。的确，这一历史事实好像能令人相信思想的人类普遍合理性。而我们也绝不吝惜承认这个历史事实，不过也应该指出，在这个事实背后经常掩藏着

下面这样的真相。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产生于它据以形成的历史基地西欧土地上，当它被移植到斯拉夫土地或亚洲土地之上，由于它在这里获得了民族精神环境的土壤，从而形成为该民族的活的哲学世界观，这时总是要因其固有的民族性或者精神环境性而变形的。也就是说，在近代西欧这一特定的民族精神环境中培养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在斯拉夫或亚洲的民族精神环境下发生变形，那将不会作为一种活的民族哲学世界观在苏俄或新中国发生作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活的思想，通过取得民族基础并以固有的民族生活感情为媒介而形成为该民族的民族思想之后，也就必定成为相对于民族精神环境的思想了。

那么，思想的国际普遍合理性是什么意思呢？那是说，在思想当作手段体系掌握时它所取得的普遍合理性。可是，作为手段体系的思想，即使具有国际的普遍合理性，还是不能直接成为一种活的思想——从根本上制约人的伦理行为体系的思想——本身。我们主张活的思想的民族精神环境下的相对性，大体上是根据上述理由的。问题在于，作为具有国际普遍合理性的手段体系的思想，是否能够通过民族特点深深扎根于固有的精神环境之中，从而形成为民族的活的思想。如果这个课题能够得到解决，思想的国际性和民族性就将不相矛盾地统一起来。苏俄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方面已经解决了这个课题，而新中国好像也正在解决这个课题。

上述见解，虽然是我们的一份答案假设，但它包含着对思想的全人类普遍合理性这一通说的批判性探讨，因此它也是近代日本思想史方法论讨论的前提。从这里我们可以提出一个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论"观点相并行，从传统思想和外来的西欧思想互相渗透互相影响进行研究的观点，并使之在近代日本思想史的方法论上起相辅相成的作用。

如所周知，近代日本思想史是以我国接受近代西欧各种思想

为历史起点，并同这一接受过程同时展开的。因此，近代日本思想史显然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其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枢轴——外来的西欧各种思想同使之导入我国的不可缺少的基础——传统的儒佛思想之间的互相渗透互相影响这个问题。当然，这个外来的西欧思想同传统的儒佛思想的渗透、影响问题，是和接受外来的西欧思想之后成立的近代日本思想究竟是由哪一个社会阶层实现的，它在意识形态上起了什么样的作用等"意识形态论"问题有密切关系。而这个问题的实质又始终属于"东洋"同"西洋"这两种异质的文化圈或精神环境两者互相渗透的问题。因此，这个问题只用以根本的阶级对立——即从单一社会制度内的纵的关系着眼——为首要着眼点的方法论的那种"意识形态论"的观点，是说明不了的。

总而言之，我认为，"意识形态论"用作思想史方法论而发挥其效能，只限于对单一的社会体制下的思想进行基础研究时才有可能。如果是两个异质的文化圈或精神环境互相渗透问题，以甲方原产的思想向乙方传播、移植的形式构成一个新的思想内容时，那就只能把"意识形态论"观点和处理传统思想与外来思想交锋时有效的那种方法论相辅相成地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其效能。

这就是我认为在回顾、探讨近代日本思想史方法论时必不可免地、也是必不可缺地应当制定一个研究传统思想和外来思想互相渗透问题的着眼点的理由。

2

正当国家主义教育改革论者森有礼努力推行史学界称之为"鹿鸣馆"欧化主义的自上而下的欧化政策的明治二十年，在"平民主义"旗帜下网罗当时最为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为其撰稿的杂志《国民之友》创刊了。创刊号上刊登了德富苏峰执笔的一篇社

论，其中有这样一段：

> “泰西社会本属平民，而其文明亦为平民所需用并来自平民，此本无需吾人再为解释者。但当此种文明一旦输入我邦，即不幸为贵族所专有，故而无端带上贵族之臭味。泰西文明之恩泽仅及于一种阶级，而对其他大多数人则毫无痛痒、毫无关系，实可谓形同无有者也。……使吾人最为惊骇者乃知识分配之不平等是也。彼波克尔评北美之平民社会日无大智者然亦无大愚者，而我国知识世界之形势则适与其反。戴眼镜而面色苍白之学者先生中，讲康德、斯宾塞之精微博大之哲学者有之，或讲达尔文、赫胥黎奇迹般的进化博物学之学者有之，或玩味弥尔顿、麦考莱典雅瑰丽之文学者亦有之。然仅止于国民中之极少数而已。彼质朴健全之人民中则梦中现实中皆不能享此快乐也。”

苏峰的这种看法，是极其中肯地击中了当时被揶揄为“日本桥的文明开化”的当代日本的外来西欧文化的要害的。然而问题在于，这种看法不仅针对必须迅速导入近代西欧文化的“启蒙期”的日本是妥当的，而且总起来说针对近代日本的外来西欧文化的实际情况也是妥当的。我想这样说是不为过的。

现在以上述评价为前提，我想可以对近代日本思想史得出这样一个大体上的看法。那就是，可以叫做外来的近代西欧思想移植史的近代日本思想史的完成者是那些直接与绝对主义天皇制政权有关系的、或想要与它勾结的，再加上虽曾一度反对过天皇制但一旦“转向”过来又同它勾结的少数知识份子，因此，外来的西欧思想并未真正为国民所有，并且也没能与民族传统思想和民族的人民感情真正融合一起，所以就缺乏风土化的国民基础，从而未能摆脱它那种移植观念性。

换言之，一方面，外来的西欧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从外部加强了传统的儒佛思想，使之成为绝对主义天皇制加强政权统治的思想工具；另一方面，这种在阶级性上与绝对主义天皇制思想体系相对立的进步的西欧思想并没有获得国民基础，因此也就未能发

挥出应有的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而终于败退下来。

可以说这就是外来的西欧思想在近代日本的必然遭遇，而决定这一命运的主要原因当然在于绝对主义天皇制国家政权严厉的思想控制政策，但还应当看到其另一半的主要原因是，首当外来西欧思想导入之要冲的近代日本知识阶层的基本方向的问题。

关于他们的方向，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下述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直接与绝对主义天皇制政权有联系或愿意与之联系的知识阶层所采取的方向，其目的在于沿着绝对主义天皇制自上而下的近代化路线，把外来的西欧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直接地无媒介地嫁接在天皇制思想体系的支柱神、儒、佛思想体系之上，从而增强后者。它是从幕末封建统治者那里把所谓"早期国家主义"的思想体系丝毫不加改变地继承下来，直接连接在后来形成为帝国主义思想体系的旧日本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之上，同时也只是从概念上理解和运用的。如果我们把这一方向叫做"传统主义"方向，那么，它就是同从幕末的"早期国家主义"倾向——用思想体系的术语来说，就是佐久间象山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技）术"或桥本左内的"器械艺术取于彼、仁义忠孝存于我"的思想——开始，一直到昭和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危机时期开展的"日本精神主义运动"为止的一系列思想家所提出的"超越近代"这一口号有密切关联的方向。而把这一方向用哲学概念表达出来的集大成者就是西田哲学。我们在最前面的历史叙述（第一卷第四章《明治绝对主义思想》）中已经指出，明治绝对主义政权为了对付汹涌澎湃的"自由民权"运动，于明治十年代以后在思想上公然复活儒佛思想以对抗之，然而，在这一潮流当中，不少官学思想家却用外来西欧思想为媒介使儒佛思想开明化，以求从思想体系上对抗"自由民权"思想。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有，将孔德的实证哲学嫁接于儒教思想的西村茂树，将物活论嫁接于佛教的井上圆了，还有企图以

"现象即实在论"把东西洋哲学综合起来的井上哲次郎。在这个复活传统思想的潮流中随波逐流，到了明治三十年代，在"禅"的体验的基础上创立了"纯粹经验"概念，又从这里针对建立在希腊思想和基督教传统的基础之上的西方的"有的逻辑"，发展出以佛教思想为背景的东洋的"无的逻辑"与之对立的就是西田几多郎其人。在这里，西田的意图在于通过把西方哲学作为自己的哲学的抽象对立面的办法，用西方哲学的逻辑性装扮起来，从而形成东洋的形而上学的逻辑思想。如果同明治初年的"启蒙"阶段相比，由于明治三十年代以后西田几多郎所进行的哲学活动，外来西洋思想更深刻地受到传统的东洋思想的渗透，从而使两者的结合更加深化到内部，但是，由于西田几多郎哲学活动所固有的那种对传统进行自我否定的因素很淡薄，所以，这也就说明西田哲学基本上没有超出"和魂洋才采长补短主义"的思维方式。以西田哲学为代表的近代日本知识阶层的这一方向，可以说是传统思想的直接自我肯定的方向，因此，在这样一种方向之下，是不能够对外来西欧思想本身以及由此形成的精神史传统进行真正的批判和扬弃，所以也就没有实现通过东洋精神史传统的自我否定来完成它本身的再生的自我。因此可以说，这种方向是为后进的日本资本主义的自我主张作辩护的，这也正是它成为从幕末的"尊王攘夷"思想一直到日本帝国主义思想体系的旧日本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的原因。

下面谈第二种类型。概括地说，这是一种背向传统，把自己的思维原则甚至生活原则求诸于外来西欧思想的方向。这一方向还可以再分为两种倾向。其中的第一种倾向是，要从绝对主义天皇制政权的阶级对立物的地位中寻找或站稳自己的立场，并且站在这个立场上以外来西欧的革命思想同天皇制思想体系的思想支柱——神、儒、佛教思想体系相对抗，企图以前者否定和战胜后者这

样一种倾向。代表这种倾向的是，以明治三十年以后输入进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理论武器，一直对天皇制进行决战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和他们的同路人、一部分进步的知识阶层。属于这一倾向的，从传承关系说，其先驱是明治一十年代"自由民权"运动的左翼思想家们。这种马克思主义思想，按其本来的阶级属性，本应通过掌握以工人、农民为首的人民大众阶层自然地形成为国民哲学，但是在近代日本，大体上说它只不过是一部分进步知识份子阶层的精神所有物，因此在绝对主义天皇制思想体系面前，最后不得不败退下来。日本马克思主义不得不承受的这种命运，主要原因可以从绝对天皇制政权的非同一般的残酷镇压中去寻找。例如，自从明治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开始输入我国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为止这一期间，如大家所熟知，由于残酷的镇压和取缔，使马克思主义思想通过日常政治斗争渐渐渗透到国民大众中去的道路被封死了，因而往往不得不由少数精锐份子采取"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形式。而且这种倾向即使在经过那次"无政府主义对布尔什维主义论争"中"无政府工团主义"被"布尔什维主义"从理论上击败之后，"无政府主义"在实践上仍然是支配多数的一种倾向。日本马克思主义在近代日本就是处在上述这样不利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但在另一方面，导致日本马克思主义受挫折的另一半理由，我们认为则是它的体现者进步的知识阶层的责任，所以应从他们的错误和谬误中去找。比如，在战前以及战后的知识阶层的动向中可以看到的那些对先进思想的教条主义、权势主义，逻辑上的公式主义、客观主义，行动上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等等，大概都曾严重地妨碍了马克思主义在国民大众中的传播。支配着近代日本进步知识阶层的这样一些倾向，使他们回避了从国民大众生活中吸取本来就有的革命的民族的庶民感情、再吸收外来西欧革命思想以在民族基础上建立自己体系的道路，一般说来，他们走的却是

把传统的东西一概同前近代的＝封建的东西等同起来，用直接输入的现成的外来西欧进步思想来否定、战胜它这种简单化的道路。而这种简单易行的办法最终是不能把外来西欧思想化为自己的东西的。何况在近代日本那样极其不利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外来的西欧进步思想，更不可能化为真正的有血有肉的国民思想。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未能完全去掉其移植观念性，从而未能扎根于国民大众的传统的庶民感情之中使自己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其另一半原因也就在这里。

下面谈谈第二类型中的第二种倾向。情况如下。

代表这一种倾向的是"讲坛"哲学倾向。它的先驱者是明治初年"明六社"的启蒙思想,"明六社"＝"明六会"解散以后不久,到明治一十年代又以"东京学士会院"的形式恢复起来,后来又建立"帝国学士院",从此建立了官方的科学院体制。尤其是沿此路线形成起来的以东京帝国大学为中心的"讲坛"哲学则成为这一倾向的代表。从阶级上说,它大体上属于沿同一阶级轨道形成、开花结果的"教养主义"、"文化主义"之类的大正时期各种"近代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属于这种倾向的、尤其是其中的"讲坛哲学",应当指出的是，其人物都是在生活感情与思维逻辑之间存在着乖离和矛盾，而且两者间的乖离和矛盾又同时统一于一个人的身上这种现象。一位外国教师的评语用于这种现象是最恰当不过的。他说的是，"好像是住在二层楼房，楼下是按日本方式考虑问题和感受事物,而楼上则陈列着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全部欧洲学术著述"(K.列维特：《欧洲的虚无主义》)。这种畸形现象是在下述过程中产生的，即明治三十年代以后由于有了学者这一专门职业和学科专门化,思想家即形成一个在大学"讲坛"上专讲"哲学"科学的绝对主义天皇制政权的智能技术官僚阶层。本来是要求说明世界观或人生观这种根本性问题的"哲学"，现在也变成了单纯的一门知

识。因此，一个在大学“讲坛”上贩卖单纯的一门“哲学”知识的“讲坛”哲学家，就已经不必要是一个某种一定的生活实践者了。在他这样一个人格之中，决定着他日常饮食举止坐卧的传统生活感情与他头脑中的壮丽的西欧哲学体系两者是乖离而又同时并存的，而且也从不想把两者在内心里结合起来，这也是不足为怪的。大体上这就是明治三十年代以后形成、扩大起来的我国“讲坛”哲学和“讲坛”哲学家的实质。这里我们应当想起的是，第一个把“西欧哲学”移植到我国来的西周所强调的要求世界观性质应优先于“哲学”的“启蒙时期”。他写道：“大凡百科学术，最要紧的是要有一个统一观。在学术上如能建立一个统一观，则人间之事业即能就绪，社会之秩序亦必能安定。……建立统一观乃哲学家所应论究者也。”（《尚白札记》1872年〔明治5年〕）。我们还应当记住，是西周把东洋的儒佛思想同西洋的“philosophy”调和于同一类项的。按渊源说，我国的“讲坛”哲学是在西周开创和准备的方向上形成的，“哲学”发达到按西欧哲学界水平进行专门性研究的阶段，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这种进步是通过决定着日常生活的伦理行为体系同生活感情与思维逻辑之间的乖离，通过思维逻辑丧失世界观人生观性质才取得的。而且“讲坛”哲学的这种形成过程，恰恰是通过近代日本知识阶层脱离了群众，把自己编入绝对主义国家权力机构的一部分的过程。所以，因其从“哲学”中抛弃世界观人生观问题而获得的那种“思想稳健”的定评，则正是他们使自己形成为绝对主义国家政权的有用的智能技术官僚的必要条件，也是他们在其中通行无阻的通行证。

其次是和“讲坛”哲学大体同时形成的“近代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我们可以把“大正文化”的旗手“白桦派”看做它的典型。从这一派，我们看不到“讲坛”哲学家们那种传统的生活感情与外来的西欧思想体系之间的乖离和矛盾。从出身和素质看，

他们是一小部分毫不感到有任何抵制情绪的、径直接受近代西欧资产阶级文化遗产的人。这些人都是在公卿贵族、大名华族或者虽非华族而是经济上比华族更富裕的家庭中长大的，都是“只拿银碗吃饭”的公子哥儿们。这就是说，他们是经过幕末到维新时期的艰难岁月而保持住原来地位的，或者是在前辈的艰辛成果上坐享其成的“第二代”或“第三代”。由于有这样的物质基础，他们才能完全习惯于资产阶级化的生活方式、生活感情。正因如此，他们也就能够在醉心于西欧艺术文化时，丝毫也感不到同自己的生活感情有任何矛盾和摩擦。日本资本主义似乎是因为有了他们才达到顶点。后来，日本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以总危机的形式开始爆发，也不是偶然的。

3

上面是我们从传统思想与外来思想交织渗透的角度对近代日本思想的两个基本类型所进行的粗略而又具体的考察。通过这一考察，我们一方面明确了企图积极肯定传统思想的第一种方向不经过对民族传统的自我否定而简单地只停留在对传统思想进行直接的自我肯定，因而最后陷入自在（an sich）地建立在我国精神风土中的超国家主义之中的原因；另一方面又明确了将自己的生活原理和思维原理求诸于外来西欧思想的另一个方向，由于轻视民族传统的庶民感情，因而缺乏把外来思想本国化的过程，所以未能完全排除其移植观念性的原因。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使我们的思想民族化，同时使之成为人类的普遍性思想，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启示。那就是，我们应当走的道路是既要重视传统，又不要使它把我们带到怀古幽情中去，同时也不要囫囵吞枣地躲存外来文化。我们应注意到从根本上约束着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庶民日常伦理行为方式

的民族传统的庶民感情，通过根本性的再认识再分析，抛掉其应抛弃的部分，继承其应继承的部分，在此基础上把近代西欧文化遗产改造成我国的东西。如果我们定下这样的方向，那么就应该说，中国、印度等亚洲各国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的前途正在给我们以很重要的教训。

二　近代日本思想史中的思想和文学
——主要谈思维方式问题

1

在目前的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并不是掌握和批判已形成为思想的既成成果，而是把握形成过程中的活的姿态。这就是说，不应急于得出社会历史基础决定论的某一结论，也不在于按西欧近代思想的各种类型分类法或抽象范畴公式对各种多样现象加以整理、排队和指出其缺陷，而在于根据从近代日本的民众生活现实当中或传统的理性的民族精神当中形成、产生的思想实际内容，找出它的创造过程的内在冲突和现实基础二者的关系。这个任务，尤其考虑到在资本主义急剧而片面的发展中实行称之为“自上而下的”近代化的近代日本，再加上它是曾受到属于和自己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的西欧思想激烈洗礼的近代日本意识这双重性时，就显得更为迫切了。

“当我开始接触新文学的时候，明治文化还完全处于混沌状态。我们也曾学过作汉文和汉诗。也学写过和歌。也学写过所谓的短歌首句。一方面对新式跳舞议论纷纷，一方面却有身穿短褂裤的忧国志士手持打狗棒那样粗大的文明杖往来于街头。维新的破坏性悲剧的残迹还到处可见，还有不少大邸宅已经凋零。在我们眼里分不清都是些什么。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简直弄不明白。”(近代的小说)

这是田山花袋的话。如果再把岛崎藤村的这样一段话：

“我们这些人是生在一个何等焦躁的时代呀！……我们一生要发挥各自的天性是无论如何得不到允许的！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们那些欧洲人是经历了长久岁月才达到今天的社会生活的。而我们则必须在短期内赶上他们。”（“寄自饭仓”）

同田山的话联系在一起，那就更充分地说明了上述问题的迫切性。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具备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呢？

我们的出发点首先必须是，对于思想要在它同还处于“直接包含在现实生活的语言中”（马克思）的那种状态的关系上去加以把握。当然，思想的根源总存在于尚未客观化、逻辑化的现实生活的直接、感性意识之中。而不扎根于这种感情要素的思想，将是尚未获得真正活的生命，而且也不能叫作真正意义上的思想。一种思想如果是真正的思想，它就必须是对这种感情要素给以表现并通过逻辑自觉化、对象化形成的一种完整的意识。而且，思想的创造性，它的活生生的作用必须是这种自觉化、对象化的现实作用。

然而，这种直接的、感性的意识当然被社会历史的、也就是为阶级的和民族的条件所决定。它具有新旧混合的复杂内容，它产生现实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实践生活的表现，是直接意识。我们称之为生活意识。而这种生活意识，细分起来，可以有农民意识、商人意识、官僚意识、政党人意识、经理人意识、工人意识、职员意识等等，他们都各有其特色。关于这些，比如说“家庭”问题，“共同体”问题，“天皇制”问题或“所有制”观念等个别题目都必须予以系统的证实。但这些工作不能不另找机会进行。在这里只能通过上述问题大致弄清社会体制所要求的那些可称之为意识形态的原初形态的一般生活意识。

思想必须是通过生活意识的对象化的完整意识。但应当注意的是，思想的这种作用总是或多或少以特定个人的生活意识为基础，或者说通过实感而发生作用。即使它形成为规律或原理而被肯定下来，或者已形成为一种前提，也仍无例外地要通过这个过程。当然无需再加说明，这里所说的特定这个限定词决不意味着特定个人的完全独创。一切思想的形成，必然都要经过这种过滤作用。我们就是从这种过滤方式去理解思想的本质的。

这种过滤作用，我们可以称作思维方式。思维方式一词是一个稍嫌暧昧的概念，它含有种种意义上的微小差别，比如说，"诗词式思维方式"或者"小说式思维方式"，都可以理解为有关生活意识的表现方式的词。因此，我们把通过实感将生活意识对象化的这种活动，用思维方式这个词来表示，是不会错的。

当然，思维方式不会是无前提的。过去的现实生活深深地为早已产生的传统思维方式所浸透，另外，外来的各种思想也发生显著影响，社会历史条件和民族条件对它也起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在近代日本，它的社会结构呈现着极其复杂的现象，所以，可以说我们的困难也就在于对它的思维方式的历史展开过程，难以作为一个层次分明的过程加以把握。急剧的社会发展和自上而下的"文明开化"使原有的思维方式发生混乱，生活意识和思维方式之间的失调是极其严重的。前面引用过的田山花袋的一段话"在我们眼里分不清都是些什么。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简直弄不明白。"深刻地表明了明治二十年前后的失调感。一方面，外来思想有如洪水般的输入，在人们"总是陷在汉文学或日本文学的故纸堆中被压得站不起来"这样一种形式的焦燥感中，由于摆脱不开同生活意识的失调因而带来乖离的思维方式。失调感无论怎样，总还能给思维方式带来跳动，也是把思想引入新境界的发条，但是，近代日本的这种失调感却成了无止境的失调，而形成为贯穿全部近代日本

思想史的思想上的传统精神状态。近代日本的思想家所进行的"艰苦斗争"就是从这种失调中恢复起来以建立自己的思维方式的斗争。尽管那些斗争"应当全力以赴的却没有全力以赴，不必全力以赴的反而白白地花费了全副力气"，即便是"错误"或是"自以为是"，但毕竟还是认识到与生活意识失调，探求了从失调中恢复过来的道路，在这一点上，应该说开辟了一个生动的思想运动。尽管其结果是"绝望观"、"自我放弃"、"孤立"或是"自我同一"，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加以指责。再说，这种失调——思想与现实的矛盾和观念与感觉的矛盾，今天在我们自身中也是存在的，而且也是我们早已经历了的近代崩溃体现在我们身上的双重矛盾。想到这一点就会了解，探索近代日本思想史中的思维方式的实质也与我们所面临的课题有直接的关系。

2

关于思维方式的实质问题，在文学领域里主要是在"自我"小说的思维方式问题上，使不少文艺批评家拿起了他们的考察之笔。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文学，尤其是小说，是通过作者的眼睛捕捉现实的人类生活实际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所以它对思维方式的失调不能漠不关心。

然而，这种"自我"小说的思维方式不仅仅在小说艺术中可以看到，而且在哲学思索中也可以看到一种所谓"自我"哲学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在西田哲学——田边哲学——三木哲学这个发展线上明显地看出来。一言以蔽之，它是近代日本的思维方式的自觉化，或者说它是近代日本的自我之逻辑的形成活动；在急剧"开化"的混乱和焦躁中，采取了提出"人生问题"以追求"深刻的生命剖析"（西田几多郎的话）的近代日本式的"生之哲学"的形式。

应当这样看，近代日本思想史包含各种互相乖离的思维方式，

但总的说来，它的主轴还是由上述各种思维方式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思想系列支撑着的。

正如上面谈到的，“自我”小说的思维方式的开端，应该说始自明治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在自然主义文学的消长中缩小了描写范围而在明治39年到40年出现的从岛崎藤村的《破戒》向田山花袋的《棉被》的“屈折”发展时期。大约与此同时，由西田几多郎开始提出了近代日本的代表性哲学“自我”哲学的设想。两者的同时出现决不能说是偶然的。1910年(明治43年)前后这个时期对近代日本的形成是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时期，用我们的观点扼要地说，这个时期正相当于面对激荡的思维方式失调的当代日本人的混乱和焦躁一方面使人们以“自我”小说的形式，另一方面以“自我”哲学的形式确定了自己的轨道，建立起自己的思维方式，以便找出一条使它能以曲线形式稳定在自己的风土环境中的道路的时期。“自我”小说所采取的态度是用证明存在于自我中的“自然性”去牺牲近代现实主义，从而潜入到近代日本的自我中去；“自我”哲学则用坚持“纯粹经验”的直接性去排除主观——客观的公式，从而走向近代日本的自我逻辑形成的道路。这一过程也就是在帝国主义初期的日本绝对主义国家政权的高压下外向发展道路被封死因而只能折往内向的意识所进行的一场自虐性的“艰苦斗争”，同时，也是为寻求一条稳定在自己的风土环境中的道路，建立自己的思维方式而进行的斗争。

长谷川天溪的下面一段话，很能说明这个时期意识所关心的基本问题。

“如今一切幻想已经破灭。……不论有形无形，不论善恶，亦不问美丑，总之，在一切事物的周围看到幻影，并认为这是有意义的从而无限追慕的那个时代已属过去。而今天，纵令仍承认此种幻影，但已斥之为毫

去意义的幻影，而径直眼望真实，或想面对真实。”（幻灭时代之艺术）

用过去的旧观念已不可能把握现实，如不破坏旧有的道德和思考程序就不可能从上述稍带武断性的浪漫主义立论中充分理解能够表现自己、强调自己的这种失调感。田山花袋认为缺乏“露骨的描写”，“虽然有新的思想，然终不能将其一端跃然纸上，徒自成为文章之奴隶者，亦屡见不鲜，实验之甚以为憾”，因之他认为必须是“想愈露骨，文愈露骨”；西田几多郎在日记中写的“统一自己的思想，务使与自家之安心相一致”，以及写给友人的“如余为文学，则不作文学史家或研究家，将作创作家”这些话都可以说是出自同一种意识的关注。

闲言少叙，追求“必须立足于不加任何虚构的现实去思索”（天溪：《斥逻辑游戏》）的自然主义文学的“破理显实”的真实，和西田哲学的逻辑探索“从《善的研究》开始，我的目的始终是想要从直接的、最根本的立场观察事物、思索事物。对一切都从这里出发再归结到这里，这就是我所坚持的立场”（《哲学论文集第三》序），实际上是出自同一根源的思想，从这里可以看到类似的思维方式。

大家都知道，在西田哲学里，他那个“始终是直接的、最根本的”东西首先表现为“纯粹经验”。而在自然主义文学中与此“纯粹经验”可相比拟的概念则是“自然”这个概念。自然主义文学中的这种“自然”，在作家的思维方式机制中是如何活动的，进而言之，在自然主义作家当中，“自然”概念含有什么样的内涵，这都是很难简单概括的问题。现在我们可以根据唐木顺三氏的理论，举出下述三种自然概念来谈一下。

第一，自然首先意味着自然而然。在这个意义上，与自然相对立的是人为。把道德、理想以及其他观念的产物理解为人为时，本能、性欲等普通认为是野性的东西则名之曰自然。从这里可以引伸出与悟性的或知性的人相对立的自然的人来。在这里，

人是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来理解的。

第二，如果把观察、观想或知晓、更能知晓看作是人优越于其他的一种特长时，那么，自然和自然人就因此而成为对象。这时，自然和自然人，同其他一切一起包括在观想的人之下。

第三，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时，则他的存在有如蝼蚁般渺小。而且人类集团的社会、它所创造的历史也完全可谓贫乏到无意义的程度。人类的智慧太微薄了，不足以了解自然的奥秘和生命。但另一方面，人类是会了解这些的。了解其自然者要比自然本身伟大。因此，人在自然面前虽然是极其贫弱的，但同时比自然是更为丰富的。(引自《关于近代日本文学中的自然和道德问题的历史考察》)。

唐木氏经过仔细考虑，把樗牛、初期自然主义和泡鸣列入第一种，把观想的自然主义(花袋、抱月和天溪的一个侧面)列为第二种，把国木田独步列为第三种。

小杉天外在其作品《流行歌》的序里写道："自然就是自然。既不是善，也不是恶，既不是美，也不是丑，那不过是某个时代的某地方的某个人，抓到自然的一个角落随意加上的善恶美丑之名而已"，他还说："当诗人将去描写他的空想时，一点也不能把自己加进去"。还有，永井荷风在《地狱之花》的跋中声称，"人类的一个侧面确实难免是属于动物性的……如此则余专欲毫无忌惮地如实描写伴随与祖先之遗传及环境而出现的各种情欲、手腕、暴行等阴暗的事实"。在小杉和永井这样写时，他们所理解的自然当然是属于第一种自然而然的自然，与人为相对立的处于外部的东西。所以，这种自然在这里是与旧有习俗相对抗的，它起着批判旧习俗的武器的作用。然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第二种自然概念的实质和它的形成过程。因为"自我"小说的思维方式只是在这种自然概念里表现出来的。

《棉被》作者田山花袋在其明治34年发表的《作家的主观》中，把主观区别为两种，一种是作家的主观，另一种是大自然的主观。而所谓大自然的主观总是具体的、瞑想的，能够包容各种各样的倾向、思想和主张，并且能把它们具体化起来。易卜生、左拉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们是在十九世纪思潮中发展起来的大自然的主观，而作家必须接触社会潮流，并用大自然的主观加以对照，逐一地对社会文明进行批判。这里所说的大自然的主观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从花袋的论点那里是难以明确理解的，在回答正宗白鸟提出过的这类问题时，花袋曾经在《太平洋》杂志上发表文章，他这样说过：

"我所说的大自然的主观，指的是nature发展为自然、天地的那种形态，从此推论下去，可以说作家、即一个个人的主观之中也就包含着大自然的面貌，所以，作家所使用的主观当然是能够同大自然的主观一致起来的。……如果作家的主观还不能上升到同大自然的主观相一致的境界，那怎能写出杰作来呢。……如果说优秀作家的主观就是自然的主观，那么，便不能说没有主观的自然，就是所谓模仿、照相之类的东西吗？

这种没有主观的自然，即实物模仿乃是现今文坛的通病。因此，现今文坛的写实已经成了只写外表的了。即使偶尔也有试图进行心理描写的，但因其没有明确的主观，换句话说，因其主观还没有上升到同自然相一致的高度，所以总是停留在外部到处打圈子，终未能达到自然面貌的境地。……从根本上说，自然主义完全具有主观的性质。"

这一段话的论点，仍然不能说是明确的。然而，花袋想要说的却是这个意思，抹杀主观作用只写如此这般的自然，那就和照相一样，这样的客观描写是抓不到自然真相的。另一方面，单凭主观并不是正确把握客观的办法。正确办法恐怕是这样的，使小主观与大自然的主观相一致才能抓住真相。再进一步说，应该是对于对象，要带着共感入于其中，在完成这样一次感情移入之后，

再使该对象任其自然地发展为自然，这样一来，小主观就将不受狭隘的个人的东西的局限而通向更广阔的普遍性存在了。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这里所说的大自然的主观，就可以理解为为达到所谓主客合一境界所作的努力。这也就是抛弃小的主观走向大的自然的主观立场、即最根本的立场上去的意思。

按这个观点来看，当他说"自然之物、接近于法则之物、接近于规律之物，就是自身，同时又是他物。因此，自然之物先同他物发生共鸣"时，他的真实想法应当是指，如果自己真根据自然而生存，亦即自己与大自然的主观是合一的，那么自他的差别即将消失。所以，"自己内心也是一个自然。正如外部宇宙是自然一样，自己也是一个自然"，基于这种同大自然一致的可能性的信念，就产生出以"自然"为媒介使自己普遍化，即在努力使自己与大自然的主观相一致的过程中，能够如实地描写外部自然和别人的这样一种信心。用另一种说法来说，就是这样一种确信，即使不通过自他的区别或对立的媒介关系去寻求普遍性，自己的直接体验（只要经过与大自然的主观相合一的修养磨炼）就能立即指明普遍性的东西，如能把自己的体验描写得真正"像自然一样"，那就是把人的普遍性的本质描写出来了。

然而，根据这种确信，舍小主观而求与大自然的主观相合一的道路，决不是一条轻而易举的道路。因为"吾人之此种意识所能知觉之界限，无论如何不能抹杀或消灭之现实客观世界，归根结底乃一多归于一之矛盾斗争世界。不知何日其所谓一即成我，我即成为一切。不知何时，现实之我与他对立而存在之意识逐渐融化而显现为某种浑然一如之姿态。在尚难根除小我意识之现今境界下，纵令于理、于智加以何等深刻之区别，或有何种程度之斟酌考虑之余裕，亦终不能忘却心头之苦味"（片上天弦：《人生观上之自然主义》）。因此，沿此道路前进者，是难以消除其苦涩表

情的。而需在常住不变、自我的体验中认证普遍性，将自己委诸此道，这样才能使这条道路升华为一个伦理观念，成为作家内心的“修炼”对象。

所谓“自我”小说的思维方式的基本内容，就是上面说的这样。这里，当然是“自然和自然人变成了对象，自然和自然人，同其他一切一起，包括在观想的人之下”，然而，这种对象化的进行方法并不是通过同自然以及自然的人的对立，而是超越这种对立，对“自然”进行直观、体验而实现的。应当说这正像是直接认证“绝对者”那样的过程。

说到这里，使我们想起西田哲学中的“纯粹经验”来。三十多年间，“纯粹经验”是从根本上制约着西田哲学发展的最基本的概念。它可以比作是“后来‘纯化’的西田哲学的‘精髓’的前身，化蝶前的幼虫”（竹内良知：《西田哲学的根本性格》）。

“纯粹经验”这个概念，尽管来自W·詹姆士和E·马赫的西欧哲学，但它是青年时期的西田几多郎在通过不断“打坐”而获得的“禅”的基础体验上建立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概念是“禅”体验的逻辑表现。而且这种“打坐”乃是朴素的民权运动的自由主义者、启蒙派的合理主义者的一名青年，几经挫折后寻求恢复个人之安心和思想统一之原理的一条苦恼道路。再进一步说，那是一条希求跨过“幻灭时代”，克服自己思想失调的艰苦斗争之路。他在“叙述我的哲学思想”的著作《善的研究》的第二编论实在中，开头所写的下面一段话，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他说：

> “人是不能满足于两者互不相容的知识性认识和实践性要求的。……本来，真理只是一个。知识上的真理必须直接就是实践上的真理，实践上的真理必须直接就是知识上的真理。深入考虑问题的人，诚挚的人，将必求知识与情意之一致。”

由此观之，所谓从体验所掌握的“纯粹经验”，可以说就是“丝

毫不加思考、辨别的真正经验的原始状态"，"既没有观者的主观亦没有被观者的客观"，也就是无主无客的"知晓与其对象的完全合一"的"心识排除，物我相忘"的状态。那么，现在"如果想要理解真正的实在，知道天地人生的真谛，就必须尽量疑其可疑，去掉全部人为的假设，以欲疑而无可疑的直接知识为出发点"才行，而这里所说的"欲疑而无可疑的直接知识"，也就是"我们直觉经验的事实对意识现象的知识"的那个"纯粹经验"。"纯粹经验"就是把握实在真相的根本性的经验。

但是，"所谓实在只能是我们的意识现象即直接经验的事实"。因此，并非在"纯粹经验"的事实以外还有"实在"。然而如果认为"纯粹经验"是意识的直接经验，意识是某一个人的意识，那么，把实在理解为"纯粹经验"，那就必定要陷入贝克莱的唯我论中。因此，西田哲学认为，把作为纯粹经验的这种直觉意识规定为主观，并把它归诸于个人，那将是抽象思维的武断，将丧失"经验的真正原始形态"的直接性。"并非有个人才有经验，而是有经验才有个人"。"纯粹经验"是超乎个人，超乎主客对立的。而且，"所谓意识必定是某个个人的意识，那不过是说意识活动必需统一而已。"因此，把"实在"作为"纯粹经验"来理解，就是排除特定的所有者，把实在作为意识的统一作用来把握，这决不是什么唯我论。

现在，对我们来说，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这样一来西田哲学是否能够算是脱离唯我论了，而在于西田哲学的出发点"纯粹经验"却是在坚持其直接性并把主客对立斥之为抽象思维的武断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了。西田哲学是要从"何时何地都是直接的"、"最根本的"东西那里寻求那种无主客对立、超乎主客对立之上，并使此种对立在无对立和超越对立之中成立的东西，并且要求从这个观点"看事物、想事物"。同时，也可以说它也就是那个想要直

接认证"绝对者"的东西。

当这样看问题时，我们就可以看到，自然主义文学和西田哲学两者，有着同样的思维方式。

"纯粹经验"也罢，"自然"也罢，其概念都来自西欧思想，但其内涵都发生了同样的变异。这一点不能归之于对西欧思想的"肤浅的误解"，而应当归之于它想摆脱现实生活意识与思维方式两者的失调而寄托于自己的体验，以建立自己的思想路线这一意图。后来，站在上述思维方式之上，一面开始走上确定其特有设计的途径，一面又开始走上"从逻辑上完成"它的途径。但这种现象决不是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进行一场"东洋思想"对"西欧思想"的决战，也不是想要固守传统的思维方式。它是从对现实不满这一点出发的。尽管如此，在它身上还是打上了社会历史局限性的烙印。

3

上面我们对明治三十——四十年代的思维方式的实质，从其一个侧面作了简略的叙述。我们必须对各种思维方式的结构及作用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以探索近代日本思想的实质。这就直接涉及"传统思想"和"外来思想"的互相关系问题，或者说"东洋思想"和"西欧思想"交往的实质性问题。进而言之，也关系到业已乖离的思维方式的实质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思想体现者的问题。而比一切都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方面的研究，弄清楚近代日本思想的伟大和悲惨，从而探索、解决今日存在于我们中间的同类问题。

三 近代日本思想史中的知识分子和群众

在人类历史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还没有废除。个

人还不能兼作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因此，在近代日本思想史上，知识份子和民众即工人农民也必然处于游离状态。尽管说是游离，但在游离中还是结成某种关系，不管知识份子是否意识到民众，也不管知识份子的思想内容如何，总是要对民众发生某种影响的。知识份子在国家和社会之中起着作用。事实上这就是知识份子同民众的结合，但是当这种结合的手段既不在知识份子手中也不在民众手中时，当然他们不能不感到互相间是游离的。而这里所说的结合手段就是各类学校、报刊、杂志等大众宣传机构。这样看来，知识份子和民众的实际上的结合同民众和知识份子互相间的感情，不一定是一致的。所以说，当说知识份子和民众时，这种结合手段才是“和”的现实内容。

下面想对：一、日本的近代知识分子的性质；二、他们的思想特征；三、知识分子和民众结合的手段；四、知识分子对民众的感情等四个方面进行概述。

1

在日本思想史中，作为近代知识分子把自己的思想开始推到主流地位的，当然是明治初年的启蒙思想家们。

这一批启蒙思想家们按其出身来说都是下级士族。其中有一些人本来就出生于洋学家世家，而总的说来，这批人本身都掌握了洋学（参照第二章 4）。继这批启蒙思想家之后的下一代自由民权思想家们，也都是下级士族出身并学过洋学。这一点同前者没有不同（参看第三章 5）。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士族）具有享受文化、占有文化的条件，尤其是下级士族，处在能够锐敏反映封建社会矛盾的地位，并且也具备这种能力。“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

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马克思)①。这种情况在日本此时也出现过。而这种照耀未来的光芒之中，先进的洋学家发出的光度是极高的。

在到明治十年代为止的近代时期的进步思想家身上，可以看到上述那种显著的特点，而在整个明治时期，知识分子中士族出身的也为数极多。即使非士族出身，他们也都是地方上的乡士、儒者、医生、僧侣、神社主持等等，在旧社会，其出身与士族具有同等身分。基督教思想家、社会主义思想家也不例外。新岛襄是上州安中的藩士，内村鉴三则生于上州高崎的士族之家。还有，幸德秋水生于土佐中村的乡士家庭，片山潜则是冈山县津山附近的村长之子，堺利彦出自丰前小笠原藩之下级士族。这个结构多少有些衰落，是进入大正年代才开始的，这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进步主义者吉野作造，是经营绵业和贩卖书籍报刊的宫城县古川町"吉野商店"店主的儿子。然而，同时代人中，河上肇也是出身士族，西田几多郎则是地主的儿子。

但是，自从明治末期起，日本的资本主义突飞猛进，国家机构扩大起来，这就造就出大量知识分子。1910 年（明治43年）设立了九州、东北两所大学，1918年（大正 7 年）设立了北海道大学，同时公布了大学令和高等学校令，开始规划高等学校和专门学校的增设，同时也规定了官立、公立、私立大学及高专学校在法令上的平等地位。1920年（大正 9 年）设立了东京商大。这样一来，在知识份子数量增多的同时，他们的出身阶级差别也开始消失了，活跃在昭和年代的思想家中，有不少出身于地方上的地主、资产阶级、官吏、军人等各类市民阶层，这也是昭和初期出现大量失业者的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恩选集》第一卷261页。——译者

因。此外，在地方村镇起着核心作用的知识份子小学教师（师范学校的设立是在明治5年）的情况，看来也有所变化。"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明治三十年代教员的重要变化之一，是教员的出身阶层逐渐由士族阶级变为农村阶层出身"（唐泽富太郎：《教师的历史》）。

如上所述，明治时代有名的思想家几乎都是旧统治阶级出身。正因如此，他们这些人即使是进步的思想家，也必然是在新的时代仍旧原封不动地保持着那种环境中形成的气质和性格而活动。然而，特别是在明治前期的过渡期，比如那些自由民权思想家们就是以其"士大夫气概"充当运动的先驱的，同时也正因为他们的"士大夫气概"而没有能够深入到群众中去（参照第三章4、5），被称为崇洋主义化身的福泽谕吉也只能留下一本"维持士气"（德富苏峰语）的书《硬充好汉说》，而内村鉴三则以"我家本属武士阶级，是故自襁褓之中起，我之出生乃为战——生者战也"（《我为何成为基督信徒》）这种明确的觉悟趋向于基督教。这些都是迅速展开的近代化过程中特有的艰苦，但只有在克服这种艰苦的过程中，近代知识分子的人性才得以形成。可是，我们却看到日本的近代知识分子的人性，在明治前期本应保留更浓厚的武士气质和士族意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反倒带有更多的"近代时期"的那种明朗性，而到明治中期和后期，却又出现带有显著的"封建"对"近代"搏斗的苦涩和"近代特微"的优雅文弱的知识分子。这说明，我们必须从本质上解决日本近代化的问题才能说明这些问题。

谈到这个问题，必然使我们想到日本资本主义的军国主义化。和其他各国一样，日本资本主义也利用了封建时代的军事组织，而且远比其他国家明显。这种军事组织的精神核心"军人精神"，就是武士道的继承和发展。而把这种军人精神归纳为五条提纲而制定"军人勅谕"（明治15年）的是日本近代思想史上的先觉者西周。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的近代思想从一开始就似乎被迫与封建的

武士道结合一起，而这种结合又是具备条件的。又因为军国主义本身就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近代化）的一个重要形式，所以，军事化也就渗透到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在国民教育方面，渗透更为彻底。正因如此，其严重性就不在于少数思想家和知识份子是否具有士族意识，而在于整个国民性被军事化了。关于这一点，只要看一下国定教科书是怎样对待武士道的就明白了。国定教科书从1904年（明治37年）开始制定到1941年（昭和16年）为止共编订五次。现在让我们看看书中出现的人物中，日本武人和军人所占的数量。在修身教科书中，皇室占 14.3%，文化、社会事业关系方面的日本人占10.7%，日本的武人、军人占10.3%，占第三位。国语教科书中，皇室占 18.8%，文化、社会事业关系方面的日本人占14.3%，日本的武人、军人占 33.9%，占第一位（唐泽富太郎：《教科书的历史》、别册第 3 表及第 6 表）。而这些武人、军人当然都是作为武士道的典型编进教科书的。因此看来，武士精神已经在全体国民心中培养起来。而认为士族精神只不过在士族出身的知识分子身上存有残余，武士精神仅仅是由他们传给后来的知识分子的，这种说法是说明不了任何问题的。

现在已渗透到全体国民中的武士道，已不可能是封建社会原封不动的士族意识了。但是，只是因为知识份子具有武士道、士族意识，才出现他们和民众相游离的现象，与此同时，还可能出现只因其不具有武士道、士族意识才孤立于民众之外的现象。比如，石川啄木就曾有意识地游离于“立宪国”日本，同时也游离于“民众”。他说：“民众仍然象封建时代一样，将官力和金钱力量置于个人自由与权利之上，这岂不是无知的民众吗？”（《林中书》，明治 39 年）在“官力”、“金钱力量”之外再加上个“武力”，情况也是一样。所以说，对啄木来说，有必要去发现另外一个民众。

2

“哲学研究活动也在这种波动(明治初年的急进与保守的波动——引用者)中徐缓地开展着，在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过程中，哲学的各个领域也开始创建起来，但后来逐渐与现实脱离，走向纯理论研究。然而这一时代的哲学家，尽管有的人从前不过是一个单纯的学者、教师，但在大政奉还前后，有的人也从事实际政治活动，有的则从事直接与政治有关的职业，同时仍从事哲学的讲授和研究活动。因此，决不能认为当时是允许不关心现实政治只埋头于钻研学理的。当然也不是说那时毫无哲学思索之可言。有哲学思索志趣的学者是按照当时社会所提出的要求进行哲学研究和教学的。因此才产生这个时代特有的启蒙哲学。应当说哲学家参与政治实际，把过去钻研思索的成果开始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乃是王政复古的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过去，在德川政府时代，虽然也有过谘询于学者的事例，但都不能说是常规。而天皇维新以后，学者就政治问题的发言机会确实多起来了”(麻生义辉:《近世日本哲学史》)。这里所谈的哲学与现实、哲学家与政治生活的关系，大致是合乎明治前期(到明治20年为止)的实际情况的。启蒙思想家除福泽谕吉外皆就于宦途，自由民权论者则更为直接地成为政治活动家。再说，甚至这位嘲笑自己的朋友置身于宦途为立身出世主义，但又认为“一国之独立乃来自国民之独立心”(《福泽谕吉自传》)而诸端协力于民间事业的福泽，也并非持反政治、反世俗的感情，而是希望有一个更好的政治。总而言之，这时代的进步知识份子是直接与政治结合或企图结合而进行思索活动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同明治末期开始出现的反政治、反世俗的纯理论思想家是不一样的。这时期，知识分子和民众结合的手段形式是私塾。在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庆应元年)、西周的育英社(明治 9 年)、中村敬宇的

同人社(明治6年)、箕作秋坪的三叉学舍(明治6年)、新岛襄的同志社(明治7年)以及共立学舍、鸣门塾、共励学舍、攻玉社、共立学校等为数很多的私塾,都讲习洋学。自由民权运动家中,大井宪太郎设立了有一馆,中江兆民也设立了佛学塾。开设私塾已并非为封建主公效劳,而是为自己之用,这是知识已为个人所有这种意识的表现,另外,以私塾形式同民众接触,虽然比较更为直接,但接触范围还是有限的。此外,他们还积极利用报纸、杂志以普及思想。当时还发行过同人杂志《明六杂志》。并成立一些学会,其中有名的有明六社和西村茂树的东洋修身学舍,这些组织都曾发挥了使民众意识组织化的作用。

在同政治实行肯定性结合,通过公开的社会活动积极向民众灌输思想时,这些一定的思想也就不能不带有强烈的世界观色彩。由于它同民众的社会生活本身有着多方面的联系,所以要求思想的世界观性。西周所著《百学连锁》和《百一新论》其书名,就是体现这种思想倾向的典型例证。日本的近代思想最初适应民众要求因而具有"实学"的性质。所谓实学,用西欧的概念就是Materialism,意思是对人类的实际生活,特别是对经济生活有用处的学问。但是,如果把人类的实际生活理解为行为的复杂体系,则"实学"的目标就要求学问具有世界观性;如果把实际生活理解为世俗的日常生活,则"实学"将成为技术性的、非体系性的学术。日本思想"近代化"最初出现的"实学"所体现的目标,正如上述《百学连锁》和《百一新论》以及《劝学篇》或《文明论之概略》等著作中所表示的,要求学问在外表上具有世界观的形式,同时,也还带有使学问走向技术性、利于实用、非体系性方向的倾向。因此,其中出现的世界观,统一性是非常薄弱的,或者说它仍是唯心的。这一点在西周所创的"哲学"一词中也有所表现。所以说,这种"实学"理念始终是包含着向"虚学"转化的危险性的。尤其当它被利用为个人

立身处世的工具（实学）或政府的御用工具（实学）时，就很可能得出唯有"虚学"才是"实学"的结果。实际后来也真出现了出任政府高官的启蒙思想家。不过，在时代属于上升时期的时候，思想的世界观性还没有出现破绽。

3

自由民权思想家仍然保存了思想的世界观性，这是由其运动的性质所决定的，然而，除中江兆民外，其他的全部自由民权思想家都急剧地发展了思想的政治理论方面。这个时期中值得注意的是进化论的介绍。应该说这是用自然观把原先的思想的世界观性进一步加强了。事实上，明治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者就是用这种自然观作为世界观的坚固基础的。在谈这一点之前，有必要叙述一下二十年代的状况。三宅雪岭是转变时期的二十年代的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他利用新引进的自然观组建了宇宙有机体说这一体系宠大的世界观。但是，他在这时也还是声称"宇宙等于身体，有其心意"，试图在自然科学宇宙观的核心处，插上一根精神主义的枢轴。此外，同一时代的井上圆了同样也不过是多少利用一下自然科学知识来提倡佛教的新道德。总之，这两个人在其世界观的形成上虽然比前代人拥有更为丰富的材料，但他们是把近代思想之舵转向个人的伦理主义方向去了。北村透谷的深入内心生活，井上哲次郎的伦理主义思想，内村鉴三的基督教个人主义等等，都是该时期思想动向的鲜明标志。然而在这一时期，三宅雪岭、井上圆了、井上哲次郎、杉浦重刚、志贺重昂等人，也唱出国家主义的论调，不过，这与上述伦理主义的个人主义倾向并不矛盾，因为它所宣扬的是，在国家这一最高建筑之中，个人应当作为精神的存在而生活。这一点标志世界观时代已经过去，国家主义＝个人主义时代到来。从民众时代转入国民时代。

在这个时期里，思想家、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也开始发生很大变化。当时的新锐哲学家井上哲次郎以其学自德国的“哲学方面的”技术解释“教育勅语”，这件事就是变化的第一个表现。按照井上的说法，“敕语”的德目分为“孝悌忠信”和“共同爱国”，这是日本国民必须无条件遵守的前提。他说：“古来日汉学者对于必须实行孝悌忠信，已做肯定性之论述。现在余已论证孝悌忠信为何是德义之本。换言之，古人已论述何者为人之德义，而今余乃解释此事为何乃人之德义者也。此乃余比古人前进一步之处”。此外，他还谈到“共同爱国”也是“德义之本”（《敕语衍义》，明治24年。着重点为引用者所加）。井上并非对什么是德义这个问题进行创造性思考的哲学家，而是一个对“敕语”定下来的“德义”为什么是重要的这个问题作出解释的技师。按井上的说法，“夫德义之精神，古今同一，无少许变更，然其实际施行之状况，则不得不随时世而变更”（同上书）。因此，“哲学家”只要是一个教育技术家就可以。这样一来，在教化权威主义基础上展开教育技术主义，就成为思想家、知识分子的任务了。

明治二十年代以后伦理主义的发展，最后到了“推进一国之文明或达到一国之富国强兵，归根结蒂亦必依赖于此德育之兴盛。”（安藤龟太郎：《德育归一与修身教科书编纂之必要》）这种程度，1900年（明治33年），为编订国定教科书开始设置“修身教科书调查委员会”。委员中可以看到有下列诸人的名字。加藤弘之（委员长）、井上哲次郎、中岛力造、井上圆了、元良勇次郎（唐泽著前出书，第200页）。在某种意义上，知识分子已经是不按照自己的意志承担国家意志代言人的任务，并且通过国家机关把他们和广大国民群众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知识分子成了技术性的“思想官僚”。就在这时，继东京大学（明治10年成立）之后，于1897年（明治30年）开办了京都大学。

在这个时代，思想家、知识分子或多或少还是同政治家是一致的。现在，两者的职能分开了。思想家、知识分子成了学者或书报撰稿人，政治家成了政党界人士或军人。在这以后的明治时代里，不属此例者只有社会主义者。在这里，谈到社会主义者时还有一个不能不谈到的问题，那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出现了报刊撰稿人这一知识分子的活动部门。虽然早从明治一十年代，与报刊出现之同时就已出现既非政治家也非学者的一个知识分子部门，但进入该时期，民间知识分子的活动方式开始确立起来，他们在新形成的政党或财界的援助下开始了文笔生涯。当然也出现了以自己个人的力量经营文笔生涯的。再者，在这个时期，创刊了以德富苏峰的《国民之友》(明治22年)、三宅、井上、杉浦、志贺等人的《日本人》(明治21年)为首的所谓同人杂志(这之前也有过《明六杂志》、《六合杂志》、《草莽杂志》)，接着又有《早稻田文学》(明治24年)、《文学界》(明治 26 年)、《帝国文学》(明治 28 年)、《文章俱乐部》(同上)、《明星》(明治31年)、《社会》(明治33年)等创刊，此外，在1895年(明治28年)和1899年(明治 32 年)先后创刊商业性综合杂志《太阳》和《中央公论》(《反省杂志》改名)。这些刊物中有不少是文学杂志，但是，当时正在形成的报刊撰稿人这一阶层人物则通过这些报纸和杂志同民众结合上了。这是一种比明治初年的私塾更为发达的群众宣传机关。这些报刊当然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但如前所述，因为日本的资本主义采取了军国主义形式，投向文化设施的资本极其微少，所以所谓报刊舆论界活动的范围也较狭窄，根底也浅。可以这样说，从这时期开始，日本的思想家、知识分子，按其社会职能和气质，显然分成学院主义学者和民间报刊撰稿人两大类。其中前者逐渐走上"思想"技术家的道路，而后者则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原有的世界观性，他们所涉及的问题也是多方面的，知识也是丰富多采的，不过在统一性方面有了很大减弱，日本近代

思想中世界观的丧失，在这时已露苗头。这些人后来被称为"评论家"。

从思想家、知识分子和下层民众的关系看，学院主义者或寄食大报纸的报界撰稿人的活动，与群众的关系是更为间接的。两者之间有国家机构和大资本的组织。在这方面与民众的关系更为直接的是基督教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义思想家。其中前者早就在各地方组织教会，并兴办同志社和《六合杂志》，从事"传教"。到这时期，活动的普及率更有所提高，在"明治宪法"制定前后的五年间，教徒增加三倍。还有外来的基督教也开始走上"日本化"倾向的道路，这也标志着基督教和知识分子同日本民众的密切结合。从而可以说，他们想要对民众的精神加以"近代式的"解放。而社会主义思想家则是直接继承自由民权传统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们主要以工会组织为基地，以"社会主义研究会"（明治 31 年）、"社会民主党"（明治 34 年）、"社会主义协会"（同上）、"平民社"（明治 36 年）、"日本社会党"（明治39年）等团体为中心，通过《劳动世界》（明治30年）、《平民新闻》（明治36年）、《直言》（明治38年）、《社会主义研究》（明治39年）以及其他报纸杂志，开展民众的社会政治组织化工作。思想家、知识分子同民众的这种结合方式，虽然是值得重视的一种方式，但从思想性来说，这些思想家、知识分子们在"哲学"上的造诣是极弱的，他们在从精神上解放民众方面还不具备足够的力量，以达到民众的全人类解放。当时的民众，在经济要求和精神要求上就不能不选择互不相干又各自不同的道路。

4

从明治末年到大正初年，日本资本主义更加发展，国家机构也膨胀了。如上所述已经增设各类高等学校。义务教育也改为六年制（明治39年）。这样一来，知识分子的数量增多了。此外，社会、

国家也为他们提供了活动领域。与此同时，知识业务的机能也有新的分化，知识分子的社会分工也更加明显，从而形成所谓的知识阶层。这就是说，无论从“特殊性”(special)意义说还是从“职业性”(professional)意义说，“专业性”知识分子出现了。现在，作为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已不是前一时代的那些政治家＝思想家的知识分子，而是技术家的知识分子。同时，这种知识分子一方面带有官僚色彩，另一方面又带有商人色彩。再从知识分子本身的问题看，他们所拥有的精神财富也不像前一时代那样为人们所尊重，知识分子的自负和荣誉感已经低下。然而，知识分子对知识的私有意识，还没有完全抛弃，他们还想在某些方面加以保持，并想保住他们的荣誉。在知识分子本身，也开始出现财产内容和所有权之间的分裂。

流行于这个时代的是“理想主义”思想，理想主义是由资本主义国家中两个后进国德国和美国在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赶超先进各国的过程中产生的新康德主义和实用主义两种外来思想训练出来的。因此，这种“理想主义”对1918年(大正7年)米骚动以后既蕴藏着若干爆发性危机又持续不断跃进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来说，是非常需要而又有用的。大致说，新康德主义是由官学教师、学者引进和倡导的，实用主义是由私学教师、评论家及民间评论家引进和倡导的。

这种“理想主义”的特征有这样几点。

一、技术主义(方法论主义)。如果把新康德主义看作逻辑的技术主义，那么，实用主义就是心理的技术主义。这种技术主义的目的不在于由自己主动探索对象的“是什么”和探求对象的各种关系以建立世界观，而是专心去解决“怎样”才能达到既定目标的问题。井上哲次郎在此以前就对“教育敕语”进行过“德义”的解释工作。到这种“技术主义”输入以后，解释的技术又有所提高，作为

“勅语”解释学的“国民道德论”就成为我国哲学界的主要趋势。另外，这种技术主义随着知识业务的分化，使知识分子只考虑如何适应工作的需要，对于综合地、联系地掌握对象所要求的“世界观”(思想)也就无所关心了。

二、自我主义(主观主义)。从获得经济基础和政治、法律权利入手取得近代社会的个人地位，已经显然是不可能了，这时，在进入明治二十年代时，出现了唯有树立自我意识才能树立个人这样一种思想倾向。透谷、樗牛、大西祝、内村鉴三的思想动向就是例证，而此时输入的外来哲学又促进这种倾向的发展。本来，新康德主义或实用主义并不承认自我和意识以外的“世界”。在他们看来，自我或意识活动是产生或创造“世界”的。或者说，自我或者意识的活动结果、其轨迹就是“世界”。这样，树立近代社会的个人是要靠观念上的自觉的。然而，这种自我或意识不外是同物质对象背道而驰的无止境的活动过程而已。按此过程树立起来的个人，何时何地都必将是自我满足的、顺从于既成环境的个人。所以说，自我主义哲学就是讲近代人“心术”的。明治末年以后，封建社会的被统治阶级的主从逻辑又复活起来，同这种近代社会的“心术”结合在一起。

三、文化主义。新康德主义或实用主义所主张的“理想”或“价值”并不具有客观的实体，同时也不认为客观的实体是必要的。追求“理想”或“价值”的活动本身就是“理想”或“价值”。它不过是上述那个自我的别名。在他们看来，无论身处何等无文化状态，只要进行追求，这种追求本身就是伟大的、崇高的“文化”。但是这不仅仅是官学“哲学家”的想法，当时工人运动的一位领导人大杉荣也是这样说的。

“运动要有方向。但无所谓最终目的。一个运动的理想，并不是在它的所谓最终目的之中找到的。理想总是随着运动的前进而

前进的。理想并不存在于运动的前方，而在于运动本身之中。在运动本身之中留下它的痕迹”(《生之创造》，杂志《近代思想》，1914年)。当时的一位哲学后起之秀表现了同样的意思，“从内心的绝对角度看，上下于三尺之杆的蜗牛，与奔走千里的老虎是同样值得尊敬的。而老虎不但不轻视蜗牛，反而以自己之不奔行千里而想休止为耻。蜗牛则不绝望于自己之无能，在上下运动于三尺之杆中发现其生存之意义”(阿部次郎：《三太郎日记》中的“人与天才”)。老虎之驰骋千里，蜗牛之匍匐三尺，在各自运动本身之中都有其理想，有其价值，从这个看法出发，就提出了平等主义。但是，如果以三尺匍匐代替千里驰骋而从中找到自慰，那么，这种“理想主义”或“文化主义”，则是屈从的“理想”和“文化”。再说，如此创造出来的“文化”、追求的“理想”乃是内在的文化和理想，所以它不可能带来变革社会和颠覆国家的后果。它只能是在知识分子“专家”的自我满足之中构筑起来、创造出来。

这种“理想主义”在受到国家或社会不断促进的职能分化过程中，为知识分子主动接受下来，从而成为“专家”知识分子，这一点是无需再说的。另外，他们也必然因投身于无止境的自由竞争，养成一种小私有者的“庶民”意识所特有的“价值”观和“文化”观，从而失掉社会团结意识。在这时期，也有一些身着“理想主义”西装的“武士”，但更多的还是那些不愿当“武士”的思想家、知识分子，他们这时作为雌伏于“武士”统治下的“町人”或“百姓”，把自己包在“理想主义”新装之中。

从这个时期开始，思想家、知识分子们承认了智能工程师的命运，同时这种属性也加强了，这就是说，他们都变成了普及国民道德的工程师，讲处世度日“心术”的教师、翻译工程师、介绍新学说的工程师。这些工程师们在从事“专家”职业活动当中意识到自己的社会作用的公正性和不偏不倚性，而这种公正性和不偏不倚性

正是从自由主义这一特定的世界观在其所处的当时历史阶段中产生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这样的"专门"工程师就是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异化形式，是资本主义分工和他们自身方面的知识及技术的私有，使他们异化为工程师。不过也不能否认，在一定限度内这种异化形式才是使知识分子专心致志从事于实际活动的动力。从此时起，开始出现了《……研究》之类的著作，但作者则被斥为"成果"和"迁升"的分裂。

在这一时期，报刊杂志业也进一步扩大了。《改造》(1919年)、《解放》(同上)、《文艺春秋》(1921年)等综合性杂志及文艺、评论杂志都是这时期创刊的。还有长谷川如是闲和大山郁夫的《我们》(1919年)、河上肇的《社会问题研究》(1919年)也创刊了。因而思想家、知识分子本身的志趣也在很大程度上转到报界活动方面。这和上述那种"专家"意识是相反的，但是必须看到，在包含着这种相反的倾向的同时也有相同的基调。关于这一点将在下面谈到。在思想家、知识分子转向报界活动的明显表现当中，有田中王堂的《从书斋走上街头》(1911年)和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1920年)。田中王堂在其著作中说，"研究实践问题的最好场所是肃静的书斋，而考验理论上的假设的唯一标准则是街头生活"，"评论乃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评论"负有社会实践的任务。按他的话也就是说，"毫无疑问，评论家的职责除了解放个人以外再没有任何别的，也不可能再有别的"(《解放之信条》，1913年)。厨川白村在其《出了象牙之塔》的卷头语中曾引用其旧著《近代文学十讲》(1912)中的一段文章，说明走出《象牙之塔》的理由。他是这样说的：

"……方今时势剧变，已进入物质文明之生存竞争甚为激烈的世界，人心已无片刻脱离现实生活而悠哉游哉的余裕。人们更加痛感现实生活的重压。人生面临的问题，无论行止坐卧，总萦绕于脑海之中而使其烦恼。于是，文艺终不能总说一些无关痛痒的事

情。大势所趋必须与现今生存问题结成密切关系。以至那些已迫在眉睫困扰着人们的社会问题、宗教问题、道德问题，都急需从文艺方面去处理，现实生活与艺术已密切到这种程度了。"

于是，白村放弃了"为艺术而艺术"而《走向十字街头》(1923年)。在这个时期，还有长谷川如是闲、大山郁夫、帆足理一郎、杉森孝次郎、土田杏村等一些"评论家"或"文明批评家"也很活跃。从所谓"学者"中也出现了吉野作造为代表的一批人，这是一种新的苗头。然而，这批"评论家"的特点是，他们已不是前一时代那样的"政论家"了。虽然他们所涉及的领域更加宽广，知识更加丰富，但也说明他们的焦点即统一力更加模糊不清了。再说像吉野作造和福田德三那样的翰林学士式人物在舆论界的发言撰稿，也都是在其"专门"范围内进行的。

在"文明批评家"的自觉意识中，有一个"人本主义"。它反映了作家们的愿望，他们不愿做偏颇片面的人、想做完整的人，不愿做身披虚伪与虚饰外衣的人，而想成为真实和自然之子。这一点也是使他们走向"街头"，涉猎多方面的知识，投身于多方面活动中去的原因，同时也是他们作为"民主主义者"的心情。然而，这种"人本主义"只要以"必须通过'对自己说来'的自觉去重新估价自己的一切感情、思想和行为"(田中王堂)这样一种彻底的主观主义为核心，那么这种"文明批评家"的住处就是洞穴。即使他们是在寻求"人本主义"，可是并没有出现能与上述"专家"技师相抗衡的开放型的"文明批评家"，相反，倒是形成了所谓"文明批评家"这样一个闭塞型的"专家"范畴的技师队伍。实际上，"文明批评家"一类新闻记者已经不是从学院知识分子群中涌现出来的这种意义上的街头知识分子，而是同其并列的一个独立"专家"队伍。但是，由于出现这样一个独立队伍，所以从这里也就能够产生独立于国家政权之外的左翼评论家。

5

从明治末年到大正时代期间形成的“专家”知性（intellect），其本身也是“存在”。这是因为“专家”知识分子把自己的活动固定在一定的对象上，又因为其活动保证了他们的全部生活。但到昭和初年，人们开始提出知性的存在问题，这意味着知性开始从存在分离出来。从1927年发生金融危机到满洲事变（1931年），日本全国因危机而萧条。从而促使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存在基础即生活进行了深刻反省。这时，出现三群态度不同的人。一群是想通过重建生活来建立其知性；一群是想放弃知性回到生活中去；另一群是不管生活如何动摇，认为在动摇的生活之中始终坚持知性。无论那一种态度，“知性”都不能不对其生存基础和理由这个问题重新加以考虑，这就是这个时期的“知性”的特点。

第一群知识分子是左翼知识分子。他们把自己的生活根基挖开来一看，认识到使他们作为知识分子而生存下来的，乃在于小市民的生活，他们首先试图通过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以重建生活。然而，他们既然作为知识分子，在任何场合都必须努力客观地来把握知性的存在依据。于是，无论从好的意义上说还是从坏的意义上说，他们从这里发现了“历史的必然”。除了过去一直参与工人运动和政治运动的那些人外，也有像栉田民藏、河上肇、大山郁夫等人那样的注意到工农大众动向的“专家”知识分子，可是到了这个时期，知识分子已经整个阶层地向这个方向移动过来。同对工农大众一样，对这类知识分子来说，所谓重建生活只能是社会革命，别无他途。正因如此，国家政权当然是以镇压手段对待这种动向。早在1920年，森户辰男因写了介绍克鲁泡特金的文章而被逐出东京大学，这件事就是这种事态的开始。后来，1928年大森义太郎被逐出东大，河上肇被逐出京大，石浜知行、佐佐弘雄和向坂逸郎被

逐出九大，1930年平野义太郎被逐出东大。对学生或对有名无名的知识分子的政治、法律上的压迫更是数不胜数。三木清和户坂润也先后于1930年和1934年离开法政大学。而这种知识分子被逐出大学还不止于单纯与国家或当局的冲突。正如1937年矢内原忠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这里还包含着知识分子内部的分裂和冲突。

在这种知识分子的群众运动和社会斗争过程中，知性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知识分子不甘于把自己看做是巨大机器中的零件似的"专家"了。"思想"又重新开始要求其开放型的"世界观性"。不如此，则"思想"既不能满足群众的迫切要求，也不能达到知识分子和革命群众的统一。对于"思想"的这种性质上的变化，户坂润是这样看的。"……唯物论是现今最概括的、统一的、客观的世界观，又是最实际的有系统的逻辑，这一点是不能忽视的。事实上，今天的唯物论，从一开始就是最具有'思想'的根本特点的思想。如果现在我们不依据这个唯物论，就不可能有现实的、统一的、系统的思想和科学的批判能力。同时还可以说，或多或少具有唯物论思想的……人物，几乎毫无例外都因为他们是一个评论家、批评家、新闻记者、百科全书派学者，所以才成为一名能超出普通思想家水平的思想家的"（《现代日本的思想界和思想家》，选集第六卷）。"百科全书派与唯物论在法国启蒙时期是一个东西，这种关系在今天也完全如此"（《启蒙》，同上）。户坂润就是想用唯物主义或"物质"概念把已被各类"专家"知识分子割裂后保持下来、被"评论家"用浅薄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世界观重新统一起来。

生活基础的破坏和国家政权的高压，本来会带来知性本身的破坏，但另一方面，又对知性指出了新基础产生的条件，坚信知性前途的知识分子，通过同革命的、现实的政党相结合，进一步深入到新基础之中，力求更大地发挥知性作用。从与这种革命政党的结合中产生的知识分子的任务，是从理论上把革命纲领具体化和

对现存的社会秩序及其意识形态进行科学的批判。

昭和初年，知性曾经付出努力，想通过自我变革使知性转化为现实力量，事实上也确实这样实行了，但从整个国民的问题来看，其结果还是容忍了知性的荒废。究其原因，根本在于知性的虚无主义，但从革命知性方面去找原因，则在于知性与实践的脱离。特别是四·一六事件以后，"政治家"或"运动家"即"实践家"和"学者"即"理论家"的"专家"式的分离也干扰了革命政党。知识分子的组织化，甚至在条件最优越的形势下也是由"实践家"性质的组织者组织起来的同路人性质的组织。在党的理论方面表现卓越的知识分子，多半都是"文化人"。而这种状况越到后来越严重。于是，这种脱离"实践"而又强行活动的"知性"，首先具有陷入终年解释纲领的教条主义的可能性。其次，这种"知性"的"批评精神"还包藏着导入不可知论，并陷入无休止地进行无的放矢的批判的可能性。"知性"并没有完全摆脱其前一时代的洞穴中的"知性"的性质。在这里也就存在着左翼知识分子"转向"的因素。

绝望于理性因而想回到生活的第二群"知识分子"必然走上野蛮主义(barbarism)路线。这条路线的起点是对知性的怀疑，他们厌恶近代"知性"的假设前提，尤其对前一时代形成的"知性"的温和性和那一套温良恭俭让抱反感，仅仅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批判的、革命的，但他们的方向并不是变革知性，而是全盘否定知性。他们的结论是：一、否定知性文化财富，代之以神话(原始的神秘主义)；二、向日本最非知性的农村生活寻求自己的根源(农本主义)；三、认定一切不根据知性的行动、即暴力为最高的现实性力量；四、视明治以来的知性文明为外来者而加以排斥，代之以日本固有的情意"文化"。对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倾向在左翼势力衰落以后——佐野、真锅的转向声明是在1933年(昭和8年)——有了急剧发展，但其核心势力是在明治、大正年代以来长期间准备好了的。那就

是所谓的右翼势力。

这派势力首先是政治势力，昭和初年这派像个思想家样子的思想家有北一辉、权藤成卿、安冈正笃、橘孝三郎、大川周明等。他们的"思想"核心是情感印象，因此是非科学的、非逻辑的，从这一点说，它并非思想。但是，为了给人们以情感印象，他们具有的一种气氛有利于决定他们的行动，再加上它是用各种"科学"知识作了准备的，比如它包含着高畠素之的机能主义国家论或北一辉的天皇机关说那样一些近代学说，自成体系，从这一点看，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出色的世界观。此外，他们甚至打出"自由"、"平等"、"博爱"等近代口号。因此，这种"思想"要求由近代的群众直接付诸实行，而且也是具有这种可能性的"思想"。然而，用这种"思想"决定其行动的群众虽然内心中有着强烈的欲望，但在采取满足其欲望的实际行动时，他们却不可能采用从历史观点看来是合理的有组织的手段。因为他们是属于小市民阶层和流氓无产者阶层的群众，或者是已陷入这些阶层所特有的心理状态之中的那部分群众。当左翼革命力量进入低潮，其组织力量减弱时，这部分群众心怀不满而回到"市民"或"庶民"生活中去。这时，这种思想就在人们心中燃起欲情之火，并成为达到这种欲情的信条。

但是这一势力是很有组织性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它原来是一股政治势力，同时还由于上述思想家都各有其组织，权藤的"自治学会"、安冈的"金鸡学院"、橘的"自觉的农林勤劳学校爱乡塾"等等，都是"思想"训练的修道场。在他们那里，思想家本人就是组织者。在这一点，不能不说"思想"和行动、"理论"和实践是一致的。这也许就是这种"思想"对群众具有逼真力的一个原因。另外，这些人在联系有名"学者"方面也是竭尽其能事的。筧克彦、纪平正美、松永材、上杉慎吉、鹿子木员信、藤泽亲雄、北玲吉、蓑田胸喜、林秦未夫、土方成美、平泉澄等等，都是学院中属于这一派的第一

流人物、高级知识分子。总之，这样一种"智力"网很久以来就已经遍挂到整个知识阶层的头上，因此，它也就当然成为野蛮主义的"智力"后台。到了野蛮主义达到最高峰的战争时期，知识分子进入国策性研究机关、进入战时官厅，组成一个知识分子的"革新势力"，就不必特意来一个什么"转向"，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乃是理所当然，势在必行的事。

第三群知识分子也许可以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这些人具有浓厚的前一时代培养出来的"专家"气质，因为他们以工作为"生活"，对外界（？）生活主观上好像是无关系，但应该说，在客观上随着外界（？）生活的变动他们是最动播的。如果说第一群知识分子是革命的，第二群知识分子是革新的，那么，这第三群知识分子则是维持现状的。在双重意义上讲，他们是"有良心的"。所谓双重意义就是，首先他们始终追求着内心"生活"，其次，对外界（？）生活是敏感的。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这个时期在数量上应该占最多数，因为他们属于旧型，所以对民众没有什么特别新的影响。因此，这里只就他们对时势是抵抗还是顺从的内在原因作一分析将是合适的。

1933年泷川事件、1935年美浓部博士的天皇机关说问题、1937年的矢内原忠雄被逐出东大事件、1938年的河合荣治郎著作禁止出版事件、1940年的津田博士著作禁止出版事件等等相继发生。这是日本为进行战争准备而实行的控制国民舆论的证据。1933年颁发了退出国联的诏书。而这些事件，除矢内原的《战争与和平》（《中央公论》，昭和12年9月号）外，其余都是有关旧著的事件。因此，对这些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们的镇压，则具有浓厚的高级政策色彩。他们并不持有否定国家、提倡社会革命的主张。正因为是这样，对于自由主义者的镇压才说明战争势力在扩张。然而这些自由主义者们还是想要按照他们要求"知性"的纯粹性，径直地沿

着中间道路前进。但从客观上看，那并不是中间道路。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一块纯粹"知性"的试金石。

自由主义"哲学家"田边元在1931年说过这样一段话。

"……所谓中间派，大概就是对此下的非难性评语。我对它不仅没有任何为之分辩的理由，而且相信，作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这种评语乃是理所当然的，而所以采用它，倒是以保持并发扬超然于阶级局限之外的普遍性立场为己任的哲学之本责。但它当然并不是一般所理解的抽象折衷意义上的中间派，而是以历史进程的动态因素为媒介的具体普遍性意义上的中间派。反正一开始我就无意参加在一定政治意图下进行的理论斗争。"(《黑格尔哲学与辩证法》序)

这段话深刻地道出了"专家"知识分子的心情。如果把"哲学"换成"科学"，这种情况就适用于一切"专家"知识分子。也适用于艺术家。自己的立场是超政治的，中间的，而这种中间性又是"具体普遍性"，这就是"专家"知识分子的信条。当这一类"专家"知识分子认为自己的中间立场遭到外部政治权力的干涉时，他们就进行强烈反抗。田边元在1936年批判为备战而制订的科学政策，写了《科学政策的矛盾》(《改造》)这篇著名论文，"贬责当局对科学政策没有见解，使满天下知识分子大开其怀"(今野武雄:《科学政策的根本问题》，载《唯物论研究》1936年11月号)。"专家"热爱自己的事业，始终相信工作的实际价值，对来自外部的干涉，无论来自什么样的权威，都是坚决抵抗。"专家"的这种集中性无疑是知识进步的动力之一。而且田边元在其《最近的自然科学》中也强调了科学的客观性。但是，作为"哲学者"他却不是这样了。

谈到这里，这种"中间"立场以及它的"具体普遍性"内容又成为问题了。这与阿部次郎曾经承认虎的巨步和蜗牛的爬行具有同一意义的"内心的绝对见解"是同样的。这种立场的内容只能靠"专家"本人的心情和判断。它是彻底的个人主义立场。个人主义既不是无政府主义也不是否定国家的立场。不过，自由主义的个

人主义反对国家这个整体对个人的干涉。但个人以自由意志追随国家动向则是无可非议的。与此相反，"哲学者"的"具体普遍性"的"中间"性，只要它本身不是政治行为而是知性行为，那么，它就是能够心安理得地充当任何类型的政治工具的"知性"立场。《科学政策的矛盾》发表后不久，田边元1940年在其《历史的现实》一书中把国家这个整体的非合理性动向当作历史现实而承认下来，并高喊要"合理地"追随这种国家动向。这是"中间派""知性"中的追随思想的典型。上面说的就是自满洲事变到战争失败整个期间，以田边本身的例子来说明的抵抗与追随两者的实际情况。

下面再谈谈抵抗与沉默的例子。天野贞祐的《道理的感觉》(1937年)被说成是抵抗之书。书中对满洲事变后出现的"政治家"、"官僚"、"资本家"、"军人"的各种行动发出严厉警告，并说"仅就我从历史所学到的来说，一国衰亡的真正原因常在于国民，尤其在于官吏、军人、政治家、财主等人的道德的堕落"，"兴无名之师或滥用国家经费的反道德性将亡国"。对当时统治者们的所作所为提出如此警告是堂堂正正的，也是需要勇气的。而天野是帝国大学的伦理学教授。他从自己的"专家"立场出发，说"国家的生命源泉在于理性，在于道理"，"……国家得以存在的客观实际不单纯在于武力、经济力或广大领土，而在于道德力量"，"德义是血液，是生命，如果涸竭，国家必亡"，他就是这样论及国家的。对当时统治者所叫喊的国难，他则说"然则国难发生之根本原因尚在更深之处。使我国陷入今日困境之原因究竟是什么？我认为其原因与其说在于政治经济，莫如说在于道德"，因而主张用"道理的感觉"以拯救国难。不用说，天野对国家的看法是唯心主义的。但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天野从其"专家"的"伦理"角度规定了国家的本质，谴责了在和自己的"专业"不同的"政治"、"经济"、"行政"、"军事"各部门工作的"专家"。如果让天野所谴责的那些"政治家"、"官

僚"、"资本家"、"军人"来说，那就很可能说他们是按照自己各自的"专家的"工作领域去规定国家的本质，并且用忠于职守以期排除国难，谋求国家之兴隆的。从当时实际情况看，倒真是应当说各部门的"专家"都是在自己岗位上对国家尽忠而不惜牺牲的。

天野贞祐是从自己的"专家"立场对国家这一整体存在的本质作出规定的，并根据这样的本质确信自己的"专门"是"具体而普遍"的。这说明他也是有意识地要求承认自己作为"专家"在整体性结构之中的地位。正因为他坚持这种"具体而普遍"的意识，那些无视自己从事的"专业""道德"的"政治家"、"资本家"、"官僚"、"军人"之所作所为当然就是垄断国家的行为，因而就应当以国家的名义予以弹劾。所以也就出现来自"专家"宗派性的对"政治"的抵抗。但是，这种抵抗是在那些暴虐的"政治家"、"资本家"、"官僚"、"军人"掌握着国家政权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在表明一定的意志之后，也就停止对他们的指责而只能沉默下来。天野便自动把他的抵抗之书《道理的感觉》付诸绝版。

在这个时期里，比田边元和天野贞祐更年轻一代的自由主义"知性"，所遭受的来自外部(？)的经济生活和政治权力的压迫以及来自左翼势力和右翼势力的攻击更为深刻。这时期的"知性"把该时期的全面动摇理解为"知性"对"主体性"的不安和"知性"危机，由此产生了"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所表达的是旧自由主义的"知性"立场再也坚持不下去了的预感，同时也是"知性"对自由主义存在方式的全面反省。但是，如果只是从"知性"本身方面去研究和解决"知性"危机问题，那仍然是自由主义"专家"意识的延长而已。另外，如果认为只有通过"知性"重新恢复其独自领域地位才能克服这种"知性"危机，那就只有使"知性"紧密附着于外界(？)动向，别无他途。前面说过的当时的知识分子只有二重"良心"就在这里起作用。实际上，这种"知性"立场随着时势的动

荡有一个从左到右的大摇摆。但是这种"知性"几乎没有起到"知性"的作用，至多不过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心情，或者倒不如说它是"知性"的虚无主义。